

跨文化交际丛书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ries

胡文仲 主编

胡文仲 著

跨文化

交际学概论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ries

胡文仲 主编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胡文仲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胡文仲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ISBN 7-5600-1660-X

I. 跨… II. 胡… III. 文化交流-世界 IV. H319.4:G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1733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胡文仲 著

* * *

责任编辑:倪 芳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1)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875

字 数:166 千字

版 次: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 7-5600-1660-X/H·941

定 价:8.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序

在我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始自 80 年代初期，时间不算长，但是，发展的速度却相当快。学术杂志发表的论文已达数百篇，专著也已有二三十部。1995 年在哈尔滨召开了我国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并成立了全国性的跨文化交际研究组织——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1997 年在北京又召开了第二届研讨会。参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包括外语界、对外汉语界、语言学界和心理学界的学者和教授，他们的研究角度虽然不同，但是他们都对跨文化交际学在我国的确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目前我国的研究来看，一般性的探讨较多，而基于大量数据的研究比较缺乏。前者相对说来比较容易，而后者就要花费许多时间、物力和财力。从其它国家的情况来看，要在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做出成绩，必须在收集数据和实地调查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只有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做得扎实，理论探讨才会有真正的深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这套跨文化交际丛书的作者都是外语教师及对外汉语教师，他们侧重于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语言交际方面遇到的问题，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需要说明的是这只代表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个角度。研究跨文化交际还可以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进行。例如，沙莲香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族性的研究就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范畴。在美国，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学者也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不少人是心理学家、人类学家，而语言学家和外语教师在研究者中则处于少数。在欧洲一些国家，社会语言学家和语用学者则又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主力。这都说明跨文化交际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

的。有的教师说“教无定法”，其实，研究跨文化交际也是一样，并没有人规定必须从某一个角度研究。这只会有利于学科的发展。

我们目前出版的这套丛书不是纯理论研究，而是为普及跨文化交际知识和理论的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的参考书，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普及和深入。尽管在策划这套丛书时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并且确定了大致的写法，但是，每位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都有自己的创造和发挥，甚至在术语上也不完全一致。我们在编辑时尊重作者的观点和看法，并没有坚持整齐划一。跨文化交际研究在我国历史还不长，我们自己的知识和理论修养也还有许多缺陷，因此，错误和偏颇在所难免，希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出。

丛书主编

胡文仲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1998年10月

前 言

我对于跨文化交际学感兴趣始于 80 年代初期,在澳大利亚两年的进修生活使我感受到要学好教好英语必须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交际能力不仅包括语言形式的掌握,而且包括对于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习俗的了解。回国以后陆续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有关中西文化差异的文章,在这期间的认识大致上都是感性的。以后接触到跨文化交际学的书籍和杂志,读了西方学者的文章,才知道跨文化交际学至少已经有了 20 年的历史。从这时开始,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跨文化交际学的一些著作,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硕士层次的学生中开设了跨文化交际学课程。1988 年和 1996 年在美国讲学时也为美国学生开设了这门课程。90 年代中期在国内还招收了跨文化交际学的博士生。

从 80 年代初期到世纪末,我接触跨文化交际学也有近 20 年了,对它的兴趣不减当年。但是,与此同时,我越来越感到做这门学问的难处。有的困难是由于个人读书少积累不够所致;有的困难我认为是学科本身所固有的。这是因为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多学科学问,涉及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等。要熟悉所有这些学科对于任何人都不是容易的事。我和英国同事谈及跨文化交际研究,不少人都公开表示这是一件很难的事。研究跨文化交际和在其他方面做学问一样,入门似乎不难,但是要深入进去就不那么简单了。

酝酿写这本概论已经多年,但是,一直没有真正动笔。到 1997 年我筹划写书时,已经有三四本跨文化交际学的专著问世。这包括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林大津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以及贾玉新的《跨文化交际学》。看了他们的著作以后,我觉得再写

一本变得更困难了。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写作过程中,我尽量不写或少写他们已经谈到的方面,在他们谈的较少或没有涉及的方面多发挥一些。书的结构自然也就与他们的不同。我的读者对象是外语专业、对外汉语专业的高年级学生、翻译工作者以及一切对跨文化交际感兴趣的人们。我希望这本小书可以作为他们研究跨文化交际学的入门向导。

书的名称既然是“概论”,在许多方面就必须删繁就简。另一方面,这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跨文化交际系列丛书之一,在内容上不应该重复系列中的其他书,因此,也需要精简。例如,杜学增教授已经写了《中英文化习俗比较》,毕继万教授专门论述了《跨文化非语言交际》,我在相关的章节中只能挑一些重点讲解。但是,为了概论的完整性,这些部分又不能完全略去。

跨文化交际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发展迅速,参与的学者、教师越来越多,这是十分可喜的。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但是,我必须提醒年青的学者,这是一门看来容易实则困难的学问,要真正做的深入必须投入全副精力,花费大量的时间。我预祝年青学者成功。

目 录

第一部分 绪论: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交际学

第一章 跨文化交际.....	(1)
第二章 跨文化交际学.....	(9)

第二部分 基本概念:文化与交际

第三章 文化的定义与特性	(27)
第四章 交际	(47)

第三部分 跨文化交际的过程

第五章 语言交际	(57)
第六章 非语言交际	(94)
第七章 社会交往.....	(124)
第八章 人际关系.....	(136)
第九章 经营管理.....	(152)

第四部分 跨文化交际的核心

第十章 价值观.....	(165)
--------------	-------

第五部分 提高跨文化意识

第十一章 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177)
第十二章 文化休克与跨文化训练.....	(186)
参考书目.....	(199)
附录一:建议阅读书单	(204)
附录二:有关网址	(208)

第一部分 绪论: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交际学

第一章 跨文化交际

一、什么是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对于一些读者来说是一个新词,实际上,我们经常从事跨文化交际,只是我们不自觉而已。我国外交部长与外国领导人谈判是在进行跨文化交际,进出口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外国商人谈生意也是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我们和外国旅游者、外国留学生、外国教师交往同样是在进行跨文化交际。即使我们不与外国人直接接触,仍然可能在从事跨文化交际。例如,阅读外国小说,观看外国电影、电视节目的过程也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我们作为读者和观众与小说的作者、电影电视的导演和演员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理解外国小说、电影电视是一个复杂的跨文化交际的过程。

如果下定义,可以说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就是跨文化交际。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相互接触和融合,这其中充满了丰富的跨文化交际的内容。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丝绸之路使我国古代人民通过商业往来与中亚、西亚、非洲、欧洲的人民进行交流,这是我国早期在国际范围内的跨文化交际的一个突出例证。印度佛教的传入,唐朝鉴真高僧的东渡,明朝郑和下西洋,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以及历经数百年的西学东渐包括了十分复杂的跨文化交际的过程。由此可见,跨文化交际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现象。在我国如此,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跨文化交际之所以在今天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主要原因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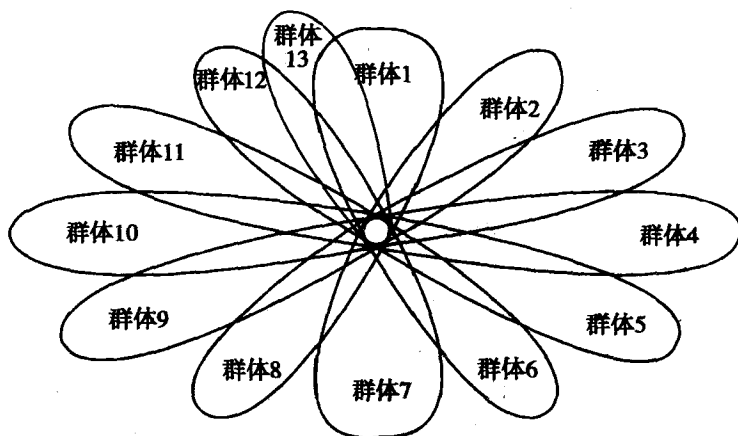
由于交通工具的进步与通讯手段的发展使得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能够频繁地接触和交往。世纪初需要几个月才能从我国的上海到达美国的洛杉矶,而今天却只需要十几个小时。电话的普及使得一般信函的数量不断减少。卫星转播电视节目使得全世界的人们可以同时观看世界杯足球赛。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因特网更把全世界的人们通过计算机网络联系起来。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人们交往的频繁都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的。这一切使得跨文化交际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L.S.Harms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的交际经历了五个阶段:语言的产生;文字的使用;印刷技术的发明;近百年交通工具的进步和通讯手段的迅速发展;跨文化交际。¹Harms认为,近二十年来的交际是以跨文化为特征的。这是人类交际的第五个阶段。在他看来,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与语言的产生可以相提并论。

二、对跨文化交际的不同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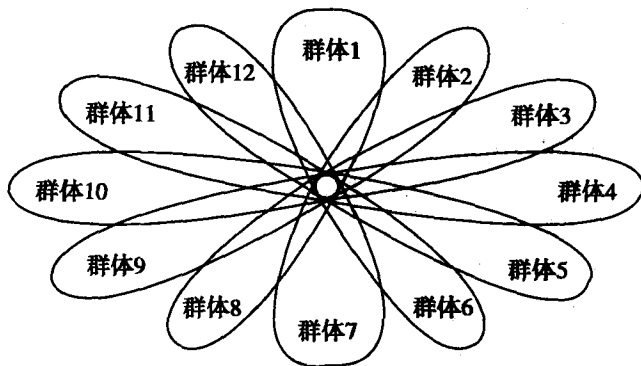
在前一节谈到跨文化交际的定义时,曾经提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是跨文化交际。但是,对于什么是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一种看法是任何两个人之间的交际都是跨文化交际,因为,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每个人在文化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Marshall Singer持有的就是这样的观点。他认为,首先,每个人都隶属于若干群体,而且,没有两个人隶属的群体是完全相同的。其次,既使在同一群体中每个人的态度、价值和信念也不会完全一样。因此,在文化上每个人都应该被认为是独特的。²请看下页的两幅图。图的意思是Mary和Margaret分属于许多不同的群体,因此他们的价值观念结构也十分不同。Mary是一位住在芝加哥郊区的已婚白人中年妇女,信奉基督教,受过大学教育,在一家计算机软件公司工作。她倾向于民主党,在选举中投克林顿的票。她主张环境保护,反对种族歧视。业余时间她喜欢打网球,参加了

Mary 的价值观念结构



Margaret 的价值观念结构



一个网球俱乐部。假期中她常常与朋友一起去爬山。我们可以说, Mary 属于以下的群体:

- 1) 白人;
- 2) 城市郊区的居民;
- 3) 妇女;
- 4) 中年人;
- 5) 已婚的人群;

- 6) 基督教徒;
- 7)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 8) 有职业的人群 (以别于失业人群);
- 9) 中产阶级;
- 10) 支持民主党;
- 11) 主张环境保护的人群;
- 12) 反对种族歧视的人群;
- 13) 喜欢运动的人群。

如果我们有兴趣还可以作进一步更细致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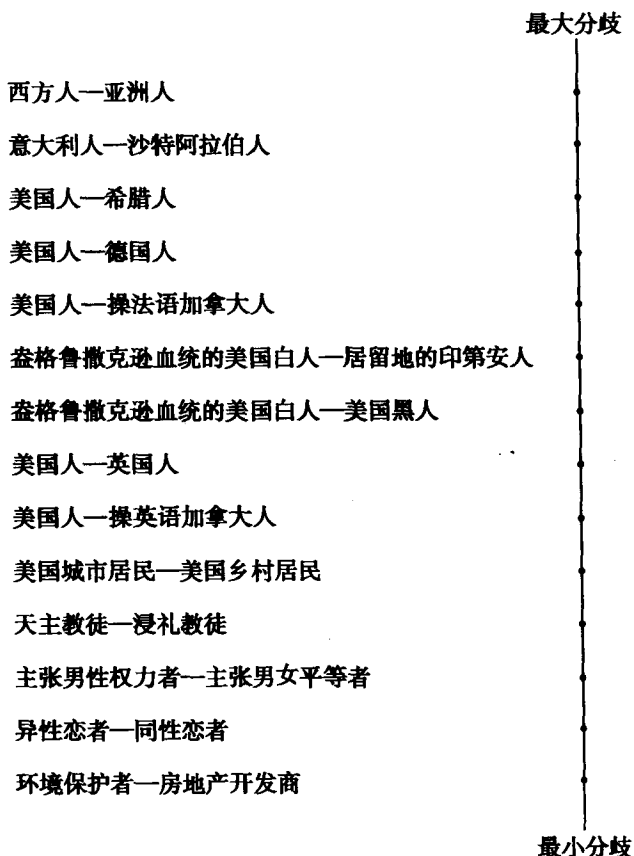
Margaret 是黑人, 居住在华盛顿市区, 中学毕业以后作过各种工作, 收入较低, 信奉天主教, 目前在一家餐馆打工。她对于政治没有兴趣, 从来都没有参加过选举。她主张环境保护, 反对种族歧视, 反对人工流产, 认为这是伤害小生命。她不喜欢运动, 但是喜欢流行音乐。因此, 她属于以下一些群体:

- 1) 黑人;
- 2) 妇女;
- 3) 城市市区居民;
- 4) 只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群;
- 5) 天主教徒;
- 6) 收入较低的人群;
- 7) 体力劳动的人群;
- 8) 对于政治缺乏兴趣的人群;
- 9) 主张环境保护的人群;
- 10) 反对种族歧视的人群;
- 11) 反对人工流产的人群;
- 12) 喜欢流行音乐的人群。

从她从属的人群来看, 她与 Mary 大不相同, 因此, 她们在看问题的观点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 即使 Margaret 与 Mary 属于完全相同的群体, 在每一个群体中她们看问题的角度以及对于问题的份量

也不可能抱有完全一样的看法。这就是 Singer 的出发点。他认为既然人们属于不同的群体,在每个群体中的看法又有差异,那么,严格说来,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交际都应该被视为跨文化交际。

Porter 和 Samovar 把各种文化差异放在同一个标尺上³,在他们看来,不同国籍人们之间的文化差异与不同职业的人们之间



的文化差异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差异。由此可见,他们虽然不像 Singer 那样过分强调每个人在文化上的独

特性,但是,在原则上他们与 Singer 的观点是一致的。

Ron 和 Suzanne Scollon 在对于跨文化交际的看法上与 Singer 有共同之处。他们也认为人们属于不同的群体,而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群体都有各自的独特的语篇系统,因此,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研究应该把重点放在语篇系统方面。研究文化差异不如研究语篇差异更有意义。下面这一段话可以概括他们的基本观点:“在跨文化交际讨论中,如果我们把焦点集中于作为亚文化系统的语篇系统,会更加有效。在这些亚文化系统中各系统之间的对比更加突出一些。”⁴

Singer 和 Scollon 的观点反映了一些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一些现象的不满。他们认为作大范围的国与国之间的对比对于改进跨文化交际益处不大,应该把眼光放在更具体的文化差异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范围应该也包括地区、职业、年龄、性别等方面的文化差异的探讨。这对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深入无疑是很有帮助的,也提醒我们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应该避免大而无当的比较。但是,实际情形究竟是怎样呢?我们稍作调查,就会发现尽管作国与国之间的文化比较往往有许多弊病,人们仍然需要进行这项工作。在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书目中有大量的书籍是从国与国之间的对比研究出发的。例如:

Understanding Arabs: A Guide for Westerners

Border Crossings: American Interactions with Israelis

A Fair Go for All: Australian and American Interactions

From Da to Yes: Understanding the East Europeans

A Common Core: Thais and Americans

With Respect to the Japanese: A Guide for America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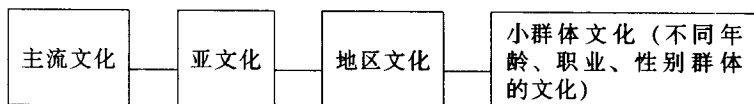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Germans, French and Americans

Management in Two Cultures: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U.S. and Mexican Managers

Crosstalk and Culture in Sino-American Communication

即使我们没有读过这些书,不了解它们的具体内容,仅从书名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采取的路数大致上是国与国之间的对比。至于在文章的论述中作这类对比的就更是司空见惯了。

在作文化比较时似乎可以大到东西方对比,小到两个人之间的对比。中间还有种族、民族、国家、地区、阶级、阶层、职业、性别、年龄等等层次。我们研究跨文化交际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呢?这牵涉到文化的定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文化通常不是指个人的行为,而是指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笔者以为作跨国、跨种族、跨民族研究不仅应该是跨文化交际研究包括的内容,而且应该是放在首位的。至于地区、阶级、阶层、职业、性别、年龄等不同层次的差异也应该给予关注。至于个人之间的差异的研究只是在我们把他们当做群体的代表时才有意义。在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特点时,我们的眼光首先应集中在它的主流文化上,其次才注意它的亚文化和地区文化特点。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我们是否可以采取这样的顺序:



小结:

跨文化交际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这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普遍现象。近几十年来人们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一现象的研究,是因为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迅速发展使得各国人民得以频繁地交往。对于跨文化交际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每个人在文化上都是独特的,因此,任何两个人之间的交际都是跨文化交际。这种观点提醒我们应该避免空泛的比较,但是,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应该首先把眼光集中于国别研究,集中于一个国家中的主流文化的研究。

思考题：

1. 在你的日常活动中哪些是比较典型的跨文化交际？
2. 你认为强调个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有什么利弊？
3. 我国的地区文化差异是否可以作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方面？

-
1. L.S. Harms. (1973)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rper & Row. p.8.
 2. Marshall Singer. (1987)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Perceptual Approach*. Prentice-Hall. p.2.
 3. Richard Porter & Larry Samovar. (1988) Approach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Samovar &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5th edn.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p.23.
 4. Ron and Suzanne Scollon. (1995)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Blackwell. p.163.

第二章 跨文化交际学

一、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

跨文化交际学在英语中是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早期也称作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有的学者区分两个术语, 他们认为前者强调过程, 后者强调文化比较, 但是大部分学者不作这种区分。目前使用前者的已占绝大多数。

跨文化交际学首先在美国兴起是合乎逻辑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除了印第安人以外, 其他人都先后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有来自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各国的移民。他们具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他们在相互交际中难免产生问题, 因此, 跨文化交际理所当然地引起学者的注意。在 60 年代, 少数民族——特别是黑人争取自己权利与地位的斗争风起云涌, 民族意识日益增强, 各少数民族都强调维护自己的文化, 于是逐渐地在美国社会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格局。在学校、政府部门、企业、民众团体中如何处理不同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其次, 美国与各国交往频繁, 每年大批政府官员、商人、技术人员、学者奔赴世界各地, 与当地人有各种不同的接触, 而美国每年又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数以十万计的留学生、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和数以千万计的旅游者。对于大批留学生和移民的训练也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许多学者把 Edward Hall 在 1959 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 看作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Hall 是人类学家, 对于文化与交际之间的关系一直予以关注。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 Hall 对于时间、空间与交际的关系作了深入

的探讨,他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使用时间、空间表达意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书中 Hall 对于如何更科学更细致地研究文化提出了一些设想。此后,他又发表了数部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著作。Hall 在跨文化交际学的领域内对于其他学者的影响巨大。

在 Hall 的《无声的语言》一书发表以后,60 年代陆续又有一些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著作问世。例如,1962 年 R.T.Oliver 所著《文化与交际》(*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1996 年 A.Smith 主编的《交际与文化》(*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1967 年 I.Parry 发表的《人类交际心理》(*The Psychology of Human Communication*)等。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

就跨文化交际学在学术领域的地位而言,1970 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国际传播学会承认跨文化交际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在学会下面成立了跨文化交际学分会。言语传播学会确定 1970 年年会的主题为跨文化交际与跨国交际。此后,各大学传播学系、教育系纷纷设立跨文化交际学方面的课程。

1972 年,第一届跨文化交际学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出席人数超过两千,出席人中有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传播学家、社会学家,也有商界、政界人物。1974 年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学会(SIETAR, Society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Training and Research)在美国马里兰州召开首届会议,正式宣布成立。这是跨文化交际学方面最有影响的一个组织。目前这个学会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组织,在欧洲设立了分会。它的名称亦相应改为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学会(SIETAR - International,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Training and Research)。

在 70 年代,美国又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跨文化交际学的书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David Hoopes 主编的一套选读本, Larry

Samovar 与 Richard Porter 合编的《跨文化交际学选读》(*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以及 John Condon 与 Fathi Yousef 合著的《跨文化交际学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到 70 年代中期, 在美国已经有二百多所大学开设跨文化交际学的课程。有的大学甚至授予跨文化交际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大学中, 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不限于传播学系, 在心理学系、教育系、语言学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都有这方面的课程。

这里有一份材料报告了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美国大学中跨文化交际学课程开设的情况。迈阿密大学的两位学者在 1983 年调查了 138 所大学的传播系的开课、教材、教师、作业、考试等方面的情况, 写出了调查报告。他们的结论是:

“最重要的发现是过去几年中这门课程在几个方面都有所发展。Barna 和 Jain 曾经估计, 1978 年有 200 所大学在开设这门课程。假如我们的样本具有代表性, 美国大学中的 17.8% 至少开设一门跨文化交际学课程, 那么, 目前大约有 275 所大学在开设此课。这就是说, 在过去的 6 年中, 这门课程增长了 37.5%。被调查的大学还说明, 在过去几年中, 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人数增加了。这一势头还将继续, 因为 18.1% 的学校表示他们不久将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¹

不同的大学在不同的年级开设这门课程, 但在三年级开设的最多, 占 57.6%, 大部分学生是选修, 占 80%。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来自不同专业, 包括传播学、言语交际、新闻学、教育学、工商管理、社会福利、医护等。教学方法按使用多寡排序, 最多的是讲课, 其次是小组讨论, 以下是个例研究、客座演讲、电影、小组报告、角色扮演、实地调查、录相等。

教学内容按重要程度排列如下:

1. 文化差异及其对于交际的影响
2. 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
3. 跨文化接触及场合
4. 语言及文化, 双语教育及翻译问题
5. 特殊的文化模式及其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6. 非语言交际
7. 内圈和外圈的形成以及民族中心主义
8. 文化休克和文化适应
9. 民族、种族和亚文化
10. 主观文化理论
11. 对不同种族、民族和国家的成见
12. 融合理论

在有些学校的研究生中也开设了跨文化交际学课程。到 70 年代末, 已达到六十多所大学。研究生课程的要求包括:

1. 使学生掌握一套统一的术语与定义
2. 要求学生深入考察文化交际中遇到的某些特殊问题
3. 使学生能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作广泛接触
4. 使学生了解克服文化障碍目前使用的方法
5. 给予学生机会, 使其能够就他所感兴趣的文化作调查、分析和报告²

关于跨文化交际学究竟应该包括什么内容, 我们可以从有些学者的论述中得到启发。Richard Porter 曾列出八个方面, 即态度 (包括世界观、价值观、民族中心主义、偏见、成见等)、社会组织、思维模式、角色规定、语言、空间的组织与利用、时间观念、非语言表达。³ 几年后, Porter 和 Samovar 在另一篇文章中归纳为三个方面, 即观点 (包括价值观、世界观和社会组织)、语言过程 (包括语言及思维模式) 和非语言过程 (包括非语言行为、时间观念和对于空间的使用)。其基本内容并未改变, 但角色规定一条略去。这说明他们深深受了 Marshall Singer 的所谓文

化无非是观察问题的角度的影响。心理学家 Michael Argyle 认为跨文化交际中主要的问题或困难有 6 个方面：1) 语言，包括礼貌用语；2) 非语言交际；3) 社会行为准则，包括赠送礼物等；4) 家庭和同事的关系；5) 做事的动力和动机；6) 思想观念，包括受政治影响产生的观念。Argyle 在这里提到了 Porter 和 Samovar 所没有的提到的社会行为准则以及宗教观念。⁴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对于跨文化交际学的内容人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培训和咨询也逐渐发展起来。例如，美国政府对于和平队员在派出前进行有计划的细致的训练，提高他们的文化敏感和文化适应能力，使他们能够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效地工作。美国新闻总署对于富布赖特学者、教授也进行短期的培训。另外，民间的商业性咨询活动在近二十年以来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二、跨文化交际学在欧洲

跨文化交际学在欧洲发展的比较晚，而且具有不同的传统。总的说来，跨文化交际学与语言学的联系更密切。跨文化交际学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比较近的事情。

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学会 (SIETAR International) 在欧洲的分支 SIETAR Europa 已经存在多年，开过多次会议。学会主席与总部采取轮换的方法：哪一个国家的人担任主席，总部就设在哪个国家。最近的两次会议一次在德国召开，另一次在芬兰召开。除此以外，还有另一个研究跨文化交际的组织在北欧活动，除了平时通过因特网在会员之间保持联系以外，也定期召开国际会议。

在英国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大学比较少。据了解，只有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Luton University 正式开设这一课程。在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Martin Cortazzi 开设此课采取多学科的路

子,与美国一些大学的教法有类似之处。大学中开课少自然不是说英国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方面的问题不予注意。英国人类学家 Malinowski 的《文化论》(费孝通等译,1987 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及其他许多著作对于文化的探讨对我们了解跨文化交际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Raymond Williams 的《关键词:有关社会与文化的词汇》(*Key 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对于英语词汇中有文化内涵的一些词作了追本求源的研究。近年来不少学者在语用学研究中注意到文化因素,例如 Jenny Thomas 对于这个课题研究较多,《跨文化语用失误》一文表达了她的基本观点。她把语用失误分为两种:语用—语言失误 (pragmalinguistic failure) 与社交—语用失误 (sociopragmatic failure)。语用—语言失误指学习者将本族语对某一词语或结构的语用意义套用到外语上造成的语用失误。社交—语用失误指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犯的语用错误,牵涉到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人际关系的远近,人们的权力和义务,与人们的价值观念有关。在我国文化传统中,学生对于教师讲话一般需要用相当尊敬的口吻,但如果把这种讲话方式和内容照搬到英国教师身上就未必恰当。何自然指出:“两类语用失误的区分不是绝对的,由于语境不同,双方各自的话语意图和对对方的话语的理解都可能不同,因而某一不合适的话语从一个角度看可能是语用—语言方面的失误,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能是社交—语用方面的失误……如果我们的售货员把汉语中的招呼顾客用语‘您要点什么?’套到英语中,去招呼操英语的顾客:‘What do you want?’他们就会感到这位中国售货员缺乏礼貌。这里既有语用—语言方面的失误,也有社交—语用的失误。”⁵

前苏联的跨文化交际学主要体现在它的国情语言学方面。在 60 年代末,随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开展以及交际原则在外语教学中的普遍贯彻,在俄语作为外语教学的领域里开始重视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教授与俄语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1967 年 9 月在巴

黎召开的国际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协会成立大会的决议指出：“必须加强俄语教学与国情知识研究的联系。”此后，国情语言学的研究在前苏联引起日益广泛的重视和不少学者的兴趣。曾先后召开过多次国情语言学的学术研讨会，截至目前已出版了二十多本专著、论文集和四部词典。1981年制订了《国情语言学教学大纲》，并在部分学校的教师进修班中开设了这门课程。维列夏金（Е. М. Верещагин）和科斯托马罗夫（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是国情语言学的创始人。国情语言学的重要著作包括维、科合著的《语言与文化》、《词的语言国情理论》，托马欣（Г. Д. Томахин）著《国情语言学的理论基础》等。“他们认为，国情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在语言教学和语言教学法里的运用，以达到语言教学的目的。它一方面包括社会语言学的内容，一方面又包括如何传授语言的民族文化语义，使学生搞清词语的实际所指，词语的文化伴随意义和词语的使用范围等。”⁶从我国学者的国情语言学著作的内容可以大致看出前苏联这一学科的走向。顾亦瑾、吴国华著《语言与文化：俄语语言国情学概论》上编着重论述俄语词语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分析反映俄罗斯民族文化特点的各类词汇（包括动物、植物、颜色词、数字、人名、地名、民俗形象与文学形象等），下编讨论交际文化，包括物质民俗、人生礼仪、交际民俗、身势语。由此可见，国情语言学主要研究词语的文化内涵和涉及交际的风俗习惯。此后，前苏联的国情语言学又有新的发展，重点似已转入对文学作品的语言国情知识分析，着重研究文学名著的篇章及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目前已出版三本这方面的论文集。此外，对比国情语言学的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迄今为止，在欧美的语言学理论中还没有与俄语国情语言学相对应的独立分支，因此在英语中难以找到这门学科的恰当译名。俞约法认为，国情语言学或语言国情学这一术语“十分令人费解，而且未能反映出这个俄语术语的多义性，更未揭示出其最本质的方面”⁷。这门学科既然是与语言使用、语言教学有关的文

化背景的教学，为什么不用“文化背景”而用“语言国情”这一名称呢？俞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前苏联学界好在新建学科名称上标新立异，以区别于西方各国，另一方面，这里确实也包括了宣传前苏联‘国情’的内容。”他提出，根据不同场合应分别使用词语文化（背景）教学、词语文化（背景）学、词语文化（背景）教学法、词语文化（背景）课等名称。

从有关文章看，有三点是清楚的：1) 前苏联的国情语言学与社会科学语言学和交际法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2) 国情语言学主要研究词语的文化内涵，兼及交际文化、身势语等；3) 国情语言学既包括高层次的文化研究，也包括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

三、跨文化交际学在我国

跨文化交际学在我国的历史很短，大致上是从 80 年代初期人们才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在初期，重点在于外语教学以及文化与语言的关系。许国璋先生于 1982 年在《现代外语》上率先发表有关语言与文化的论文：Culturally-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着重讨论了词的文化内涵与翻译的关系。他提出讨论的词汇数量并不多，但是，重要的是他提出在不同的语言中表面上对等的词汇实际上在文化内涵上并不相等。在 80 年代学术刊物上讨论文化差异的文章为数不少。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于跨文化交际很有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交际教学路子在外语教学中的推广，使得人们认识到学习外语必须结合文化。只注意语言的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在专业的外语教学大纲中对于文化知识的授予作了规定。例如，《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中有这样一段话：

“学习外语不仅是掌握语言的过程，也是接触和认识另一种社会文化的过程。因此，要有意识地结合语言教学向学生传授所学语言国家社会文化等国情知识，同时增强学生对两种

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他们逐步具备文化比较能力,以便提高文化素质并得体地进行语言交际。”(第4页)

在教材中对于交际中的文化因素开始注意,有的课本提供文化知识的材料,有的设文化知识注释一栏。

从80年代中叶开始,在我国几个大学开始设立跨文化交际学课程,这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有关跨文化交际的书籍也陆续出版。下面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国内出版的部分著作和论文集。

编 著 者	出版年	书 名	出 版 社
Oatey, Helen(英)	1987	与英美人交往的习俗与语言	上海外语教育
耿二岭	1988	体态语概说	北京语言学院
胡文仲	1988	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	译文
沙莲香	1989	中国民族性(一)	中国人民大学
邓炎昌、刘润清	1989	语言与文化	外研社
陈建民	1989	语言文化社会新探	上海教育
沙莲香	1990	中国民族性(二)	中国人民大学
胡文仲	1990	跨文化交际学选读	湖南教育
布罗斯纳安(美)	1991	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	北京语言学院
顾亦瑾、吴国华	1991	语言与文化:俄语语言国情学概论	河南人民
吴国华	1992	俄语文化背景知识词典	河南人民
路英浩	1992	开放前沿的文化震荡	云南人民
庄恩平	1993	走出误区:中美交际文化差异实例分析	世界图书
郑立信、顾嘉祖	1993	美国英语与美国文化	湖南教育
裘克安	1993	英语与英国文化	湖南教育
胡文仲	1994	文化与交际	外研社
王福祥、吴汉樱	1994	文化与语言论文集	外研社
刘重德	1994	英汉语比较研究	湖南科技

编 著 者	出版年	书 名	出 版 社
戴昭铭	1994	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	北方论丛
关世杰	1995	跨文化交流学	北京大学
邵敬敏	1995	文化语言学中国潮	语文
乔健、潘乃谷	1995	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	天津人民
胡文仲	1995	英美文化词典	外研社
曲彦斌	1996	中国民俗语言学	上海文艺
林大津	1996	跨文化交际研究	福建人民
胡文仲、高一虹	1997	外语教学与文化	湖南教育
贾玉新	1997	跨文化交际学	上海外语教育

从已经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我国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语言与交际的关系;2)非语言交际;3)中西习俗对比;4)中西经营管理模式比较;5)国民性研究。对于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有一些探讨,但是,总的来说,这方面的论著较少。从参与者的学术背景来看,大致上有这样几类:外语教师、对外汉语教师、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等。

1995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召开了我国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与会者中我国学者230人,国外学者四十多人。这是我国首次将跨文化交际作为主要议题的会议。在会上成立了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选举产生了学会的领导机构。会议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1997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会议。此外,北京大学与美国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共同发起举办了1996年8月的研讨会。会议议题是“交际与文化——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1999年将在深圳大学召开第三届中国跨文化交际研讨会。

四、跨文化交际学的多学科性质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在英语中既指跨文化交际这一现

象，又可以指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学科。在汉语中我们作了区分，在指现象时我们称之为跨文化交际，在指学科时称作跨文化交际学。但是这并不是统一的译名。有的学者将它译为跨文化交流，有的译为跨文化传播，有的译为跨文化传通，还有的译为跨文化沟通。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译名呢？原因之一是一门新学科刚建立，学者还未能译名上取得一致。另一个原因是学者来自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因此，在选择译名时不可能不受到自己学科的影响。选择“跨文化交际”的译名的大多具有语言学或外语教学的背景，因为 communication 在语言学中通常译为“交际”。选择“传播”、“沟通”、“传通”的大多具有传播学的背景。

跨文化交际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多学科性质。它的理论与材料来之于众多学科，包括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哲学、文化学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人类学、心理学和传播学。

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对于跨文化交际学的贡献极为突出。在跨文化交际学正式建立之前，文化人类学对于文化的定义、文化与语言的关系、非语言交际等都已经做了很多研究，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创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跨文化交际学建立的过程中，文化人类学也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前面已经提到，Hall 的《无声的语言》被许多学者认作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关于文化的定义，学者们主要是依据人类学家的著作。例如，A. L. Kroeber 与 Clyde Kluckhohn 合著的《文化概念与定义评述》（*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是论述文化定义的经典之作。虽然此书出版于 1952 年，但至今人们仍然经常引用。Edward Sapir 与 Benjamin Whorf 对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提出过一个设想，认为语言对于人们的世界观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对于这个假设的看法不一，但是它的影响却至今不衰。在具体的文化差异方面，跨文化交际学取之于人类学的则更多。人类学家 Ruth Benedict 的

重要著作《菊与剑》(*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对于日本文化的模式做了深入的分析。如果考虑到作者是在从未到过日本的情况下撰写此书的话,则更能看出 Benedict 根底之深。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Hsu)所著《美国人与中国人——通向分歧之路》(*Americans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对于中美文化的差异做了十分全面而透辟的分析。

在心理学领域主要是社会心理学与跨文化心理学对于跨文化交际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心理学家对于人们在从事跨文化交际的活动中不同的心理反应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他们一般采取心理学的实验方法,通过精心设计的调查,收集确切的材料和数据,然后加以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美国心理学家 Richard Brislin 对于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过许多研究,出版了一些著作,在跨文化交际学界具有相当的影响。他的著作《跨文化交往》(*Cross-Cultural Encounters*)收集了近百个跨文化交际中的实例,他对于这些实例先给予几个不同的解释,然后说明为什么某一个解释是正确的。加拿大心理学家 Michael Bond 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对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从事过多年的研究,在跨文化心理研究方面有许多著述。荷兰学者 Geert Hofstede 对于与管理有关的心理从事专门的研究,他的最著名的著作是《文化的后果》(*Culture's Consequences*)与《文化与组织——心灵的软件》(*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文化的后果》是他运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对其雇员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的材料所著的一部书。他在书中提出了研究文化的四个尺度。他提出的研究方法之后被许多学者所使用。1991年他又发表《文化与组织》一书,对于他的论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跨文化交际学界其他有影响的心理学家还包括 Harry Triandis, Dan Landis 等。

传播学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基地。跨文化交际学的建立主要是通过传播学者的努力。他们是举办会议出版刊物的主力。他们运

用传播学的理论对于跨文化交际从事研究,提出一些研究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个领域有影响的学者包括 William Gudykunst, John Condon, Nemi Jain, Stella Ting-Toomey, Young Yun Kim 等。他们定期召开会议,围绕一定议题展开讨论,在会议之后出版论文集,目前已经出版了多集。

在语言学和语言教学领域,早期有 C.C.Fries 和 Robert Lado 提出在学习外语的同时,需要注意目的语的文化。Lado 提出在比较不同文化时应该采取的理论和方法。美国社会语言学家 Nessa Wolfson 对于不同文化中的赞语做了细致的对比。Scollon 夫妇在跨文化交际方面著述颇多,前面已经提到。英国学者 Michael Byram 和美国学者 Ned Seelye, Gail Robinson 等对于在外语教学中如何结合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方法。

由于人们的学术背景不同,因此在进行研究时采取的理论与方法有所不同。人类学家一般采取实地观察、调查访问的方法,他们收集的材料往往生动而丰富。心理学家文章中通常有精确的数据和严密的分析,因此具有更大的说服力。语言学家利用收集的语言材料说明跨文化交际中的问题,一般都很具体。传播学家重视理论,对于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探讨最多。不少学者在从事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时交叉使用几种不同的方法,以取得最好的效果。就跨文化交际学整个领域而论,早期似乎是人类学的影响最大,学者和研究人员从人类学得益最多。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的影响次之。美国加州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在 1991 年做了一项调查⁸。他们给跨文化教育训练和研究学会的 350 个会员发了调查表,其中大约 45% 回答了调查的问题。被调查人大约 20.0% 获得教育学学位, 10.3% 获得跨文化交际学学位, 9.7% 获得言语交际学学位, 6.5% 获得心理学学位, 6.5% 获得文学学位, 5.2% 获得工商管理学位,其余获得其他学科的学位。调查表包括 8 个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调查哪一个学科被调查人认为最有助于跨文化交际学。结果是人类学得分最高 (1.18), 其次是

社会学 (0.74), 以下依次是语言学 (0.69)、心理学 (0.60)、言语交际学 (0.45)、政治学 (0.27)、地理学 (0.06)。

在问及哪个学科的学者在跨文化交际学方面参与最多时, 人类学又占首位, 其次是语言学, 以下依次是言语交际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地理学。

学科	平均分	标准差
1. 人类学	1.97	1.03
2. 语言学	2.24	1.06
3. 言语交际学	2.59	1.23
4. 社会学	2.61	1.01
5. 心理学	2.77	1.07
6. 政治学	3.07	1.13
7. 经济学	3.50	1.31
8. 地理学	3.59	1.08

注: 1 分为最高分, 表明参与最多, 5 分为最低分, 表明参与最少。

在问及哪个学科的课程最有帮助时人类学再次占据榜首, 以下是语言学、社会学等。

学科	平均分	标准差	选课百分比
1. 人类学	1.27	0.61	72%
2. 语言学	1.51	0.75	48%
3. 社会学	1.78	0.81	76%
4. 言语交际学	1.87	0.85	54%
5. 心理学	2.01	0.89	83%
6. 地理学	2.01	0.98	38%
7. 政治学	2.25	0.91	66%
8. 经济学	2.73	1.03	52%

注: 1 分为最高分, 表明最有帮助, 5 分为最低分, 表明帮助最小。

调查最有趣之处在于, 尽管传播学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基地, 传播学者在跨文化交际学领域最为活跃, 出版的书籍和刊物最多, 但是教师和研究人員一般认为对他们最有帮助的是人类学和语言学。

1998 年在美国加州召开的一次跨文化交际国际研讨会上, 新墨西哥大学的 William Hart 的论文“跨文化关系研究中的多学科影响”对于哪一个学科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影响最大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IJIR) 1983—1996 年间所刊载的文章和书评中的引文共 13,006 条做出分析, 找出在跨文化关系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学者、书刊和大学。作者说明引证并不总是正面的, 可能也有反面的, 但至少说明文章作者在一个方面受到的影响, 因此它是客观可信的。Hart 不同意前面介绍的 Harman 与 Briggs 1991 年的调查结果和调查方法。依据 Hart 的调查, 在跨文化关系研究中心理学的影响占第一位, 以下依次是传播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最有影响的前十位作者(即被引证最多的作者)是 Gudykunst, Triandis, Brislin, Ruben, Hall, Hofstede, Kim, Hammer, Furnham 和 Landis. 其中四人是传播学教授, 五人是心理学教授, 一人是人类学教授。最有影响的前十本书是:

Landis & Brislin (eds.),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Training*, 1983.

Samovar &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1972) 1994.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1980.

Brislin,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1981.

Brislin, *Cross-Cultural Orientation Programs*, 1976.

Hall, *Beyond Culture*, 1976.

Brislin, Bochner & Lonner,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Learning, 1975.

Triandis (ed.), *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79.

Furnham, *Culture Shock*, 1986.

Furnham, *Cultures in Contact*, 1982.

这两项不同的调查结果可能是由于调查者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说心理学和人类学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里涉及到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即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究竟是什么。跨文化交际学既然是跨学科、多学科的性质，那么，它就不可能只有一个理论框架和一种研究方法。具有心理学背景的学者在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时必定会借助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传播学教授在研究跨文化交际时必定会从传播学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指导所有的跨文化交际学者。跨文化交际学方面的论著以及国际会议上的论文都证明了这一点。

小结：

跨文化交际学的历史比较短，大致上只有三十多年。它在美国产生是出于客观的需要，是为了解决美国在国际和国内在跨文化交际方面遇到的问题。美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与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的关系更密切。跨文化交际学在欧洲的历史更短，影响也比在美国小得多。在欧洲，跨文化交际学与语言学的关系似乎更紧密。跨文化交际学在我国只有不到20年的历史，参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主要是外语教师、对外汉语教师、语言学家和一部分心理学家。

跨文化交际学具有多学科的性质，它的理论主要取之于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等。正是由于它的多学科性质，它没有一套一成不变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思考题：

1. 跨文化交际学为什么产生在美国？
2. 在我国为什么是一批外语教师首先对于跨文化交际学感兴趣？
3. 跨文化交际学主要和哪些学科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
4. 跨文化交际学为什么没有大家一致接受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1. Steven Beebe and Thompson Biggers. (1984) The state of the basic cours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t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d 246 513. ("Ed" stands for Eric Documents.)
 2. Calvin Smith. Teach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n the graduate level. Ed 130 351.
 3. Richard Porter. (1972) An overview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Samovar &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1st edn.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4. Michael Argyle. (1988)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Samovar and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5th edn.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5.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228页。
 6. 张中华：对开展国情语言学研究的几点思考，《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25页。
 7. 俞约法：“语言国情学”再议，《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9页。
 8. Robert Harman and Nancy Briggs. (1991) SIETAR Survey: Perceived

Contribution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IJIR*, Vol. 15, pp. 19-28.

第二部分 基本概念：文化与交际

第三章 文化的定义与特性

一、文化的定义

1. 文化的定义为何重要

关于文化定义的讨论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引起很大的兴趣，延续很长的时间，至今也没有什么结论。为什么我们在本书中要用比较多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在跨文化交际学中文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时，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文化对比。如果对于文化的理解不同，对比不可能准确，甚至对比的事物可能不同。因此，在讨论跨文化交际的某些具体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文化究竟是什么。

其次，在研究任何学科前，术语的界定是前提。术语界定的准确与否关系到学科本身的科学性和精确性。我们不能设想对于重要的概念不界定就可以进行实质的讨论。

第三，对于文化定义的讨论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文化的性质和特点。各学科的学者对于文化都企图给予准确的解释。他们的解释带有本学科的特色，也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因此，讨论文化的定义不仅是对于文化一词应如何理解的问题，同时，也是深入了解文化本质所必需。

2. 对于文化定义的一般性讨论

文化一词在近年来使用十分频繁，学者们讨论我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东西方文化比较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报纸上介

绍和讨论“企业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等等。尽管人们都使用“文化”这个词，但对于它的含义的理解并不相同。

正是由于“文化”一词使用的频率很高，使用的范围很广，因此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十分丰富，界定它的意义也就变得比较困难。

远在本世纪初，我国学术界对于文化就有不同的界定。有的定义比较宽泛，例如，梁漱溟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文化之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有的定义比较狭窄，例如，陈独秀认为，文化的内容“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

《现代汉语词典》对于“文化”是这样解释的：

1) 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2) 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

3) 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

定义2和3与我们的讨论关系不大，可以略去不谈，定义1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泛指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另一方面又特指文学、艺术、科学等。8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的讨论也涉及文化的定义问题，大体上，也是两种趋向。一种是广义的界定方法，认为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独特创造，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一种是狭义的界定方法，把文化当做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成果。对于文化的界定大致上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的：1) 从人学的角度，强调文化的本质关系到人的本质，文化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基本形态，本质上是与自然相对的人造物，文化的本质是创造。2) 从

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界定,强调文化是生产力,是信息和知识,是一种文化心态和符号系统。3)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界定,强调传播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

主张文化是人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者,又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物质文化,它是经过人的主观意志加工改造过的。第二个层次主要包括政治及经济制度、法律、文艺作品、人际关系、习惯行为等。第三个层次是心理层次,或称观念文化,包括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宗教感情和民族心理等。¹

在英语中, culture 也是一个难以解释的词, Raymond Williams 认为: culture 是英语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据他分析,一个原因是这个词在欧洲几种语言中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历史演变,另一个原因是它在几个不同的学科中都作为重要的概念使用。据 Williams 分析,目前, culture 主要用于三个范畴:

- 1) 用以描述知识、精神、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
 - 2) 表示一种生活方式,不论是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体或者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
 - 3) 用以描述智力,特别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和成果。²
3. 关于文化定义的学术性探讨

人类学家——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家一向重视文化,对于文化的定义作过许多探讨,但探讨最深的当推 A. Kroeber 和 Clyde Kluckhohn。他们在 1952 年发表了一本专门研究文化定义的著作:《文化概念与定义评述》。在书中,他们列举了近三百个文化定义,对于文化一词的意义做了历史性的回顾,并对于各种不同的定义作了评述。尽管此书出版在四十多年之前,它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人们仍然经常引用他们的论点。可以说,直到目前仍然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超过他们对于文化定义的论述。

我国学者在讨论文化时虽然不时提到此书,但一般都未涉及书的具体内容,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作较详实的介绍。

Kroeber 和 Kluckhohn 收集了自 1871 年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对于文化所下的定义,其中包括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在书的第二部分,共列举了 164 个定义,此外,在第三部分以及脚注部分,还涉及一百多个定义,总计近三百个定义。有些定义是学者、专家经过冥思苦想反复探讨以后正式提出的,有些则是在论著中顺带提到的,另外,还有一些不完整的定义。因此,这 300 个定义并不具有同样的价值和分量。Kroeber 和 Kluckhohn 将这些定义划分为六类:1) 列举描述性的;2) 历史性的;3) 规范性的;4) 心理性的;5) 结构性的;6) 遗传性的。³

Kroeber 和 Kluckhohn 对于不同的文化定义作了分类和评述:

1) 侧重描述的定义:例如, Wissler 在 1920 年所作的定义:文化是“所有的最广义的社会活动,包括语言、结婚、财产制度、礼仪、工业、艺术等。”Dixon 1928 年对于文化的定义是:“一个民族的活动、风俗和信仰的总和。”Boas 1930 年对于文化的定义是“文化包括了一个社区社会习惯的所有表现形式,个人受到社会习惯的影响所作的反应以及由这些习惯所决定的人类活动的结果。”Linton 1936 年将文化定义为:“社会成员通过学习或者模仿而获得的思想、规定性的感情反应以及习惯行为模式的总和。这些思想、反应和行为模式为社会成员在不同程度上所共有。”Malinowski 在 1944 年提出:“文化明显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包括工具和消费品,不同社会团体的共同的宪章,以及人类的思想和技艺、信仰和风俗。”Kelly 和 Kluckhohn 1947 年的定义是:“文化作为描述性的概念一般说来指人类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包括书籍、绘画、建筑等等,指适应我们的环境——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方式的知识,也指历代积累起来的语言、风俗以及礼仪、伦理、宗教和道德体系。”

2) 侧重历史传统和社会继承的定义:Sapir 认为:“文化……是社会继承的行为与信仰的总和,它决定着我们生活的性

质。”(1921) Bose 认为:“我们可以把文化描述为人群共有的能够代与代相传、国与国相传的行为。”(1929) Malinowski 的观点是:“社会继承是文化人类学的最重要的观念。通常它被称为‘文化’……文化包括继承下来的实物、东西、技术过程、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1931) Linton 1936 年的论述是“社会继承称为文化。作为一个一般术语,‘文化’指人类社会继承的总和。作为一个特殊术语,‘一种文化’指某种特殊的社会继承。”Davis 和 Dollard 认为:“人群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社会继承。作为成年人的人行为有别,因为他们的文化不同。他们出生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们必须按照这些方式生活,对此他们没有选择。”(1940) Kluckhohn 1949 年提出的定义是:“在人类学中文化指一个人群的整个生活方式,个人从群体中获得的社会遗产。”

3) 侧重规范性的定义: Wissler 1929 年的定义是:“社团或部落的生活样式被认为是文化。……它包括所有的标准化的社会程序。”Bogardus 1930 年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集团过去和现在做事和思考问题方式的总和。它是传统(传承下来的信仰)和风俗(传承下来的程序)的总和。”Klineberg 1935 年论述道:“(文化)适用于由社会环境决定的整个‘生活方式’。”Linton 1945 年的定义是:“文化指任何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Herskovits 1948 年对于文化的定义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而一个社会是遵循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有组织的集合体。简单的说,社会由人组成,而他们行动的方式即是他们的文化。”Kluckhohn 1951 年的论述是:“一种文化指一个人群的具有特点的生活方式,指他们的整个的生活设计。”

4) 从心理学角度下的定义:在这一组中,一部分定义侧重于适应,把文化当作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例如, Dawson 1928 年的论述是:“文化是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是人对于他的自然环境和经济需要的一种特定的适应方式。”Ford 1939 年的定义

是：“文化作为规定人类行为的条例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他在1942年提到：“文化由解决问题的传统方式组成。文化由被人们接受的各种答案组成，因为这些答案是成功的。简言之，文化由通过学习获得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组成。”Kluckhohn 和 Leighton 在1946年的论断是：“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存在，人类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被他们生理机能和客观世界的某些现实所限定。但是，就多数问题来说，总有若干可能解决问题的方式。每种文化都包含一整套习惯的传统的思维感觉和反应的方式，这些方式是一个特定社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解决问题的特殊方式。”Piddington 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定义为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的装备的总和，他们使用这些装备满足他们的生理和社会需要，使他们自己能适应环境。”

这一组中另一部分定义强调学习，例如，Hart 和 Pantzer 1925年的论断是：“文化由通过模仿或学习而传播的行为模式所组成……文化包括所有的通过社会获得和传播的行为模式。”Benedict的论断是：“文化作为社会学术语指学习到的行为，这种行为不是生而有之，不是由他的细胞所决定的像黄蜂或蚂蚁的行为那样，而是必须由每一代从头向成年人学习才能得到。”(1947) Hockett 认为：“文化指的是人所有的那些习惯，因为这些习惯是从其他人那里（并不一定是一成不变地）学到的。”(1950)

5) 从结构的角度的定义：1929年 Willey 对于文化作过这样的界定：“文化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习惯反应模式系统。”Kluckhohn 和 Kelly 1945年的论述是：“文化是历史上产生的明显的或暗含的对于生活的设计，这些设计为所有的或特定的社会成员所共有。”Gillin 认为：“文化由具有一定模式的功能上相互联系的风俗所组成，这些风俗是组成特定社会组合或类别的特定的人所共有的。”(1948)

6) 从遗传的角度确定的定义：Folsom 的定义是：“文化是

所有人为了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人类创造并代代相传的一整套工具和生活习惯。”(1928)Huntington1945年所下的定义是:“文化指所有由人类产生或创造的、并传给别人特别是下一代的实物、习惯、思想、机构以及思想或行动的模式。”Murdock则提出:“学习和社会的互动在每个人群中产生一组由社会传承的适应性的行为,这些行为似乎是超越个人,因为它是大家共享的,因为它的延续超出个人的生命范围,而且也因为它的质与量都大大超出个人单独努力所能达到的程度。文化一词指的是这样一些学到的、传承下来的行为系统。”(1949)

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定义是由于学者们分属不同的学科。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力求找到一个全面的能够概括一切的定义。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定义带有自己学科的特点,因此,别的学科的学者无法接受。于是,这些学者又提出自己的定义。结果是定义越来越多,似乎没有一个定义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细致分析起来,又可以看出这些定义之间存在着不少共同点。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了解文化究为何物,同时,对于我们了解文化的复杂性也有很大的帮助。

在Kroeber和Kluchhohn的重要著作出版以后,人们对于文化定义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学者们还不断提出新的定义。当代的一些学者对于文化的定义也做了许多探讨。Porter和Samovar对于文化是这样界定的:

“文化是一个大的人群在许多代当中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获得的知识、经验、信念、价值、态度、角色、空间关系、宇宙观念的积淀,以及他们获得的物质的东西和所有物。文化表现于语言的模式以及活动和行为的样式,这些模式和样式是人们适应性行动和交际方式的样板,它使得人们得以在处于特定的技术发展阶段、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理环境的社会里生活。”⁴

这个定义企图把文化的外延尽可能地扩大，因此，在知识、信念、价值之外，又加了态度、角色、空间关系和宇宙观念等。另外，它特别把语言的模式加进去，与行为的样式放在等同的地位。至于他们所说的“人群在许多代当中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获得的……积淀”和 Kluckhohn 所说的“社会遗产”是大致相同的意思。

研究实际问题的学者也试图对于文化做出自己的解释，David Brown 这样界定文化：

“文化是占据特定地理区域的人们共同所有的信念、习惯、生活模式和行为的集合体。他们的文化……对于日常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给予答案：例如，吃什么，不吃什么，穿什么衣服，怎样向邻居打招呼，怎样对待敌人，怎样对待工作，怎样玩等等一简而言之，就是在碰到生活中的问题时怎么办。文化帮助我们解释宇宙，说明宇宙的来源，以及由谁来主宰，它说明人与上帝的关系，解释自然的变化无穷并且常常是令人害怕的现象。简言之，文化是群体的多数—假如不是全体的话—所接受的生活的指南。”⁵

荷兰学者 Geert Hofstede 在他的《文化与组织》一书中把文化称为“心灵的程序”（mental programming）和“心灵的软件”（software of the mind）。他认为，文化之于人犹如程序之于计算机。计算机的运行依靠软件，程序怎样写，计算机就怎样运行。文化就像事先写好的程序一样，决定人的行动。人若想脱离自己的文化而行动，就像计算机不按软件运行一样困难。但他同时又指出，“人的行为只是部分地被他的心灵程序所决定：他具有偏离心灵程序的基本能力，具有按新的、创造性的、破坏性的或出其不意的方式行动的能力。这又是人和计算机不同的一

面。”⁶Hofstede 又将文化区分为第一种文化和第二种文化，他说：“在大多数西方语言中 culture 通常的意思是‘文明’、‘教养’，特别是指像教育、文学、艺术这类的教养。这是狭义的文化，有时称为‘第一种文化’。作为心灵软件的文化是这个词的广义用法，社会人类学家通常这样用，这是‘第二种文化’。”有的文化学家把他所说的“第一种文化”称为大写 C 的 Culture (Culture with a big C)，把“第二种文化”称为小写 c 的 culture (culture with a small c)。

4. 我们所使用的文化的定义

学者们提出的有关文化的定义包含了许多合理成分，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人类学家 Edward Tylor 远在 1871 年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定义仍然是涵盖面最广、最精确的定义之一。他的定义具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著名定义是：“所谓文化和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

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强调的是知识、习俗、能力、习惯等，而不是具体的实物。

Kluckhohn 和 Kelly 提出的简明的定义是：“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⁷这个定义虽然简短，但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内容：文化是社会的遗产，而不是生理遗传；文化是群体共享，而不是个人的行为；文化是一种生活式样，包括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可以看到的，也有人们不易看到的。

Kluckhohn 关于文化的另一个定义是：“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型的和隐型的，包括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⁸在这里他指出文化具有

相对性和文化作为人们行动的指南这两个重要概念。

在本书中我们不妨把 Kluckhohn 的定义作为我们对于文化的定义。

概括以上的各种定义，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一些看法：

1) 文化是人们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是社会的遗产；

2) 文化既包括信念、价值观念、习俗、知识等，也包括实物和器具；

3) 文化是人们行动的指南，为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

4) 文化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后天所学会的；

5) 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可以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念区分不同的文化。

文化的定义对于我们了解文化的基本性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下一节中在我们讨论文化的特性时，文化定义所揭示的有关的内容仍将占据重要的位置。

二、文化的特性

1. 文化是人类所独有的，是区别人类和动物的主要标志。
文化是社会遗产，而不是生理的遗传

动物的一些能力是它们的本能。例如，候鸟随着季节的变化，一起成群结队地飞过大路，穿越海洋，改变原来的栖息的地点，这完全是凭着本能。实验证明，它们具有先天的、根据星辰判断正确方位的能力。

日本人类学家祖父江孝男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是人能够学习，而动物不能学习。许多例子都说明动物也能学习，实验证明，猫抓老鼠并非出于本能，而是由于学习的结果。有人把刚出生的小猫分成三群，每群 21 只，第一群小猫和老鼠一起喂养，第二群小猫单独饲养，第三群小猫和母猫一起饲养。实验的结果是，第三群中的 18 只小猫都变得喜好抓老鼠，第二群中能抓老

鼠的只有4只，而第一群中只有3只。这说明小猫抓老鼠的行为是学习的结果。祖父江孝男认为只有人类具有语言，而最优秀的类人猿也没有语言中枢。动物没有语言，因此信息的传递受到很大的限制。美国动物心理学家 Crawford 作过黑猩猩的实验，发现两只黑猩猩通过试错法能够学会协作一起拉一根绳子，把食物拽到笼子里来，但是当实验者换进来另一只猩猩时，两只猩猩就无法合作，原先在笼子里的猩猩不管作什么样的信号和姿势去吸引新来的猩猩的注意，两只猩猩都无法合作，同样的试错过程需要再重复一段时间，两只猩猩才能学会协同动作。而人若处于同样的情况下就会用语言把原来已经取得的经验传达给同伴。正是由于人类有了语言，人类知识才得以积累，文化才得以传承。

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人们通过口头将自己的经验、知识、信仰、观念等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在有文字的社会，人们通过各种著作、法规、经典、文学艺术等将文化代代相传。家庭、学校、社会集团、大众传媒都是传播文化的途径。正由于文化是代代相传，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包含了以往文化的积淀。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于文化的传承是这样说的：

“人靠了他的抽象能力和象征体系，不但积累了自己的经验，而且可以累积别人的经验。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⁹

2. 文化不是先天所有，而是通过后天习得的

一个人具有什么文化并不取决于他的种族，而是取决于他生活的文化环境。Roger Keesing 指出：“通过文化学习，一个婴儿可以变成部落民，或印第安农夫，或纽约曼哈顿公寓里的居民。

饥、渴、性等生物性驱力，都永无止境地受到文化习尚的再塑造和重整。”¹⁰不仅语言、习俗、风尚、信仰是通过后天习得的，而且连一些表面上看来是生而有之的现象实际上也是在社会中习得的。例如，人的姿势和动作有许多是和文化相连的。祖父江孝男以日本人的例子作了说明：“日本人在说什么的时候，几乎没有一边作手势，一边晃动肩膀的姿势，可是，如果变成美国人，他们则一边伸开双手耸动肩膀，一边说话。同样地具有日本人血统，然后却出生在美国，并且在美国养育成长的第二代日本人，则仍然显露出美国人式的耸肩姿势。”¹¹

Kluckhohn 曾经举过一个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人的例子。有一个在中国家庭养育成人的美国人初次回美国，记者们注意到除了他的蓝眼睛和黄头发证实他是美国白人以外，他的一举一动，走路的样子以及脸上的表情全都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样子。

墨西哥农民习惯蹲着的姿势，但是美国人却很习惯于蹲，甚至于教育儿童蹲着的姿势不雅。在我国有些地区的农民习惯于蹲的姿势，在有凳子的情况下，甚至宁可蹲在凳子上，也不坐在上面。坐或蹲似乎是与文化无关的动作，但人们选择什么姿势实际上是由各自的文化所决定。

人的饮食习惯和口味也是后天获得的，一个民族所厌恶的食物可能是另一个民族的佳肴。中国人一般都不喜欢吃奶酪，而奶酪却是欧洲人的日常食品，有些奶酪还带有一种发臭的气味，中国人吃不下去，而欧洲人却视为珍品。有些部族不吃鸡蛋和鸡；另一些部族不仅吃鸡蛋，而且喜欢吃臭蛋。大部分人对于把昆虫当饭吃感到恶心，但澳大利亚土著人把树里的一种毛虫当作美味。

有些生理性的动作似乎与文化无关，例如，打喷嚏是一种生理现象，但在英美人中却有说 God bless you（上帝保佑你）的习惯，广东人也有说“吉星”的习俗。打喷嚏是不需要学习的生理现象，但在别人打喷嚏之后你应该说什么却是需要学习的。也就

是说，人们在生理现象的外面裹上了一层文化的外衣。

疼痛是人类共有的生理反应，但是在疼痛时人们如何表现却因文化而异，这是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父母教给孩子不同的行为模式。因此，对于疼痛的反应方式是人们后天学会的。有人对于患同一疾病的不同民族的病人作过调查，发现犹太人和意大利人自由地谈论和抱怨他们的疼痛，毫无顾忌地用呻吟、呜咽和哭叫表示他们的痛苦。他们对这种外露并不感到难堪，因为他们在成长时期，父母——特别是他们的母亲——对于他们的健康表现出特别的爱护和关心，经常劝他们不要作这个，不要作那个。委屈时哭叫会很快得到父母的同情和关心。调查发现，“老美国人”（指早期从英国或北欧迁居美国的移民）病人对于疼痛很少有情绪激动的抱怨，当疼痛变得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他们表示希望自己能单独呆在一个地方，然后无所顾忌地呻吟。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家庭中，父母常常告诉孩子不要什么事情都找大人，有疼痛时要能忍耐，要像男子汉那样对待疼痛。

不仅儿童可以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年人也可以有意识地吸收异民族的文化，我们注意到学习不同语言的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学习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学习英语的学生在课堂上常常表现比较放松，讲话比较随便。而学习日语的学生往往在课堂上站立时身体笔直，并且常深深鞠躬。学习阿拉伯语的学生在课堂上讲话的声音都比较大，比学习英语的学生的声音要大得多。同样，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也学习了不少中国的习俗。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常常融合和渗透。汉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是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汉唐时期是中国文化昌盛的时期，这一盛况的出现就是由于大规模的文化输入，使中国文化处于“坐集千古之智”的佳境。张岱年说：

“中国今日已经广泛地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就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来说，除了食还保留了中国烹调以外，衣着、住房、交通工具都已不同程度地西化了。这正是中西文化融合的表现。就艺术和科学等精神生活来说，“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已经在中国生根了。医学则中西医学各具特色，共同为人们的健康作出贡献。中国绘画、音乐与西方的绘画、音乐是同时并存。这呈现了丰富多彩的状况。”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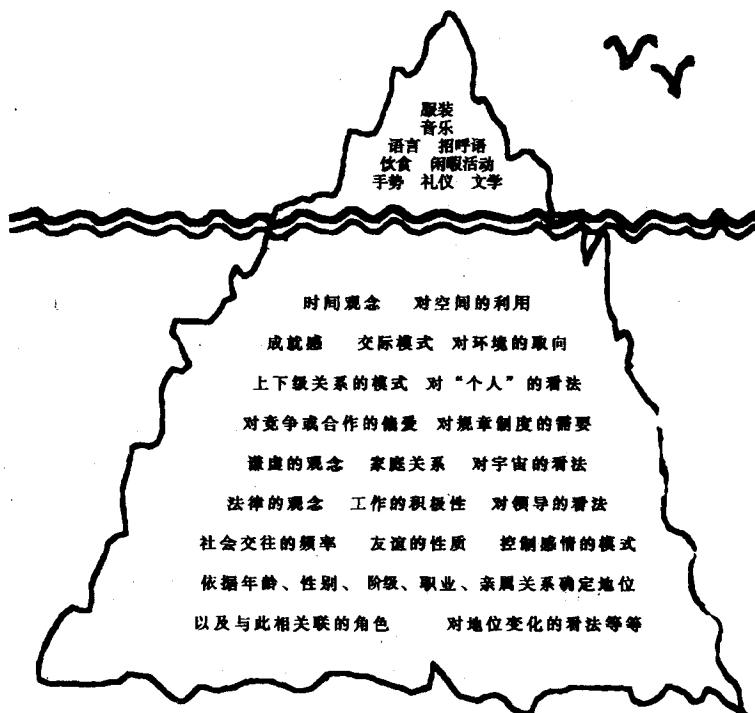
Ruth Benedict 指出：“在世界范围内，自从有了人类历史，无数事实表明人们能够将另一种血统人们的文化据为己有。在人类的生理机制中没有任何东西会使这一过程产生困难。人的生理机制并没有在细节上规定人必须采取某种特定的行为。”¹³

3. 文化中的大部分是不自觉的

研究文化的困难之一在于文化的大部分存在于人的潜意识中。人们在行动时并不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在支配着自己。相反，却觉得一切都十分自然，如同人呼吸氧气一样，只是在人们缺氧时，才会突然感到氧气的重要。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的许多方面都视为当然，只是在与异文化接触时，才会感到自己文化的独特之处。

Kluchhohn 指出文化中有的显型的，有的是隐型的。实际上，文化中的许多部分都是隐型的，有的学者把文化比作冰山，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而我们没有看到的却是大部分。

从下一页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只有服饰、食物、建筑、文学艺术作品、科学技术的成果等可以看到，并立即联系到某种文化，而牵涉到习俗、观念、信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世界观等等都是我们看不到的。正因为如此，人们若问我们什么是中国文化，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文物古迹、中国的烹调、经典文学作品、各种节日庆祝的形式等等，我们可能想不



到我们日常的行为中充满了中国文化。我们不会认为我们每天早上和亲人、同事、邻居打招呼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自然更想不到我们和朋友、同事、领导的关系是由我们的文化所规定。至于我们的信仰、看法、价值观、世界观则更是摸不着看不见的。

4. 文化是人们行动的指南

Hofstede 把文化比作心灵的软件，也就是说文化支配着人的行动。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我们的文化所规定的。我们的衣食住行无一不是在一定的文化约束之中。我们不仅在不同的季节穿着不同的衣服，而且在不同的场合衣着也很不一样，例如，在庄严的场合穿着比较正式，在郊游时穿着比较随便。

在西方葬礼上人们穿深色的衣服，如果有人穿着鲜艳，人们

一定会觉得奇怪,甚至会认为此人神经可能不正常。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样看?这是因为人们头脑中有一套规范,而这些规范就是文化。至于我们的饮食习惯则更是文化所决定的。人感到饥饿,这是生物现象,但什么时候吃、吃什么、怎样吃则是文化范围内的事。一日三餐似乎是天经地义,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现象。有的种族由于生活方式不同,并不是一日三餐,而是一两天才吃一餐。在狩猎到猎物时饱吃一顿,此后一两天可能什么都不吃。吃什么不吃什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们的文化所决定的。朝鲜人喜欢吃狗肉,而大部分西方国家的人不吃狗肉。不仅不同的民族在饮食习惯上存在区别,地区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十几年前北京人还不吃鸡爪,一般都弃之不用,但近年来由于粤菜的影响,鸡爪已经成为餐桌上的珍品,并改称为凤爪了。Kluckhohn指出:“有些浆果是有毒的,这是生物事实,但几代人之前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西红柿有毒,这是一个文化事实。”¹⁴他在同一本著作中的另一处又说:“文化在每一个环节都规定着我们的生活。从我们诞生到我们死亡,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在我们身上都经常有一种压力,逼迫我们遵循别人为我们创造的某些行为方式。有些方式我们乐意遵循,有些方式我们遵循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其他选择,而还有的方式我们偏离而去但又极不情愿地重新接受。幼儿的母亲知道所有这一切最终为孩子所接受是多么不自然的一个过程。”¹⁵

5. 文化是动态的,文化的形态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

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同时又是不断变化的。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国的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情况下,文化的变化就更快。例如,在五四运动前后,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我国的文化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人们的服饰、生活方式、语言、风俗习惯或是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动。旧时我国有磕头、作揖的礼仪,以后又有鞠躬礼,一直延续到现在。握手是比较新的方式,在边远偏僻的

农村，不少年纪大的农民直到现在还不习惯握手的礼俗。

人们一般认为英国是十分注重礼仪的国家。男士很讲绅士派头。实际上，在历史上也有过并不文明的习俗。在 18 世纪人们在咖啡馆喝咖啡时，常常高谈阔论，情绪激动，不少人在争论时有抓住对方上衣扣子的习惯，以至于常常把扣子抓掉，因此，有人在做衣服时事先请裁缝准备很多富余扣子。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有人专门在《卫报》上著文批评这种现象。¹⁶在维多利亚时代，上层社会的妇女不能裸露腿部，因此，妇女都穿着长裙。有的家庭把这个习俗加以引申，甚至把桌子腿也用布裹起来，以免引起不雅的联想。这些例子说明习俗具有时代特征，并非始终不变。

三、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地位

我们研究跨文化交际主要是研究文化、交际、文化与交际的关系、在交际过程中容易产生问题的领域以及如何提高跨文化意识等课题。贯穿这些课题的主线就是文化，因此，可以说文化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而由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研究跨文化交际就必定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文化既包容历史又反映现实；既包括实物，更包含制度与观念；既有客观存在的稳定性，又有它的能动性；既有涵盖一个群体的特点，又包含地区差异与个体差异。

具体说来，哪些文化因素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影响比较大呢？似乎可以包括以下这些方面：

- 1) 一个民族的历史
- 2) 一个民族的传统
- 3) 宗教思想
- 4) 价值观念
- 5) 社会组织形式
- 6) 风俗习惯

7) 政治制度

8) 社会发展阶段(工业化程度、科技水平等)

以我国人民为例,在我们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人交际时,不论我们的职业、性别、年龄、籍贯或教育水平,我们的行为模式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历史积淀的影响,受到儒家文化、佛教思想、家族观念、群体主义的影响。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对于我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都有十分明显的影响。中国社会本来就是群体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但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种群体主义又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内容,其表现形式也与以前不同。

我们讨论跨文化交际不可能涉及所有的文化因素,只能讨论一些侧面,而把其他留给历史、哲学、社会学的学者来研究。

小结:

文化的定义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同时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学者们之所以提出数以百计的定义,首先是由于文化本身涵盖面广,其次,也是由于学者们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我们可以把文化定义为“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形式,包括显型的和隐型的,包括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

文化是人类所独有的,它是社会的遗产,而不是生理的遗传。它是后天习得的,而不是先天所有。文化的大部分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为人们所不自觉。文化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指导着人们的一切行动。文化有传承的一面,也有变化的一面。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文化是核心。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因素包括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宗教、价值观念、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社会所处于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等。

思考题：

1. 为什么文化会有这么多的不同定义？
2. 你认为哪几个定义对于你了解文化的内涵有帮助？
3. 你同意哪一种定义？为什么？
4. 文化具有哪些特点？认识这些特点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5. 为什么文化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
1. 于靖：《文化概念研究》，《哲学动态》，1987年。
 2. Raymond Williams. (1983)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Fontana Press. p. 87.
 3. A. L. 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 (1952)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p. 1-139.
 4. Richard Porter and Larry Samovar. (1988) Approach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Samovar and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Wadsworth. p. 19.
 5. David Brown. (1978) Guides and principles for the consultant in cross-cultural assistance. In Gordon Lippit & David Hoopes, *Helping Across Cultures*.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s Foundation. p. 21.
 6. Geert Hofstede. (1991)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McGraw-Hill Co. p. 4.
 7. 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19页。
 8. 覃光广等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9.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16-17页。
 10. 北晨编译：《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24页。
 11. 祖父江孝男：《简明文化人类学》，作家出版社，1989年，60页。
 12. 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前途何在”，《文史知识》，1987年，第1期。
 13. Ruth Benedict. (1934) *Patterns of Culture*. Houghton Mifflin. p. 14.
 14. Clyde Kluckhohn. (1949) *Mirror for Man*. New York: Whittlesey

House. p.27.

15. 同注 14, p. 31.

16. *The Guardian*. June 13, 1713.

第四章 交 际

一、交际与传播

我们在这本书中一直使用“交际”一词，但是，在这一章我们需要介绍另一个词，即“传播”。这两个词来源于同一个英语词汇 communication。因此，无论是用“交际”或是用“传播”，实际上讲的是同一个概念。之所以在汉语中使用了不同的词汇，主要是由于学者们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有语言学背景的学者大多使用“交际”一词，而从事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都采用“传播”一词。由于本章的学术观点和材料主要来之于传播学，因此，我们采用传播学所用的术语和分类方法。

长期以来，我国有新闻学，但是没有传播学。在“左”的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时，传播学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传播学才进入我国大陆。但是，在60年代传播学研究在台湾和港澳已经开始。估计，传播学这个词在港台首先使用，之后才传入内地。例如，徐佳士在60年代出版了台湾第一部传播学理论著作，称作《大众传播理论》，此外，尚有阎沁恒的《大众传播研究方法》、杨孝荣的《传播统计学》等。¹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于1978年7月出版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1期郑北渭的译文《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中开始使用“传播”一词。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国际新闻界》第2、3、4期连续刊载了张隆栋的文章《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正式使用“大众传播”一词。同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持召开了第一届传播学学术讨论会，说明传播学在我国已初步确立。²对于 communication 一词究竟应该如何翻

译,学者们有过许多考虑。从词源上讲,communicate与common相同,具有“共同”、“共享”的意思。从学科定义讲,communicate包括“传”与“受”两个方面。而“传播”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广泛散布”,例如,传播花粉、传播先进经验等。似乎更着重由一方交给另一方的意思。因此,人们对于“传播”是否准确地表达了原词的意思发生怀疑。沙莲香认为:“从信息科学的角度考察communication应该译为传递。我国在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中,将communication译为传播,已约定俗成。”³张国良也同意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问题,他还认为现在所用的词义已经比原有的词义有所扩大。他说:“很明显,汉语中的‘传播’概念在这里被改造、被扩张了。”⁴苑子熙认为也不妨称作“传学”,但是,最后他也接受传播学这个术语,把他的著作称作:《应用传播学》。他说:

是叫“传播”,还是叫“传”,在我们的同志中还有不同意见。但是双音词“传播”说起来和听起来顺口顺耳一点,于是,多数人就约定俗成叫传播了。其实叫“传学”比叫“传播学”更确切些。⁵

“传播”在用于大众传播时是比较适当的,但是,在用于人际传播时就显得有些勉强,而在用于内向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时就令人费解了。一个人自言自语或是在心里琢磨事情如何能称为“传播”呢?难怪有的学者在不同情况下把communication分别译为“交流”、“沟通”和“传播”。⁶尽管译名不尽善尽美,但是看来我们只能从众,按着多数人的看法,采用“传播”一词。

二、传播的定义

传播与人类的历史同样长。自从有了人类,就产生了传播。

人类要生存,就必须相互交流,就需要传播。没有传播,也就没有人类。传播是对于人的社会性的确定。事实上,不仅人类传播,动物之间也传播,只是手段方式不同。尽管传播的历史很长,但是,传播学的历史却很短。学者们一般认为,传播学大致形成于30~40年代的美国。传播学的奠基者有着十分不同的学术背景,有的是政治学家,有的是心理学家,有的是社会学家。正是由于学者们的不同学术背景和观点,因此,他们对于传播的界定也就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初步统计,关于传播的定义有一百多个。我们在这里只介绍几种:

——传播是个人或团体通过符号向其他个人或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S.A. 西奥多森和 A.G. 西奥多森)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而言,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信息来源)通过可供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信宿(信息到达目的地)的过程,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这两个系统的信息渠道得到传递。(奥古斯德等人)

——传播可以定义为通过讯息进行的社会互动。(格伯纳)⁷

——传播可定义为在意义被赋予某一行为或行为的结果时产生的现象。(Samovar, Porter and Jain)⁸

——所谓传播是人际关系借以成立的基础,又是它得以发展的机理。就是说它是精神现象转换为符号并在一定的距离空间得到搬运,经过一定的时间得到保存的手段。(库利)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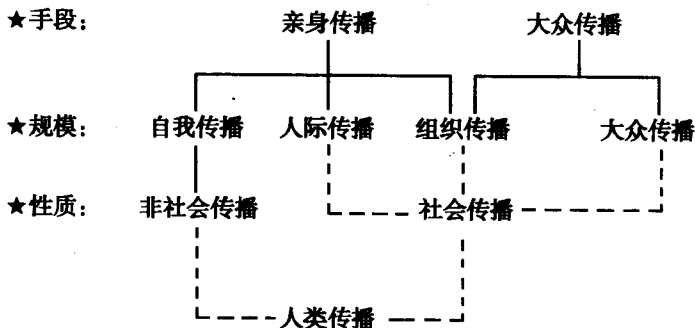
从以上几种定义中可以看出有的学者强调传递的过程,有的强调影响,有的强调意义的赋予,有的强调人际关系。强调的不同侧面反映了学者们不同的视角。

我国传播学者苑子熙的说法是:“传播是信息交流,一切有

信息交流的地方就有传播活动存在。”¹⁰张国良的定义是：“所谓‘传播’，即人类（自身及相互之间）传受（传送和接受）信息的行为或过程。”这一简明的定义可以作为我们讨论传播的出发点。传播就是信息的传送和接受，一方发出信息，另一方接受信息，这一过程就是传播。（在内向传播中，一个人既是传送者，又是接受者，也可以理解为两方。）

三、传播的种类

传播可分为人类传播与非人类传播。在人类传播中又可分为社会传播和非社会传播。非社会传播指内向传播（自我传播），社会传播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如图所示¹¹：



内向传播 (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 指一个人自己脑子里在自我交流活动或是自言自语。表面上看是一个人，但是，实际上，也包括了一个传播的过程，即传送信息和接受信息的两个方面。有的学者把传送两方比作 I 和 me。这虽然是传播的一种，但并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人际传播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的信息传受过程。这包括各种形式的人际传播，例如，两个人之间的交谈、书信往来、小组讨论、大会演讲、街谈巷议等

等。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交际并不一定是顺利无阻的，而一旦交际双方的文化背景有差异或者差异很大，人际传播的过程就必然是克服种种障碍的过程。

组织传播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在学校、公司、工厂、机关、军队、党派、群众团体等内部的传播是组织传播。组织传播并不都是自上而下的。它可以具有不同的模式，有的是纵式，有的是横式。例如，机关内部的通报、学校内部的通知、公司产品演示、工厂的全厂大会、部队首长的讲话都是组织传播。跨国公司一般都雇用不同国籍的雇员，他们种族不同、语言迥异、文化习俗也两样。因此，组织传播必须注意这些差异，否则，传播必然出现传而不通的局面。

大众传播 (mass communication) 一般定义为职业化的传播机构利用机械化、电子化的技术手段向不特定的多数人传送信息的行为或过程。这包括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因特网上的各种信息等。其中电视手段占有尤其重要的地位。近十年来，因特网发展迅速，几千万人上网，我国的上网人数也成倍增加。政府各部分纷纷在网上开辟网址，建立主页，成为政府机构与民众沟通的一个新的渠道。

三类社会传播在手段、规模、空间、周期、角色、反馈以及符号的运用方面存在许多差异，试比较如下¹²：

	人际传播	组织传播	大众传播
手段	亲身媒介	亲身+大众媒介	大众媒介
规模	少数人	特定、较多数人	不特定、多数人
空间	小	中	大
周期	不规则	较规则	规则
角色	随时交换	有所规定	基本固定
反馈	灵活	略困难	十分困难
符号	不规范	较规范	规范

沙莲香根据计算机的迅速普及的情况提出,在研究传播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人一机之间的信息传送。她指出:

“既然人和他的生活环境之间的信息传播已不仅仅是人与人,而且还包含着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是人一机系统内的信息传递,那么,传播学所要研究的信息传播过程就应该是在更广义上的传播过程,既能包括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又能包括在人内部所展开的信息传递,以及计算机、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信息传递过程。”¹³

张咏华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由于传播技术的进步,大众传播的某些特征发生变化,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界限开始模糊。她说:

“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尤其是多媒体电脑等的运用和电脑联网业的开发,正在引发大众传播事业的一系列新变化,并且改变大众传播的某些传统的基本特征。……人际传播曾被认为具有较少利用机器硬件的特点,如今人们在人际传播中,正越来越多地利用机器硬件,在许多人际传播活动中和信息的流通中也利用了机器,以电子邮件传递为形式的人际传播活动,即是最好的例子。”¹⁴

四、传播的模式

对于传播的模式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总的说来,早期的看法比较简单,对于干扰因素、反馈以及社会环境等考虑较少,而后期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对于传播模式不断作出修正,更准确地反映传播的真实情况。

早期影响最大的传播模式是 Harold Lasswell 提出的。他的模

式通常被称作 5W 模式，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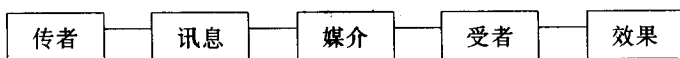
Who (谁)

says What (说什么)

in What channel (通过什么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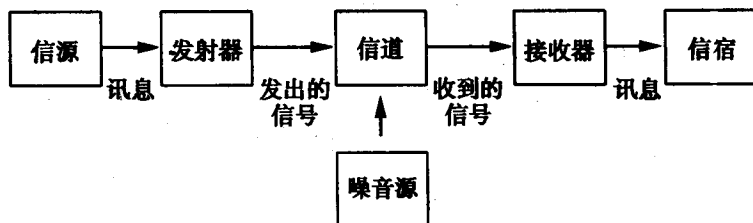
to Whom (对谁)

with What effects (得到什么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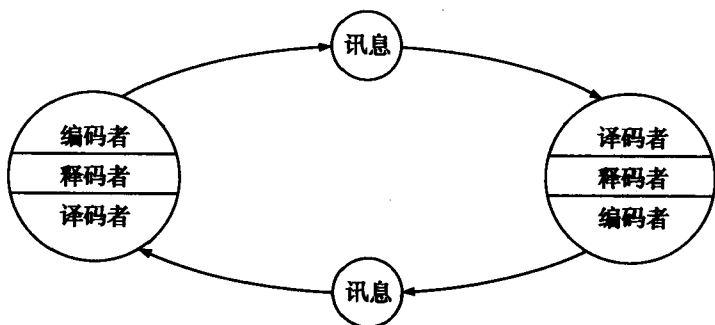
这个模式的特点在于它的简明扼要，把传播的过程清清楚楚的表现出来，对于传播学需要研究的几个主要环节都明确地指出，据此人们可以进行传者研究、内容研究、媒介分析、受者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这一模式在早期的传播学研究中影响巨大。但是，以后的学者提出 5W 模式虽然一目了然，但是失之过于简单，对于传播的社会环境以及反馈没有考虑在内。

1949 年，Claude Shannon 和 Warren Weaver 共同提出了另一个线性模式，他们的模式把媒介作了分解，同时增加了另一个要素：信号以及干扰因素：噪音。具体模式如下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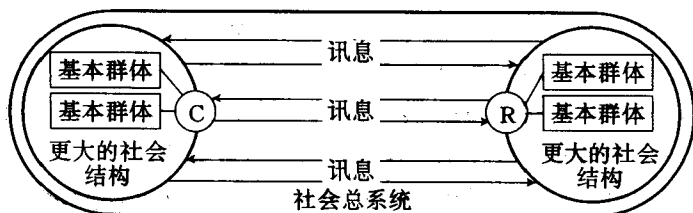


这一模式对于传播的过程虽然比 5W 模式有了更细致的分析，考虑也更周到，但是它并未根本解决线性模式的缺陷。

在 50 年代，Charles Osgood 和 Wilbur Schramm 提出循环式的模式，把反馈这一重要概念加入到传播过程中。



之后，社会学家 Jack Lyle 与 M. Lyle 把传播过程看作是社会过程之一，把传播置于总的社会环境中考察，从而涵盖了传播的外部结构。¹⁶



图中的“基本群体”指家庭、邻里、亲密伙伴等。图中的“更大的社会结构”指比较松散的社会群体，如工作单位、学校、社团等。而“社会总系统”指的是民族、国家以至世界等。在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都不可能不受到这三方面的影响。这一模式把传播的过程和讯息都置于总的社会环境之中，对于我们了解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各种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五、传播模式与跨文化交际

研究传播模式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跨文化交际有重大的意义。首先，从传播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编码和译码是两个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即使在具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交际也可能出现编码与译码不一致的情况。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进行交际时自然更可能出现误解。美国人表示友好这一讯息时可以说：“We must get together soon.”（我们得很快聚聚。）并没有邀请对方吃饭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编码时使用的符号并没有邀请的含义。但是，一个不了解美国文化的中国人在译码时却常常会得出邀请的讯息。又例如，中国人在表达问候的讯息时，可以就对方正在做的事情提问，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把它编码为“写信呢？”“看电视呢？”“出去呀？”，中国人在译码时一般不会发生差错，不会认为这是实质性的问题，把这些形式上的问题只理解为对于自己的关心。但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士听到这些话时，在译码过程难免会犯错误，结果得到的讯息是干涉他的私事。

在讨论传播模式时我们介绍了 Lyle 的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是把传播放在社会环境中考察。无论是传者或是受者都受到周围群体的影响，同时，所有的传播都不能脱离大的社会环境。这对于我们了解跨文化交际的过程有很大的启发。我们观察人们的跨文化交际过程，不能孤立地看，而是要考虑到传者和受者的周围的群体以及整个的社会环境。

小结：

交际与传播表示的是同一个概念，只是由于人们学科背景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术语。传播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自从有了人类就产生了传播。可以说，没有传播就没有人类。传播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它形成于 30~40 年代的美国。传播学的奠基者和大师大多是美国人。由于学者的学科背景和视角不同，他们对于传播的定义也有所不同。传播的定义不下一百个。我们可以说传播是信息传受的行为和过程。传播按其性质可分为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传播学家对于传播的模式作了多年的探讨。早期有 5W 模式，虽然它抓住了传播的本质，但是对于反馈和传播的社会环境考虑不足，以后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改进，把线性模式改为环型模式。传播模式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跨文化交际中产生的问题有助，它可以使我们比较确切地找到跨文化交际中产生误解的环节。

思考题：

1. 在汉语中“交际”与“传播”的词义有何异同？
2. 为什么人类不能没有传播？
3. 传播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
4. 《人民日报》属于组织传播还是大众传播？
5. 你认为传播还可以采取什么别的模式？
6. 了解传播模式对于我们分析跨文化交际有什么帮助？

-
1. 戴元光等：《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20页。
 2. 苑子熙：《应用传播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1年，5-6页。
 3. 沙莲香：《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2页。
 4. 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0页。
 5. 同注2，1页。
 6. 张国良：《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4页。
 7. 转引自张咏华：《大众传播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3页。
 8. Samovar, Porter & Jain. (1981) *Understand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adsworth. p. 12.
 9. 转引自沙莲香：《传播学》，2页。
 10. 同注2，1页。
 11. 同注4，14页。
 12. 同注4，23页。
 13. 同注3，7页。
 14. 张咏华：《大众传播社会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3-4页。
 15. 转引自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52页。
 16. 同注5，60-61页。

第三部分 跨文化交际的过程

第五章 语言交际

一、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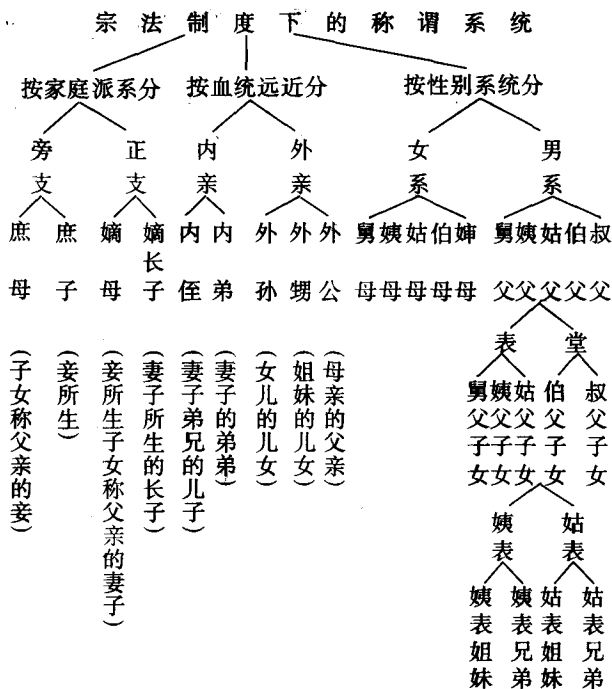
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文化才得以产生和传承。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化, 也不存在没有文化的语言。广义的文化包括语言, 同时文化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语言, 使语言为了适应文化发展变化的需要而变得更加精确和缜密。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 又是文化的写照。例如, 骆驼在阿拉伯人民的生活中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 阿拉伯语中目前还保留着几十个与骆驼有关的词。

我国云南、两广有许多地名中有“峒”(或垌、洞)字。“峒”在壮侗语中是“田场”的意思, 即同一水源的一个小灌溉区。在同一灌溉区从事稻作的人同住在一个峒里, 形成一个单独的居民点, 相当于汉语的“村”。“峒”字地名众多说明这些省份自古以来稻作文化发达。¹

亲属称谓是语言反映文化的一个突出例证。例如, 在英语中的 brother 是“兄”或“弟”, sister 是“姐”或“妹”, 汉语中没有一个字与 brother 或 sister 完全相等。在我们的文化中严格区分“兄”与“弟”、“姐”与“妹”, 因为“长幼有序”。英语中 uncle 一词相当于汉语中的“伯父、叔父、舅父、姨父、姑父”, aunt 相当于汉语中的“伯母、婶母、舅母、姨母、姑母”。这反映了汉族不仅注重长幼顺序, 而且对于是父系、母系或姻系亦十分重视。

赵元任 (Y. R. Chao) 在《中国人的各种称谓》一文中列举了 114 种亲属称谓²，每种又有正式称谓、直称及比较文气的称谓之分，例如，父亲的祖父在汉语中的正式称谓是“曾祖”，直称时用“老爷爷”，书信中可能用“曾祖父”。我国最早的辞书《尔雅》专门有一章解释称谓。在《尔雅》中对于儿、孙以下的称谓作了详细的描述，孙之子称曾孙，曾孙之子称玄孙，玄孙之子称来孙，来孙之子称晁孙，晁孙之子称云孙。这反映了古人强烈的传宗接代的观念。我国家族按血统远近区别亲疏，家族里又有内外嫡庶之别。“称母亲、姐妹或女儿方面的亲戚为‘外亲’，其亲属称谓的前面大都加上‘外’。跟妻子有亲属关系的人，称谓前加‘内’。妻子所生的子女为家庭的正支，或称嫡系；妾所生的子女为家庭的旁支，或称庶系。”³ 详见下表：



陈原在他的《社会语言学》一书中作了这样的分析：

“封建主义结构重视这些亲属特性，因此有严格区分亲属关系的称谓语词——无论哪一方面的社会交际，都必须严格按照亲属称谓的规定；不论是丧礼婚礼，承继遗产，以至一人犯罪，波及九族，都要按这个亲系树的等级办理。”“亲属称谓的简化，意味着家族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不占那么重要的地位；资本主义关系下的家庭，其构成和社会作用完全不同于封建主义关系，在语言中也能找到反映。”⁴

在我国个别地区的亲属称谓中，只有男性称谓，没有女性称谓，爸爸是爸，妈妈也是爸，分别男女的办法只是在前面加“大”或“细”（即小），爸爸是大爸，妈妈是细爸。哥哥叫哥哥，姐姐也叫哥哥，弟弟称老弟，妹妹也称老弟。叔叔是细爷，阿姨也是细爷。这种女性称谓用男性代替的例子，除湖南岳阳临湘一带，其他地方也存在，只是不那么系统。⁵这可能是古代父系社会的残余影响。

云南丽江地区宁蒗县永宁乡的纳西族方言的亲属称谓反映了这个地区纳西族的家庭结构和婚姻制度。他们实行一种称作阿注婚姻的对偶婚姻制。其特点是男女相识，彼此有意，互赠礼品就结成阿注关系。男子夜晚到女子家住宿，白天回母家。男女双方都有一个主要的长期的阿注和几个次要的阿注。男女阿注并不组成一个家庭。女阿注所生儿女留在女方家庭中，她的姐妹同时也尽抚养责任。由于不是一夫一妻制，所以许多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与这种婚姻制度相适应的有一些奇特的称谓。母亲的阿注、自己的生父和舅舅用一个词表示，母亲和母亲的直系、旁系的姐妹也只用一个词表示，同样，自己的儿子和兄弟的所有儿子在称谓上没有区别。⁶这种称谓方法反映永宁纳西族母系社会的性质。

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方法与崇尚对称和谐的文化心理也大量反映在汉语词语中。汉语中有许多由意义相反或相对立的词构成的成语，如：山高水长，同床异梦，水深火热，小题大作，男盗女娼，花天酒地，因祸得福，眼高手低，无中生有，得不偿失，公而忘私，新陈代谢，悲喜交集，赏罚分明，权衡利弊，明辨是非，无足轻重，人心向背，自相矛盾等。⁷

由于汉民族对于对称的偏爱，因此词汇出现了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的趋势。我们不喜欢说“桌”、“椅”、“石”、“木”，而习惯于说“桌子”、“椅子”、“石头”、“木头”。现代汉语词汇中，双音节词约占百分之七十左右。汉语重视词语结构排列的匀称性。“古代诗歌大量使用对仗，考究对仗工整，实际上受匀称性规律所支配。汉语有音乐性，离不开匀称二字。四字语的语音段落一般是2+2，语音上成双成对，平仄相间，念起来节奏匀称，十分上口。成语和早期的诗歌都以四言为主，千字文、百家姓以及古往今来对人物和诗文的评语往往也用四言。”⁸现代成语绝大部分是四字格，据统计约占成语95%以上。例如：朝秦暮楚，朝三暮四，天涯海角，水落石出，山穷水尽，同床异梦，除暴安良，色厉内荏，取长补短，借古讽今，深居简出，名存实亡，南辕北辙，阳奉阴违，车水马龙，山清水秀，风和日丽，离乡背井，仁人志士，良师益友，五湖四海，心明眼亮，破釜沉舟，审时度势，沉鱼落雁，毕恭毕敬，争奇斗妍等。汉语中还有许多对偶格式的成语，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兼听则明，偏听则暗。⁹

以上仅仅是从亲属称谓的使用和词的构成方面观察文化对于语言使用的影响。实际上，文化对于语言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人名、地名、商号名的选择，口彩及语讳，成语及谚语等。专门研究语言与文化关联的一门学科是文化语言学。在西方

大致属于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范畴。近年来国内已陆续出版了一些文化语言学方面的论文及专著。如陈原著《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周振鹤、游汝杰著《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陈建民著《语言文化社会新探》(1989)、申小龙、张汝伦主编《文化的语言视界：中国文化语言学论集》(1991)、常敬宇著《汉语词汇与文化》(1995)、曲彦斌主编《中国民俗语言学》(1996)等。

文化不仅影响词汇的发展与使用，在语法、讲话规则、篇章结构、文体风格等许多方面，文化都施予很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掌握语言的语音、语法和词汇，不了解深层的文化意义，不可能进行顺畅的交际。

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文化影响语言，语言反映文化，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道理。但是，也有的语言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又进了一步，他们认为语言不仅反映文化的形态，而且语言结构部分地或全部地决定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这就是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观点，由于未经验证，所以称为假说。通常人们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或沃尔夫假说。

萨丕尔(1884—1937)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是人类学家博厄斯的学生，在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方面有大量著述。沃尔夫(1897—1941)经历奇特，原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毕业后就职于一火灾保险公司，专门调查工业火灾和爆炸的起因。他虽未受过语言学或人类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但他后来转入考古和语言研究。萨丕尔在耶鲁大学教授印第安语言课程时，沃尔夫曾选修他的课程，深受他的学术观点的影响。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观点最早见于萨丕尔192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说：

“语言是‘社会现实’的指南。虽然人们通常认为语言对社会科学研究者并不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对于我们对社会问题及过程的看法产生强大的影响。人们并不仅仅生活于客观世界之中，也不是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生活于社会活动的世界之中，而是处于成为该社会表达手段的认为某特定语言的严格控制之下。人们毋需使用语言就可以适应现实，认为语言仅仅是解决具体交际或思考问题的附带的手段，那是一种幻想。事实是，‘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用这一人群的语言习惯不自觉地构筑起来的。从来没有两种语言如此相近，足以被认为是表现同一社会现实。不同社会所生存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带有不同标签的同一世界。”¹⁰

沃尔夫发展了萨丕尔的论点，他表达得更加明确：

“每一语言的语言系统（换句话说，即其语法）不仅是为了表达思想使之再现的工具，实际上它使思想成型，它是人们思维活动、分析种种印象、综合思想感觉的程序和指南……我们按自己的语言所规定的路子解剖自然界。我们从现象世界中抽出来的范畴和类别之所以能抽取出来并不是因为它们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相反，世界表现为万花筒式的各种各样的感觉和印象，这些必须由我们的头脑来组织，而这意味着大致上是由我们头脑中的语言系统来组织。”¹¹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基于他们对于印第安语言的研究。例如，英语中有 his horse（他的马—单数）和 his horses（他的马—复数）之分，而在纳瓦霍语中不仅没有名词单复数，而且也不区分“他的/她的/它的/他们的”。纳瓦霍语的 bili·? 根据上下文可以译为：他的马、她的马、它的马或他们的马，而马在所有这些情况

下既可能是单数也可能是复数。纳瓦霍语区分两种“他的”，一种是心目中与自己亲近的，一种是与自己疏远的，而在英语中却无法用 his 表现如此微妙的区别。又比如，英语的五种颜色 white - black - red - blue - green（白、黑、红、蓝、绿）在纳瓦霍语中也有不同的区分，黑色有两种，而蓝、绿却属于一类。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结构——语义范畴，这些范畴由于其能动的特性可以用来对于平日的经历作出分析和归类。对于这些独特的范畴进行研究，就有可能取得有关该语言使用者的思维世界的有意义的材料。¹²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学者们对于不同文化中的亲属称谓、颜色名称、数词、疾病名称、称呼方式等进行调查研究，企图验证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但都无法证实。他们的共同看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 1) 语言主要是反映而不是创造价值观念方面的社会文化准则。
- 2) 世界上的语言拥有许多结构上的共同成分，其数量超过人们目前所认识到的。
- 3) 语言与社会行为是平等的成分，不能确定何者为主。¹³

Gail Robinson 不同意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她认为假说存在问题：

“首先，从那些语言素材难以下结论说，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对世界观察不同。其次，——这一点可能更重要——很难下结论说，语言使用造成观察上的不同。我们又回到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难题，对于颜色观察的研究实际上表明，某一特定语言的使用者即使在他们的语言中不存在区别某些颜色的词汇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区分这些颜色。”¹⁴

陈原在他的《社会语言学：关于若干理论问题的初步探索》

中介绍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所反映的观点之后，指出他们的看法既违反唯物史观，又不符合现实社会生活。“这个‘假说’之所以迷惑人，恐怕是它常常用社会生活、社会条件的一些现象来进行论证，仿佛这立论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社会，而不是想入非非。”¹⁵陈引了 Joseph H. Greenberg 的一段话反驳了这一假说：

“如果我们的语言实际上决定我们的思想样式 (mode of thought)，那么，沃尔夫是说英语的，他的思想显然是由英语所决定的，这样，他又怎能跳出这种局限，发现了荷比语的不同的范畴，然后又怎样用英语把它写出来，且又被有着同样局限性的人们所了解呢？”¹⁶

三、词义与文化

就语言要素与文化的关系而言，语音与文化的关系最不密切，语法次之，而关系最密切反映最直接的是词汇。有的学者将词汇分为一般词汇与文化词汇，指出“文化词汇是指特定文化范畴的词汇，它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文化词汇与其他一般词汇的界定有以下两点：一是文化词汇本身载有明确的民族文化信息，并且隐含着深层的民族文化的含义。文化词汇的另一特点，是它与民族文化，包括上面所说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有各种关系，有的是该文化的直接反映，如‘龙、凤、华表’等；有的则是间接反映，如汉语中的红、黄、白、黑等颜色词及松、竹、梅等象征词语；有的和各种文化存在着渊源关系，如来自文化典籍的词语及来自宗教的词语等。”¹⁷

将一部分富有文化内涵的词汇挑选出来给予特别的研究与描述，这无疑对于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有实际的帮助，但是，将这些词分离出来，称之为文化词汇，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即它们不是一般词汇，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词汇。实际上，不仅红、黄、白、黑、松、竹、梅是一般词汇，龙、凤、

华表也是一般词汇，它们具有其他一般词汇所具有的特点。对于这类词较好的处理方法是词义入手。

对于词汇意义通常作“指示意义”(denotation)及“隐含意义”(connotation)的区分，例如，在英语中 politician 的指示意义是“从事政治，关心政治，特别是以政治为生涯的人”，它的隐含意义是“不讲原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能言善辩，言而无信”。通常词典上只给指示意义而不给隐含意义，因为指示意义是比较固定的，而隐含意义可以因人而异。隐含意义是通过联想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由于从事政治的人在竞选时采取各种手段争取选票，经常许下宏愿，而在当选后利用职权，营私舞弊，把对选民的许诺置于脑后。这种 politician 的表演一再重复，于是人们在使用 politician 一词时就难免作坏的联想，从而使 politician 逐渐获得了以上所说的贬义。

70年代前苏联的一些学者将俄语词汇的文化内涵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认为在对外国人教授俄语时对于词的民族文化内容应给予特别的注意。他们称这种意义为文化伴随意义或简单地称为词的伴随意义。在此基础上，维列夏金和科斯托马罗夫共同创建了国情语言学，他们把研究范围确定为：1) 揭示语言中（主要是词汇）的民族文化语义，2) 在语言课上展示、巩固、活用这些民族文化语义。目的是通过俄语，并在掌握俄语的过程中向外国学生介绍前苏联文化。¹⁸

英国学者 Geoffrey Leech 在《语义学》(Semantics)一书中提出，词义可以分为七种主要类型，即概念意义、内涵意义、风格意义、感情意义、联想意义、搭配意义及主题意义。词的概念意义亦可称为认知意义。概念意义是语言交际中表达的最基本的意义。没有概念意义无法进行语言交际。内涵意义是附加在概念意义上的意义，它可以因人而异，因年龄而异，也可以因不同的社会、国家或时代而异。正因为如此，内涵意义往往是不稳定的，旧的内涵可能消失，新的内涵意义可能会产生。在分析内涵

意义时应注意有褒贬之分。¹⁹

国情语言学所强调的词的伴随意义或民族文化内容大致上可以归入词的内涵意义。对前面提到的汉语的“文化词汇”也可以作这样的分析,即一些汉语词汇除了概念意义之外还具有丰富的内涵意义,对于这些词汇应给予特别的关注。

在从事跨文化交际中不仅要注意词的概念意义,更重要的是需要随时随地注意词的内涵意义。在不同语言之间可能出现几种不同的情况:(两种语言分别以 A、B 代替)

- 1) A、B 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相同或大致相同
- 2) A、B 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不同
- 3) A、B 概念意义相同, A 有内涵意义, B 无内涵意义

属于第一种情况的词汇就英、汉语来说数量比较少,例如,fox 与“狐狸”不仅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也相同,都包括了“狡猾”这一层意思。pig 与“猪”在概念上都指同一种动物,pig 在英语中用于指人时具有“肮脏”、“贪婪”、“令人讨厌”等意思,“猪”(或猪猡)在汉语中也有类似的含义。中国、日本、韩国由于都属于中国文化圈内,因此在词汇的文化内涵方面存在较多的共同的成分。在汉语中,“松”一年四季常青,在严冬依然挺立于寒风之中,因此常用“松”象征坚毅高洁的高尚品质。与汉语一样,在日语中也有“岁寒知松柏,逆境见本色”(歳寒くして松の操を知る)的说法。“莲”被我国古人誉为花之君子,人们因其“出污泥而不染”(泥中の蓮),常用莲象征纯洁、清雅。在日语中也有类似的内涵意义。又比如,蝙蝠中的“蝠”因与“福”同音,被认作是吉祥的动物,在年画上常有蝙蝠出现,如有的画五只蝙蝠飞入大门,取“五福临门”的谐音。在日本及韩国,蝙蝠也象征幸福,是表示吉祥的动物。在我国不少地区“四”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因为与“死”谐音。日本人对“四”更加忌讳,在日语里“四”与“死”也同音,“十四”与“重死”同音,“二十四”与“二重死”同音。因此,日本大阪大

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没有二十四号房间。爱知县丰桥市佐藤医院没有四、十四、二十四号病室，甚至监狱里没有四号牢房。中国人喜欢“八”这个数字，从写法上看，“八”字先上后下，上窄下宽，喇叭口朝下，逐渐展开，给人以工作渐顺、运气渐来的联想。人们常常赋予“八”周全、积极的意义。在日语中，“八”也有运气越来越好、事业越来越兴旺、人生道路越来越宽的含义，因此，日本人喜欢“八”这个数字，婚宴多为八桌，八幡神社终年香火不绝，参拜者甚众。²⁰

第二种情况是 AB 两种语言中的词汇概念意义相同，但它们的内涵意义不同。有时 A 语言的内涵意义大于或小于 B 语言，有时两种语言的内涵意义截然相反。下面选出英汉语中的若干词作一对比。

“红”(red): 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朝代崇尚不同的颜色，如夏朝崇尚青色，商朝崇尚白色，秦朝崇尚黑色，但红色被崇尚的朝代最多、时间最长，包括了周朝、汉、隋、唐、宋、元、明、清。人们用红色象征幸福、喜庆、吉祥、欢乐、兴旺发达。汉民族在春节时在大门两旁贴红对联，在门上贴红“福”字，在门窗上贴红吊钱，门口挂红灯笼。结婚被称作红喜事，新娘穿红衣裙，头上盖红盖头，新郎身系红绸带，胸前戴大红花，门上贴红喜联，屋内贴红喜字，晚上点红烛，喜钱要用红袋包裹，总之，一切都离不开红色。反映在语言应用上，用“红”作语素的词一般都包含兴旺、发达、顺利、圆满、受欢迎等意义：红利、红运、分红、红榜、红包、开门红、满堂红、大红人、演红、走红、红得发紫、红极一时等，除了传统的吉祥喜庆的含义，“红”在近代又用来象征革命和革命斗争，如红旗、红军、红心、红五星、红领章、红袖章、红领巾、红色政权、红色根据地、红色娘子军等。²¹

在英语中 red 不具有汉语的“红”包含的那些文化内涵，在欧美，新娘的结婚礼服为白色，象征纯洁。在圣诞节、新年等节

日也没有用红色表示喜庆的习俗。只是在 red carpet treatment (用红地毯接待) 中表示对尊贵的客人给予隆重的欢迎, 似乎包含了一些喜庆的意思。但应该注意的是 red-light district 是妓女出没的红灯区, red flags 在通常的用法中并不是指革命的红旗, 而是指需要提高警惕预防出事的情况, in the red 指(预算或账目中的)赤字。用 red 指共产主义也往往会有贬义, 至少是不严肃的用法。

“政治”(politics): 《现代汉语词典》(1983) 对于“政治”的解释是: “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这个解释是“中性”的, 但在实际使用中“政治”往往含有褒义, 例如, “关心政治”意思是关心国内外大事, “政治大事”指意义重大的事情。在英语中, politics 有下列几层意思: 1) 有关统治方面的艺术和科学; 2) 为获得一个国家、社会或组织中的权力而进行的活动; 3) 政治信念; 4) 政治学。在用于 1), 3), 4) 的意义时 politics 属中性; 在用于第 2) 个意义时常含有贬义, 包含有为争权夺利不惜采取各种手段的意思。因此, 在英语中与“关心政治”相对应的 be concerned about politics 并不含有褒义。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在英语中 intellectual 指致力于思维方面的问题, 特别是致力于文学和艺术的人, 致力于研究、思考和推论的人, 特别是致力于和深奥、抽象的理论问题有关的研究、思考和推论的人。由此又衍生出喜欢从事空洞的理论探讨而解决实际问题时束手无策这一层贬义。在通常情况下, intellectuals 不包括中小学教师、医生、工程师、会计师、律师、报社记者等。而在汉语中“知识分子”的范畴要宽泛得多, 泛指“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辞海》1979 年版) 在我国虽没有明文规定什么人属于知识分子, 但似乎受过大学教育目前在做脑力劳动的人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

“农民”(peasant): peasant 特指为封建生产关系所束缚的农业生产者。由于英国的农业从 16~19 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取代了原来的生产关系,因此 peasant 一词在英国已被淘汰。在美国则从来都没有过 peasant。peasant 在英语中的内涵意义是没有受过教育、举止粗鲁、思想狭隘的人。在汉语中,“农民”指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无论在革命斗争中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丝毫没有贬义。

“龙”(dragon): 龙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图腾形象。华夏民族的图腾形象有一个演化过程,最早是蛇、鸟、熊、虎等图腾形象,以后出现了半人半兽的形象。最后图腾进一步神圣化,形成综合性的图腾形象,如龙兼有蛇、兽、鱼等多种动物的形态,是以蛇为主的幻想动物,这反映了华夏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在我国古代传说中,龙是能兴云降雨的神异动物。在封建时代,龙作为皇帝的象征。汉民族素以“龙的传人”自称。在汉语中,“龙”总是用于好的意思,例如,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盘虎踞、藏龙卧虎、生龙活虎、攀龙附凤等。

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 是一只巨大的蜥蜴,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能够从嘴中喷火。因此可以说尽管通常“龙”译为 dragon,实际上,严格地讲,龙与 dragon 所指并不是同一个动物,这从中国人所画的龙与西方人所画的 dragon 的对比中可以得到证明。在西方文化中,dragon 通常代表罪恶、邪恶,令人感到恐怖,所以很早就被用来作为战争的旗帜。在英语中,说一个人有点像 dragon 是说此人飞扬拔扈令人讨厌。有人为了区分西方的 dragon 和中国的“龙”,将后者称为 Chinese dragon。

“凤凰”(phoenix): 在我国传说中,凤凰是一种神异动物,它前如鸿鸟,后像麒麟,有蛇的颈,鱼的尾巴,龙的纹采,龟的身驱。人们认为,凤凰是百鸟之王,所以有百鸟朝凤的说法。在

古代，人们相信凤凰出现预示着天下太平。后世多以龙比喻皇帝，以凤凰比喻皇后。也用凤比喻有圣德的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以凤凰作为公司的标识，国航的飞机上都印有凤凰图案。

phoenix 在西方文化中是传说中的一种鸟，据说在阿拉伯沙漠上生存五六百年，临死前为自己筑一个里面铺满香料的巢，唱完一支凄凉的挽歌后，用翅膀扇火，将自己烧为灰烬，然后从灰烬中又诞生一只新的 phoenix，因此，在英语中 phoenix 有“再生”、“复活”等意思。

“猫头鹰”(owl)：在汉语中猫头鹰与前兆迷信有关。由于它在夜间活动，鸣声凄厉，因此人们把它的叫声与死人相联系，说猫头鹰叫孝。谁要是在树林中听到了它的叫声，就预示着家里可能有人会死，因此猫头鹰被认为是不祥之鸟。然而在英语中 owl 是个表示智慧的鸟，说某人像 owl 比喻他聪明，绝没有任何坏的意思。

“孔雀”(peacock)：孔雀在我国文化中是吉祥的象征，人们认为孔雀开屏是大吉大利的事。在英语中，peacock 的内涵意义通常是贬义，含有骄傲、炫耀、洋洋自得的意思，例如 as proud as a peacock (像孔雀那样骄傲)。

“狗”(dog)：在西方人们通常将狗作为宠物来养，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因此西方人对于食狗肉十分反感。dog 在英语中有时含有贬义，但总的来说属中性或含褒义的情况居多。在成语 treat someone like a dog (虐待某人) 中 dog 含贬义，但在以下的例句中 dog 都属中性或含褒义：

You lucky dog. (你这家伙真幸运)。

Every dog has its day. (凡人皆有得意日)。

He worked like a dog. (他工作很卖力)。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人年纪大了学新东西不容易)。

在汉语中，“狗”一般用于贬义，这从汉语中的成语可以看

出,例如,狗急跳墙、狗仗人势、鸡鸣狗盗、狼心狗肺、狗头军师、狗血喷头、鸡零狗碎、蝇营狗苟等。

第三种情况是 A 语言的词汇具有内涵意义,而相对应的 B 语言中的词汇却没有类似的内涵。例如,在汉语中松柏四季常青,树龄可长达千年,因此象征长寿。陵墓地多种松柏。鹤又称仙鹤,被视为神仙坐骑之鸟,长生不老,因此也用以象征长寿。不少人取“鹤年”为名,以求长寿。桃也象征长寿,这与神话传说西王母用蟠桃宴请为她祝寿的神仙有关。²²因此在民间祝寿用的桃称为寿桃。祝寿时专门蒸制寿桃状的面食。与松、柏、鹤、桃相对应的英语词 pine, cypress, crane, peach 不具有上面所说的内涵意义。

又比如,梅、兰、竹、菊在中国文化中被誉为花木中的四君子。梅花在严寒季节盛开、色淡清香,人们常用梅象征高雅纯洁。兰花多生长于空谷山岩,其花淡雅出香,因此人们常以兰象征高雅的品格。竹因其高直挺拔、冬夏常青、中空有节、质地坚硬等特性,所以人们常用竹象征正直、坚贞、廉洁、有气节、有骨气。菊花具有凌霜耐寒、清香飘逸等特性,所以人们常用菊象征坚毅、清雅、淡泊的高尚品格。²³与梅、兰、竹、菊相对应的英语词汇 plum blossom, orchid, bamboo, chrysanthemum 只是一些植物名称,并不具有汉语词汇包涵的丰富文化内涵。

在数词中,13 在西方语言中普遍被认为是不祥的数字,因为这个数字与犹太出卖耶稣,耶稣受难相联系。人们通常避开 13 这个数字,在旅行时尤其避开 13 号星期五。订婚结婚也避开 13 号。有的饭店不设 13 层,避开 13 号作为房间号码。电视连续剧《阿童木》把世界毁灭的日子定在 13 日 13 点 13 分 13 秒。在我国文化传统中,13 不具有这些不祥的含义。但在近年,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有些人也认为 13 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九”是表示最高、最多的大数,又因为“九”与“久”谐音,人们往往用“九”表示“长久”的意

思。历代帝王都崇拜“九”，希望长治久安，因此，皇帝穿九龙袍。明代永乐皇帝定都北京，京城建九个城门，在紫禁城和北海公园内均建造“九龙壁”。皇宫三大殿总高度为九丈九尺，象征九重天，宫殿的台阶也是九层或九的倍数层。大门门钉也是横九排，竖九排，共有九九八十一颗门钉，取“重九”吉利之意。在汉语词语中有九流、九族、九泉、九星、九品、九连环、九头鸟、九牛一毛、九牛二虎、九死一生、九九重阳节、九九艳阳天等。在英语中，nine 并没有特殊的内涵。

除了以上所列的含有文化内涵的普通词汇之外，还有一些专有名词来自文学典籍，具有丰富的内涵。汉语中这类词比比皆是，如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关羽、张飞、曹操、宋江、武松、花和尚、西门庆、潘金莲、红娘、林黛玉、贾宝玉等。由于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人物来自人们熟悉的文学著作，每个人物都有一长串生动的故事，因此他们在人们心目中具有鲜明的形象。每个名字都会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但是，对于不熟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人们来说这些词引不起类似的联想。例如，我们听人说“他是活张飞”，在我们的心目中马上就会有一个性格豪爽、脾气暴躁的人的形象，甚至我们会联想到张飞的满脸胡须。如果说一个女孩像林黛玉，我们想到的是她弱不禁风，多愁善感。

在英语中也有不少专有名词由于出自文学名著或与一些历史事件相联系，获得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童话故事 Cinderella（灰姑娘）讲的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漂亮女孩受继母虐待过着非人的日子，后忽得仙姑相助，与王子结为夫妇。Cinderella 现在泛指不受重视的人或部门，或指有才干但一时未被赏识的人。Shylock（夏洛克）是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人物，为了取得暴利，在放债时提出极为苛刻违反人性的条件。现在 Shylock 通常是用来指心肠狠毒惟利是图的小人。Waterloo（滑铁卢）是比利时的一个地名，由于拿破仑 1815 年在那里惨败，整个战局为之一变，从此 to meet one's Waterloo 就获得了“遭到决

定性失败”的意思。Catch-22（《第二十二条军规》）原是美国作家 Joseph Heller 写朝鲜战争时期美国空军的一部小说，讲的是根据第 22 条军规空军飞行员只有神经确有疾患才能遣送回国。但是在执行中却有一个问题，凡是提出要求回国说自己有神经病的飞行员都被认为是神经正常的，因此不适于运用第 22 条军规。这部小说畅销以后，Catch-22 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语言，意思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例如，一个人只有工作才能获得经验，而用人单位招工时却要求申请人必须有工作经验才能申请。这种状况有时被人称之为 Catch-22。

四、语用规则与文化

人们在交际过程中需要正确使用一种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否则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甚至使交际中断。但是，仅只掌握语音、语法、词汇还并不能保证顺畅的交际。人们在具体使用语言时还运用一套语用规则。也有的学者称之为讲话规则。这些规则包括如何称呼对方，如何见面打招呼，如何提出一项要求，如何接受或拒绝对方的要求，如何告别，讲话谁先谁后，讲话量谁多谁少等。这些方面的问题过去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只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的建立与发展，随着交际教学法的普及，人们才越来越感到语用规则的重要性。

与语言规则相比，语用规则的掌握要困难得多。首先是因为语音、语法、词汇的各种规则已经写进了语音书、语法书和各种词典，人们有章可循，有书可查。而语用规则却远远还没有总结成文字，记录在书中。有的文章和书涉及某一条或某些方面的语用规则，但迄今还没有完整的对于某一语言的语用规则的总结。其次，对于语言规则人们比较自觉，而语用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自觉。你若问一个中国人，他遵循哪些讲话规则，他会很难回答你的问题。

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称谓体系。事实上，在同一文化中

称谓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并且存在地区差别。例如,普通话“奶奶”,上海话叫“亲妈”,长沙话叫“婆”,梅县话叫“阿婆”,潮州话叫“阿妈”。²⁴我国的社交称谓在几十年间经历了很大的变化。1949年以前“先生”、“太太”、“小姐”是通用社交的称谓。解放后,“同志”成为最常用的称谓,适用于男女老幼。文革中“师傅”又一度十分时髦。九十年代以来,“先生”、“太太”、“小姐”又再度成为一般的社交称谓。

英语中社交称谓没有汉语变化大,总的来说比较稳定。但观察近几十年称谓的使用会发现以名相称愈来愈普遍,特别是在美国这一趋向更加明显。在30年代如果互相以“Mr (Mrs, Miss) + 姓”称呼同事或邻居,在今天大致上都用名字称呼对方。在美国,小到婴儿,大到八九十岁,都可以名相称,人们不会感到不合适或对老人不够尊重。自然,若是在正式场合或是双方地位悬殊很大,以名相称仍然不妥。对于某个特定的人应该如何称呼要考虑他的职业、职位、年龄、相互关系、场合以及他个人的爱好与习惯。有的年轻教授上课第一天就告诉学生用名字称呼他,但也有不少教授不喜欢学生以名相称。

尽管称谓方式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有些是英美人不能接受,甚至引起反感的。在一项对于英语国家在华任教的教师的调查中发现,有的中国学生用姓作为对于一位女教师的称谓。她的全名是 Marcia Vale,学生理应称她为 Dr Vale 或 Marcia,但有的学生直呼她的姓,叫她 Vale,这引起了这位英国教师极大的不快。她在调查问卷中写道:“在交往中,我发现——这可能是挺奇怪的——最不能容忍的是学生坚持用我的姓称呼我。在英语口语中,从正式的到很随便的称呼,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如果只叫姓,那是绝对错误的。”在汉语中“老张”、“小李”、“司徒”、“欧阳”作为称谓都是可接受的,但是在英语国家用姓作称谓只限于很少的几种情况,例如,在小学里教师对于学生,教练对于球员,监狱看守对于囚犯等。难怪英国教师对于学生的称呼如此

反感。

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常常反映美国人讲话靠不住，说是要邀请吃饭，结果等了很久还是不兑现。有人调查了这一现象，发现问题出在外国学生对于美国英语的讲话规则不了解，听美国人说：“We must get together soon.”（“我们一定得聚聚。”）就以为是正式邀请，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句客气话。社会语言学家专门就这个题目作了研究，分析究竟客气话与正式的口头邀请在语言的使用上有什么区别。他们发现正式邀请比客气话要具体得多，一般来说邀请需要包括时间、地点。例如：“Come over for dinner next Saturday night.”（“下星期六晚上过来吃晚饭。”）是明确的邀请。有的话听起来似乎很像是邀请，但如果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则仍然不能看作是邀请。²⁵例如：

A: Hi, B.

B: Hi.

A: When are we going to get together?

B: We really should.

A: You know my office number. Just give me a call.

B: Okay.

A: Good. So long.

B: Bye.

(A: 你好, B。

B: 你好。

A: 咱们什么时候聚一聚?

B: 咱们真该聚聚。

A: 你知道我办公室电话号码。给我打个电话。

B: 行。

A: 好, 再见。

B: 再见。)

下面再看另一段对话：

A: Okay, thanks for the information, Let's get together soon.

B: I'd love to.

A: Good, I'll give you a call and we'll make a date for lunch.

B: If you want, we can make a date now. When are you free?

A: Uh, okay, let's. I'm available almost any day next week.

What about you?

B: Well, Wednesday is my best day.

A: Okay, let's make it Wednesday.

B: Noon okay for you?

A: Noon is fine. Shall I pick you up at your place?

B: That would be great.

A: I'll be there at noon on Wednesday.

B: Great. See you then.

(A: 好, 谢谢你提供的情况。我们得很快聚一聚。

B: 那好呀。

A: 好, 我给你打电话, 定个时间一起吃午饭。

B: 你要是愿意的话, 咱们现在就可以定。你什么时候有空?

A: 嗯, 行, 咱们聚一聚。下星期我几乎哪一天都有空。你呢?

B: 星期三对我最合适。

A: 好, 那就定在星期三。

B: 中午对你合适吗?

A: 中午挺好。我到你家去接你好吗?

B: 那好极了。

A: 我星期三中午到你家。

B: 太好了。星期三见。)

区分正式邀请与客气话的困难在于并不是二者黑白分明, 非此即彼。有时是介乎两者之间, 而在谈话过程中逐步明确。第二

个例子就是从客气话开始，在讲话中 B 采取主动问了一句：“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定。你什么时候有空？”从此以下就转入了具体时间的讨论，最后成为十分肯定的邀请。由此可见，围绕邀请的讲话规则并不是那样容易掌握。对于母语并非英语的我国留学生来说困难自然更大。

电话上的谈话也有一套规则。不同的语言与文化往往规定不同的规则。电话在我国还不普及时，典型的电话问答大致上是这样：

(电话铃响)

B: 喂，你找谁？

A: 请问张人杰在吗？

B: 等一会儿，我去叫他。(或：他不在。)

.....

这与英语的电话问答有很大差别。在英语国家比较典型的问答是：

(电话铃响)

B: Donald Kane. (或者说: Dean's office 或者报自己的电话号码: 67301760。)

A: Can I speak to Jane, please?

B: Sure. Hang on.

.....

对比这两段电话谈话的开头几句就可以看出在汉语和英语中有两套不同的讲话规则。在英语中，接电话的人先报自己的名字或办公室，或电话号码，或其他，但绝不会拿起电话筒就问对方。在汉语中，接电话的人首先要弄清的是对方要干什么，要找谁，但绝不会自己先报名字或单位。近年来，一些大公司改变了原来的模式，接电话后马上报公司名称，但一般仍不会主动报自己的名字或电话号码。现在的模式大致上是这样：

(电话铃响)

B: 宏大计算机公司, 你好。

A: 你好, 请问张总在吗?

B: 在, 请问您有什么事?

A: ……

社会语言学家 Schmidt 对于埃及人的 215 次电话谈话作了研究, 发现一般的规律是双方都不作自我介绍, 而是互相猜对方是谁。在弄清双方身份之后再提出打电话的主题。

“我们首先发现的是在 [电话] 谈话的开头有一连串的 ‘hello’, 双方都不说明自己的身份。在第二个来回当中, 打电话的人要求接电话的人说明身份, 这一要求遭到对方拒绝。反过来, 接电话的人问打电话的人的身份, 而打电话的人并不回答这一问题, 相反却开始猜对方的身份。接电话的人也试图猜出对方是谁。在双方的猜测被证实以后, 谈话通过一系列问候和答问进行, 直到在六个来回之后才正式提出谈话的主题, 或者至少打电话一方表示他有问题需要提出。住在埃及的外国人的普遍反应是电话谈话毫无规律可循。”²⁶

在商店里, 售货员与顾客的讲话规则与各国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例如, 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 尽管都使用英语, 但却遵循不同的规矩。在新加坡的商店里, 顾客走近柜台, 售货员调门比较高地问: “Yes?” 意思是 “你要买什么?” 在英美澳等国, 这会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在这些国家售货员一般要问: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或 “Can I help you?” 在买卖结束以后, 新加坡的售货员马上转身去照顾其他顾客, 在没有其他顾客的情况下也转身离开, 与顾客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但是, 在澳大利亚根据一项调查, 最通常的情况是售货员说: “Thank you.” 顾客说: “Thank you.” 然后分手。有的情况下售货员对天气作一简短评论, 顾客再说一句应答的话, 然后结束。如:

售货员: It's been a beautiful day.

顾客: Yes, it has.

也有的售货员说: See you later. 顾客答: Righto.²⁷

对于抱歉, 不同的文化亦规定了不同的规则。总的来说, 日本人似乎更愿意抱歉, 承担责任, 有时甚至采取比较极端的形式表示歉意, 而美国人似乎更急于解释事情的原委。1982年, 在一个月之内连续发生了两起空难。一起发生在美国华盛顿, 一起发生在日本东京湾。前一起空难中死亡 77 人, 后一起事件中死亡 24 人。美国官方尽了很大努力解释这一空难, 但机组人员、航空公司、政府官员中没有任何人为此事承担责任, 对公众或死者家属表示道歉。但是, 在东京湾空难之后, 航空公司总裁向公众道歉, 亲自拜访死难者家属, 向他们道歉, 并提出了辞呈。机长及领航员也为事件表示了歉意, 一年之后, 运输司司长承认自己对此事件的责任以后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一项对于日本和美国大学生的调查表明, 在同一情况下美国人作解释的可能性高于日本人一倍, 而直接说: "I'm very sorry" 承担责任的百分比日本人总是超过美国人。这说明在抱歉这方面日本与美国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²⁸

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要做到顺利地交际, 只掌握语言结构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在掌握语音、语法、词汇的基础上熟悉和掌握语用规则(讲话规则)才能正确地交流思想, 否则难免会造成各种误会, 甚至使交际发生障碍, 无法进行下去。

五、交际风格与文化

在人们连贯地表达思想时, 不仅词汇反映文化背景, 表达方法、说理方式、思维模式无不表现特定文化的某些特点, 在这里笼统地归纳为交际风格。在这方面所表现的文化特点不如词汇那样易于识别。例如, 在韩国任教多年的美国教师 Robert Norton 读了韩国学生的作文以后的最初反应是认为学生思路不清, 不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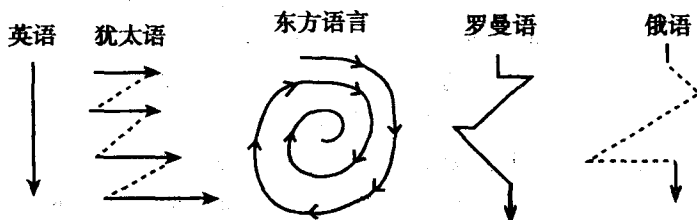
写文章,甚至归结为英语没有学好,殊不知问题并非出在英语本身,而是不同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不同的语篇结构。

心理学家早已注意到人们愿意接触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倾向于同意自己所熟悉的方式方法。人们认为合理的通常是自己所习惯的,与自己的习惯相违背的东西往往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实际上,逻辑并不是存在于所有文化中的固定不变的东西,逻辑概念本身有着很深的文化烙印。有的学者笼统地把逻辑分为两类:亚里士多德逻辑与非亚里士多德逻辑。西方的逻辑学经历了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时期,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但是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逻辑学基本理论(例如三段论)对后世影响极大,因此西方逻辑仍笼统地称为亚里士多德逻辑。

Karl Pribram 将世界上的思维模式、说理方法归纳为四类:一类借助于某些普遍接受的概念说理,法国、地中海国家以及罗曼语系国家(包括拉丁美洲)通常使用这种说理方法。第二类强调归纳和验证,而对抽象概念抱怀疑态度,英、美、澳、新以及加拿大的操英语者采用这类说理方法。第三类属直感式说理方法,强调整体与局部的协调,常引证权威,这包括德语及斯拉夫语国家。最后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说理方法,基于事物本身包括对立面这一基本事实。Pribram 未说明这一种属于哪个语言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辩证法并不以国界或语言划分,它经历了古代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三个阶段,唯物辩证法是各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Robert Kaplan 在研究了不同国籍的学生的写作后,认为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不同的,他用下面的图表示几种不同的模式²⁹。对于 Kaplan 的归纳有些学者持批评态度,认为其中包含了 Kaplan 的一些偏见。

对于日本人与美国人思维模式的差异许多学者作过研究。



Satoshi Ishii³⁰把美国人的思维模式比作“桥式”。作者（讲话人）组织思想的方式是为了明白直接地把自己意思传达给对方，犹如一座桥，读者（听话人）只要从桥这头走到桥另一头就把意思弄清楚了。他把日本人的思维模式比作“垫脚石式”。作者（讲话人）不把自己的意思直接地表示出来，而是采取迂回、隐含的方法，犹如在水中投下一块一块的垫脚石，使读者（听话人）借助于“垫脚石”悟出作者的意思。Ishii 认为两种思维模式反映了美日的不同文化，美国是“低语境”（low context）国家，一切都要靠用语言讲清，而日本是“高语境”（high context）国家，许多意思都包括在语境之中，不需要每一点都明白无误地讲出来。一项统计资料亦可作为佐证：夏威夷的美国成年人每天谈话平均占 6 小时 43 分，而日本成年人谈话只占 3 小时 31 分。这说明美国人通常需要通过谈话讲清问题，而日本人不一定非要讲话才能交流思想。日本钢铁公司为了帮助其雇员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打交道编写了一本书，名为《日本国土与人民》，关于日本人交际的特点作了如下的概括：

“西方人习惯于以十分肯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此不同的是日本人通常是在充分考虑了对方的感情与看法之后才讲话和采取行动。而且，日本人的习惯是不给一个斩钉截铁的是或否的答复，这一习惯基于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摩擦的悠久传统。”³¹

曾在日本生活和工作过多年的美国教授 Condon 在他写的《关于日本人》(*With Respect to the Japanese: A Guide for Americans*)一书中把日本人的交际风格特点归结为四点:³²

1) 日本人对于讲话的态度与美国人不同, 美国人强调敢于讲话, 而把沉默常常理解为紧张、尴尬、羞怯或怀有敌意, 因此只要有可能出现沉默的局面, 美国人马上讲些话填补一下。日本人并不把讲话看得那么重要, 相反把讲话过多看作是不成熟、缺乏知识的表现。沉默不仅不会引起日本人紧张, 相反, 在不同场合它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 例如, 可用以对刚才讲话的人表示敬意。

2) 美国人常常帮助对方把一句话讲完, 而日本人很少这样做。美国人接话岔儿是为了表示自己一直在认真听, 而日本人会把这种行为看作是不耐烦、傲气凌人。

3) 美国人喜欢开门见山、直来直往, 而把转弯子讲话看作是思路不清或缺乏诚意。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 直截了当可能被认为是对方感情缺乏考虑。只有在团体内部, 上级对下级才能直来直去, 讲话类似下命令。

4) 对于美国人来说, 讲话几乎是惟一的交际手段, 而对于日本人来说, 讲话只是手段之一。表情、姿态、服装等都可以表意传情。

前面提到的教韩国学生作文的美国教师 Robert Norton 对于韩国人和美国人的语篇结构作了对比研究, 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看法。³³他从韩国作家和美国作家的说明文中选取了相同题材的文章, 然后对每篇文章中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逐一分类, 共得 18 类。这 18 类中, 限制性关系或并列关系在两种文字中都占一半以上。在美国作家的文章中, 限制性关系占 22.7%, 并列关系占 28.1%。在韩国作家的文章中, 限制性关系占 27.1%, 并列关系占 24.5%。在分析句子之间是何种限制关系时, 美国作家与韩国作家的区别显得十分突出。美国作家的文章中, 从一般

到具体的限制性关系占 18.7%，从具体到一般的只占 4%，而在韩国作家的文章中，从一般到具体的限制性关系占 5.1%，而从具体到一般的却占 22%，从这一分析 Norton 得出的结论是：韩国人写文章通常是循着从具体到一般这一思路，采用的是归纳法 (inductive method)，而美国人写文章则是从一般到具体，采用的是演绎法 (deductive method)。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读韩国人的文章觉得思路不清不易接受。

笔者在美国的硕士研究生金敬子 (Kyeongja Kim) 对于韩国人的思维模式和写作风格作了进一步的分析。³⁴她收集了 30 篇大学学生报纸上的社论，10 篇是韩国学生用韩文所写，10 篇是韩国学生用英语写成，10 篇是美国学生所写。她对于这 30 篇社论的主题思想在文章的哪一部分提出作了分析。她发现韩国学生的文章无论是用韩文或是用英文所写与美国学生写的文章在主题思想的安排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学生倾向于在文章的前一部分 (文章的头三分之一段落) 提出主题思想，而韩国学生倾向于在文章的结尾 (后三分之一部分) 提出主题。

主题思想的提出	开头	中间	结尾	总数
韩国学生用韩文写的社论	1	1	8	10
韩国学生用英文写的社论	0	1	9	10
美国学生用英文写的社论	7	1	2	10

下面是两篇典型的美国学生和韩国学生所写的社论：

例 1：美国学生所写的社论，取自 1990 年 8 月 27 日《瓊州先驱报》。

Welcome to the pages of The Badger Herald. You, and others like you 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ommunity, are about to witness a significant departure in the history of student journalism on the Madison campus. Since April 4, 1892, there has been one

newspaper here, and that newspaper, in spite of its official status, has considered itself "independent." It has made all sorts of moves in recent years designed to strengthen that contention.

But there has been one big flaw in the running of "The Official Student Newspaper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nd that has been its monopoly status. The basic human drive for competition has been by default directed at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rather than at a competing newspaper, and their result, in the judgement of many, has been mediocrity at best, and demagoguery at worst.

Seventy-seven years is enough. It is time there was a truly "independent" student newspaper at Wisconsin, one which competes in the open market-place, and must make its editorial and business decisions on the basis of that competitive market. A newspaper is not truly worthy of the name until it is clear of the artificially protective and restrictive atmosphere of "official student newspaper" status.

(译文:

欢迎大家阅读《威斯康星大学社区与你们一样的人们将会在麦迪逊校园里看到学生新闻史上一个有意义的新起点。自1892年4月4日以来,在这里只有一份报纸。这份报纸尽管有其认可的地位却认为它自己是“独立”的。近年来这份报纸作了各种举动旨在加强这一论点。

在办“威斯康星大学学生正式的报纸”当中有一个大的缺陷,那就是它的垄断地位。人类本能的竞争动力势必指向学校当局,而不是指向参与竞争的其它报纸。其结果是在许多人看来报纸办的好时质量至多是中等,办的差时甚至是煽动性的。

77年已经够长了。是在威斯康星州有一份真正“独立的”学生报纸的时候了,应该是一份在公开市场上竞争的报纸,它应该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作出它的编辑如商业决定。一份报纸若不清除掉“正式的学生报纸”的地位所给予的人为的保护性、限制

性的气氛，就不配称作是真正的报纸。)

例 2: 韩国学生用英文写的社论，取自《先驱报》1993 年 12 月 9 日，标题是：“不公平的”全球贸易

“Unfair” Global Trade

As pressure to open market grows, Korea loses confidence in battling against the Western giants. It appears that the demand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nfluenced greatly without exception.

Since the departure, the government has said to adhere to open anything but the rice-market seemed to change its attitude. Rice is considered vital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farm industry. Farm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not only to supply substantial food but to preserve the national culture. If the government gives up the rice farming, it would open up the domestic markets 14 other farm products as well.

Regarding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twenty-nine countries including France, Japan, Swiss and Canada still adhere to limit their import items. Not onl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limited their import limitations to 14 items.

President Clinton said that the only way for all countries to be wealthy is to expand global growth and to expand each country's fair share of global trade. At the same time,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aims only to fulfil their interests not in maintaining “fair share of global trade.” South Korea has become one of its victims. Grouping Asia -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are not on cooperative terms. There is only pressure from one side.

If the opening of market is inevitable in order to avoid economic isolation and to maintain tie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var-

ious precautions should be taken before opening. When countermeasures are reasonable and acceptable to domestic farmers, people will not object.

While “rumors”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open the rice-market gradually are in the air, the President is busy only avoiding his responsibility. At first, he ought to reveal the truth and address his policy to farmers assertively.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listen to people’s voice. As the Uruguay Round trade negotiations deadline of December 15 nears, the Blue House should not yield to the pressures of the Western giants, giving up economic sovereign. The president is asked to show a responsible attitude. (注：原文中的若干语言错误未予改动。)

(译文：

随着开放市场压力的增加，韩国在抗拒西方大国中正失去信心。看来贸易自由化的要求毫无例外地给予很大的影响。

政府曾表示除大米市场以外执行贸易开放政策，但此后似乎改变了它的态度。大米对于农业至关重要。农业不仅在提供基本食粮方面，而且在维护民族文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政府放弃大米种植，那么国内市场对另外 14 种农作物也将开放。

就贸易自由化而言，包括法国、日本、瑞士、加拿大在内的 29 个国家仍然对进口项目有所限制。不仅如此，美国也有 14 项属进口限制项目。

克林顿总统曾说过，所有国家的致富之路是促进全球的发展，同时扩大每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合理份额。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却是致力于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全球贸易的合理份额”。南韩已经成为这一政策的牺牲品。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来看，美国和韩国并不是合作关系，有的是来自一方的压力。

假如为了避免经济上孤立和保持与国际群体的联系而必须开

放市场,那么在开放之前必须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假如对抗的措施对于国内农民是合理和可接受的,人民不会反对。

社会上流传政府将逐步开放大米市场的谣言,与此同时,总统急于回避他的责任。他首先应道出真相,讲明他对于农民的政策。倾听人民的声音也是重要的。12月15日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的截止期日益逼近,青瓦台不应该对西方大国的压力退让,放弃经济自主。人们要求总统拿出一个负责的态度。))

在例1中作者在第一段中将主题点出,然后在第二、三段中发挥主题:提出更多的论据。在例2中,作者在头5段主要是提供背景说明情况,在文中最后一段才明确提出他的主张:政府不应屈服于大国压力,不应放弃经济自主,应在开放市场时有所防范。

有的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摸不透”(inscrutable),这里不是因为弄不清某个句子的意思,而主要是由于不习惯我们的交际风格。语言学家赵元任的看法是汉语中一半的讲话属于“主题—述题”(topic-comment)结构。在一个句子中,主题部分列举人、事物或观念,述题部分则予以评述。主题和主语、述题和谓语不是相同的概念。主语和谓语是描写语法结构的术语,而主题和述题则是描写信息结构的术语。主题一般是已知信息,而述题是未知信息。英语中也用主题—述题结构,但更习惯于使用主语—谓语结构。(有时主语—谓语结构与主题—述题结构完全一致,但有时并不一致,详见王宗炎主编《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topic条。)在汉语中,主句和从句的位置通常是从句在前,主句在后,这与汉语习惯于主题—述题结构有直接的关系。汉语中的成对主从句有多种,例如:

表因果关系:因为……,所以……

既然……,所以……

表条件:如果……,那么……

表让步:虽然……,但是……

华裔美国学者杨威玲 (Linda Wai Ling Young) 认为,³⁵ 在解释、说理的过程中, 中国人的思路受到主题—述题结构的直接影响, 通常把结论性的论点放在一段话的最后。有时尽管话很长, 却仍然把 *because* (因为) 放在前面, 把 *so* (所以) 放在后面, 而这是不符合英语习惯的。杨威玲将香港中国商人在公司会议讨论时的英文发言录音并作了分析, 发现这类例子很多。她也录了北京一位营养学教授的谈话, 下面是谈话的实录:

American: How does the Nutritional Institute decide what topics to study? How do you decide what topic to do research on?

Chinese: **Because, now, period get change. It's different from past time. In past time, We emphasize how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Nutrition must know how to solve some deficiency diseases, such as x, y, z. But, now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must do some basic research. So, w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fundamental problems. We must concentrate our research to study some fundamental research.** (*research* 应为 *problems*, 疑为口误。)

(美国人: 营养学研究所怎样决定研究什么题目呢? 你们怎样决定在什么题目上做研究工作呢?)

中国人: 因为, 现在, 时代变化了。现在和过去不同。过去, 我们强调怎样解决实际问题。营养学必须知道怎样解决某些营养缺乏症。在我们国家, 我们有一些营养缺乏方面的疾病, 例如甲、乙、丙、丁。但是, 现在做基础研究是重要的。所以, 我们必须考虑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必须集中我们的研究于某些根本性的问题。)

英语中黑体部分是论据, 斜体部分是结论。香港商人与北京教授的说理方法雷同, 都是先把材料摆出来, 作为铺垫, 最后才讲出重要的结论性的意见。杨威玲为了验证此点, 作了又一项试验,

她要五个中国人假想自己是在出席一个讨论预算的会议，预算中尚有 58 万镑余额可供使用。五个人中，一人作主席，其余人逐一发言。她发现他们的说理方法与香港商人和北京教授的方法惊人地一致，都是先摆情况，最后建议钱如何使用。出席会议的五个人全部用英语，会议进行很顺利，人们之间的交流毫无困难，也就是说与会人对于这一说理方法完全习惯，从而证明这不是某个人的特殊说理方法。然而当录音放给英美人听时，他们却觉得理解上有困难，主要论点淹没在一大堆材料之中。他们认为应该先把主要论点简明扼要地摆出来，这样讲话才生动有力。他们甚至怀疑中国人是否在那里绕圈子，回避主要问题。杨威玲继而又询问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先摆材料，最后才提出结论性的看法。他们解释说，如果一开头就拿出自己的意见显得不谦虚、没有礼貌，对听众欠考虑，而且如果先讲了主要观点，后面的话别人也就不必再听。中国人的讲话方式是先给听众提供材料，让听众判断他讲的话是否有道理。

从以上两方面的反映，我们可以看出说理方法上的不同实际上表明了价值观念的差异。美国人认为先把自己的观点鲜明地摆出来具有说服力，而中国人认为先与听众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把材料一点一点地讲出来，最后画龙点睛才具有说服力。中国人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不愿意与他人形成对抗。由此可见，交际风格与深层文化密切相关。

学者们通常都把归纳法（个别→一般）说成是东方（或亚洲）的交际模式，把演绎法（一般→个别）说成是西方（或欧美）的交际模式。大量研究材料证实这一看法。但 Scollon（夫妇）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他们指出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存在这两种模式。³⁶ 尽管东方人通常喜欢用归纳法，但是在有的情况下也使用演绎法，直截了当提出问题，比如在亲密朋友之间可以不必作任何铺垫，见了面就说：“咱们去喝杯茶（吃顿便饭、看

场电影)怎么样?”又比如,对外圈人(服务行业的人)也不必先讲许多情况再提出要求,而是开门见山,如对出租汽车司机直接说:“我去×××。”在西方,尽管人们一般喜欢用演绎法,先提出问题,然后再提供细节,但是,在有的情况下也使用归纳法,比如,在向朋友借一大笔钱或提出某种相当难办的要求时,往往也是先讲些情况,试探一下口气,然后再提出要求。因此,Scollon 夫妇认为简单地说一种模式属于东方,另一种模式属于西方是不准确的。真正的分歧在于对礼貌的不同看法。演绎法适用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讲话人认为提出的看法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是认为自己有权提出这一看法,所需要的只是作一些说明。归纳法适用于另一种情况,即讲话人认为他提出的看法有可能遭到对方的反对,因此先摆出各种情况,后提出看法。东方人出于礼貌的考虑,不愿意自己认定有权提出某种看法或把某一看法强加于对方,因此习惯于用归纳法(即用种种材料、事实铺垫的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小结:

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同时又受到文化的巨大影响。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可以决定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依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语言的诸因素中词汇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在词语的内涵方面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往往很大。除了词义方面的差异以外,在语用规则和语篇结构方面也有许多差异。这些差异大多与民族文化传统有关。

思考题:

1. 请你举3个例子说明文化对于汉语的影响。
2. 你同意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吗?为什么?
3. “牛”在汉语中的文化内涵与 bull 在英语中的文化内涵有何异

同?

4. 在语用规则方面你能否举例说明英语与汉语的某些差异?
5. 在语篇结构方面除了本章所讲的以外你认为英美人与中国人之间还有什么差异?

-
1.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35页。
 2. Yuen Ren Chao. (1976)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23-330.
 3. 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21—22页。
 4. 陈原:《社会语言学:关于若干理论问题的初步探索》,商务印书馆,1984年,179页。
 5. 同注1,199页。
 6. 同注1,200页。
 7. 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12页。
 8. 同注3,120页。
 9. 同注7,9—12页。
 10. David G. Mandelbaum. (ed.) (1949). *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162.
 11. Benjamin Whorf. (1952) *Collected Papers on Metalinguistic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p. 5.
 12. Harry Hoijer. (1954) 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 In Larry Samovar and Richard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1988) 5th edn.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pp. 227-229.
 13. H. H. Stern. (1983)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06.
 14. Gail Robinson. (1985)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Processes and Approaches for Foreign Language,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Bilingual Educators*. Pergamon Press. pp. 14-15.
 15. 同注4,83-84页。

16. 同注 4, 84 页。
17. 同注 7, 2 页。
18. 张中华:《对开展国情语言研究的几点思考》, 载王福祥、吴汉樱编《文化与语言》,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年, 38 页。
19. 伍谦光:《语义学导论》,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133—146 页。
20. 蔡振生:《中日文化比较》,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 年, 176—178 页。
21. 同注 7, 165—167 页。
22. 同注 7, 126 页。
23. 同注 7, 127 页。
24. 同注 3, 18 页。
25. Nessa Wolfson. (1983) Rules of Speaking. In Jack Richards and Richard Schmidt (ed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Longman. pp. 73—77.
26. 同注 25, 72 页。
27. John Platt. (1989) Some types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cross cultures: Sense and sensibility. In Ofelia Garcia and Ricardo Otheguy (eds.)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Cultures across English*. Mouton de Gruyter. pp. 21—23.
28. Dean Barnlund and Miho Yoshioka. (1990) Apologies: Japanese and American Style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 14, pp. 193—206.
29. Robert Kaplan. (1966) 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Vol. XVI, Nos. 1—2. pp. 1—20.
30. Satoshi Ishii. (1988) Thought Patterns as Modes of Rhetoric: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Larry Samovar and Richard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5th edn.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p. 99.
31. Nippon Steel Corporation, Personnel Development Office. (1982) *Nippon: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Tokyo: Gakusei-sha. p. 297.
32. John Condon. (1984) *With Respect to the Japanese: A Guide for Americans*. Intercultural Press. pp. 39—47.
33. Robert F. Norton. (1987) A Comparison of Thinking and Writing Pat-

- terns in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Occasional Papers in Intercultural Learning*, No. 12. AFS International Intercultural Programs, Inc.
34. Kyeongja Kim. (1996) A Comparison of Rhetorical Styles in Korean and American Student Writing.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Vol. VI, No.1.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35. Linda Wai Ling Young. (1982) Inscrutability Revisited. In J. J. Gumperez (ed.),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2 - 84.
36. Ron and Suzanne Scollon. (1995)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Blackwell. pp. 74 - 93.

第六章 非语言交际

一、非语言交际的界定

通常人们谈交际时,总是首先想到语言,殊不知语言只是人们交际的一个手段。除了语言这一重要工具,人们还使用许多其他手段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传送各种信息。一切不使用语言进行的交际活动统称之为非语言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包括眼神、手势、身势、微笑、面部表情、服装打扮、沉默、身体的接触、讲话人之间的距离、讲话的音量、时间观念、对空间的使用等等。有的学者认为人们的直接交际活动中,30%的信息通过语言传送,70%的信息依靠非语言手段¹,也有的认为90%的信息来自非语言交际。不论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但至少可以看出非语言交际的重要。说一个人沉默不语,并不是说这个人无所表示,沉默本身就具有意义。至于眉眼、手势、身势等所表达的意思则更多。

在对于交际的研究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于非语言交际这一分支的研究,这方面的著作不断增加。人们通常把非语言交际的研究追溯到达尔文对于动物与人类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本世纪20年代 Kretschmer 的《体格与个性》(*Physique and Character*)一书问世,标志着体态语研究的正式开端。Birdwhistell 于1952年出版《体语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Kinesics*),提出记录体态语的一套符号。人类学家 Hall 连续出版四部著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隐藏的维度》(*The Hidden Dimension*)、《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及《生命之舞》(*The Dance of Life*)——对于非语言交际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

解,在非语言交际研究领域的影响巨大。Fast 的《体态语》(*Body Language*),中文本译名为《体态与交际》则是将体态语介绍给大众使之引起广泛注意的一本畅销书。书中虽然并没有对非语言交际作系统的详尽的介绍,但其影响不可忽视。

对于非语言交际的定义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展开深入的讨论,但我们不妨把有些定义作一简单的介绍。Samovar 和 Porter 的定义是:“非语言交际包括在交际的环境中人为的和环境产生的对于传播者或受传者含有潜在信息的所有的刺激。”² 定义着重指出:1) 非语言交际发生在交际过程之中,包括从事交际的双方,也就是说,并不是任何一个动作都是非语言交际。例如,一个人独自工作时伸懒腰打哈欠不能算作非语言交际,但假如一个人出席一个会议,坐了许久,他不断地明显地做伸懒腰的动作,则是在进行非语言交际。他企图向主席暗示会议开得过长,他已经不耐烦了。2) 非语言交际既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例如由于汽车拥挤造成乘客与乘客之间的距离缩短,这是无意识的,但这种拥挤现象却造成了人们之间的非语言交际。3) 不论是哪一类非语言交际,都必须包括潜在的信息。

Malandro 和 Baker 把非语言交际界定为“个人发出有可能在他人头脑里产生意义的非语言暗示的加工过程。”³ 他们的定义与前一个定义一样强调意义的产生。例如,眨眼本身是一个生理动作,并不包含任何意义,但是,如果用眨眼向人打招呼或做暗示,则属于非语言交际。如果一个人故意模仿一个不会眨眼示意的人乱眨眼则意义更加丰富。

体态语(*body language*)是非语言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眼神、手势、身势、面部表情、体距、体触等。非语言交际还包括副语言(*paralanguage*)、对时间与空间的利用。副语言亦称为伴随语言,包括音质、音幅、音量、语速以及会话中发出的一些非语言的声音。

二、非语言交际的特点与作用

根据 Malandro 与 Baker 的分析,非语言交际与语言交际在五个方面存在区别。

首先,语言交际遵循语法规则,具有严谨的结构,而非语言交际却没有正式的规则和模式,没有固定的结构,因此要正确地理解非语言交际行为往往需要综合分析周围的情况才能确定。例如,一个人用拳头打另一个人,既可以是表示愤怒,也可以表示亲昵的关系。又比如,人们会因悲伤、激动而啼哭,但也可能莫名其妙地哭。

第二,语言交际使用特定的符号,而非语言交际却没有一套具有明确意义的符号。英语使用 26 个字母和用字母组成的词,字母和词是表达概念的符号。汉字是汉语的表意符号,同样具有明确的意义。在非语言交际中尽管也有许多类似符号的表意手段,但是,并不是每个动作都具有固定的意义。例如,拇指与食指合拢,其余三指伸直,这个动作在英美文化圈内是“很好”、“没问题”的意思,在我国是“三”的意思,但是在有的拉美国家却是猥亵的动作。

第三,语言交际在讲话的时候进行,在停止讲话的时候中断。讲话一般总是时断时停的,因此,语言交际是非连续性的。非语言交际与此不同,它是连续不断的。一个人走进一个房间,不论他(她)是否自觉,都在不断地进行非语言交际。他(她)的衣着、举止、表情都在不断地传达某种信息。

第四,语言是后天习得的,而不是生而知之。非语言交际的手段一部分是人类的本能,例如,哭笑以及一部分表情,有些手段则是后天习得的,例如一些手势、姿势、副语言手段、服饰以及对时间和空间的利用等。

最后,从神经生理学的角度看,在从事语言交际与非语言交际时使用的大脑“半球”不同。目前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证明,

在从事语言交际时大脑的左半球在进行工作，负责处理语言刺激，作信息分析和推理。而非语言刺激如空间的、画面的和完形的信息则是由大脑的右半球处理。

非语言交际通常与语言交际结合进行，在不同的情况下起着不同的作用，大致上起补充、否定、重复、调节、替代或强调的作用。⁴我们在机场欢迎客人，一边说：Welcome to Beijing，一边热烈握手。这握手的动作是对所说的话的一种补充。当你接到你不喜欢的礼物时，尽管嘴里说如何如何喜欢，但脸上的表情却流露出你的真实的不愉快的表情，也就是说，你的表情否定了你所说的话。一般说来，在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传达的信息冲突时，人们倾向于相信后者。我们有时一边说话一边用手势表达同样的意思。例如，一边说要两杯饮料，一边伸出两个手指，重复已经发出的信息。在两个人谈话时，常用眼神和语调表示下面该是谁讲话（语言学中称为话轮转换），调节相互的关系。在有的情况下，无法用语言交流信息，必须用手势或其他办法。例如，交通警察指挥机动车辆，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员在嘈杂的大厅里传递买卖的信息和行情都使用非语言手段手势或指挥棒替代语言交际。在人们讲话时，常常用手势加强语气，或强调某一个论点。

三、眼神、手势、身势、面部表情及服饰

1. 眼神

研究非语言交际的美国学者和教师早就发现，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在听教师讲话时眼神不同，黑人儿童常常眼睛望着地或者其他地方，避免直接看着教师的眼睛，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家庭的教育，知道听讲话时直视对方是不礼貌的。白人儿童从小受的教育正好相反，父母告诉他们，听人讲话时一定要看着对方的眼睛，一是表示在聚精会神地听，一是表示诚意，而眼睛看地或者其他地方是不诚实的表现。在亚洲的许多国家人们认为讲话时眼睛直视对方是不礼貌的。尤其是下级在听上级讲话时，下级眼睛

往往向下看以表示尊敬。阿拉伯人在讲话时通常总是盯着对方的眼睛,与中、日、韩国人有明显的不同。

对于眼神的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注视对方。妇女之间在谈话时看对方的次数比男人之间谈话时看对方多,而且时间长。一种解释是妇女比男人更重视人际关系,更重视人们之间的感情交流。

研究还表明,“我们对不喜欢与之谈话的人,瞧他的次数就会减少,因为看是一种表示喜爱的信号。当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和注意时,看对方的次数就会增多。”⁵

眼神还对话轮转换起调节的作用。听讲话的人逐渐加强对讲话人的注视,点头更加频繁,这说明话轮即将转换,听的人可能要接着讲话。研究者发现,目光接触在对话的前三分之一部分占63%的讲话时间,但到了对话的后三分之一时目光接触增加到83%,“接替的暗示要想成功,对话的双方必须在交换角色的那一点或离那一点不远时目光接触。这些暗示有助于我们了解何时放弃谈话,何时得到反馈并核实反馈,何时继续相互作用。”⁶

对于陌生人通常都是目光接触后立即移开。如果与陌生人目光接触后迟迟不挪开视线,往往包含着好奇、喜爱、发生兴趣等含义。例如,看到一个身穿奇装异服的人,目光接触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一个男孩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目光可能迟迟不移开,表示他对于这个女孩产生了兴趣,有异常的好感。但是,我们的文化习俗又规定盯住陌生人看是不礼貌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人们又要故意掩饰,以避免给人以凝视的印象。

2. 手势

各民族都用手势表达一定的意义,但同一手势在不同的文化中却可以表示并不相同的意义。例如,将手掌平放在脖子下面(如图1)在我国文化中是杀头的意思,但是在英语国家的文化中却可以表示吃饱了的意思。

即使在同一民族中,由于地区习俗的不同,同一手势也可能



图 1

会具有不同意义,例如,在广东,主人给客人斟酒时,客人为了表现感谢,用食指和中指轻扣桌面,而在北方同一动作却表示不耐烦的情绪。

有些手势是某一文化所特有的,例如,英美人所用的一些手势我们并不使用。为了顺利地交际,我们必须了解它们的意义。美国人站在公路旁边向上伸出拇指(如图2),这是向过往的汽车司机表示,希望能搭他们的车。英语 thumb a ride 表达的即是这个意思。英美人把中指放在食指上面(如图3),表示希望事情能办成功,具体说法是 Let's keep our fingers crossed。伸出食指与中指,作V形(如图4),表示胜利。这是二次大战胜利后传布开的手势。把两只手摊开,耸耸肩膀(如图5),表示“我不知道”,或“没有办法”。把手兜起来,放在耳后(如图6),表示听不见或听不清楚。把手伸出来,微微展开手指(如图7),表示等一等,别着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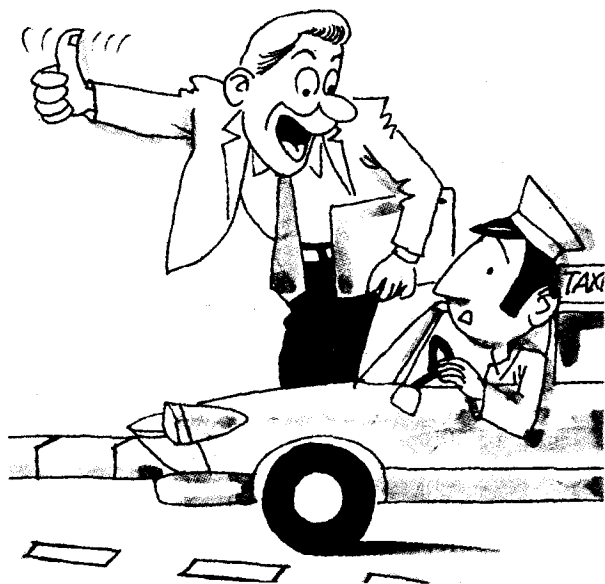


图 2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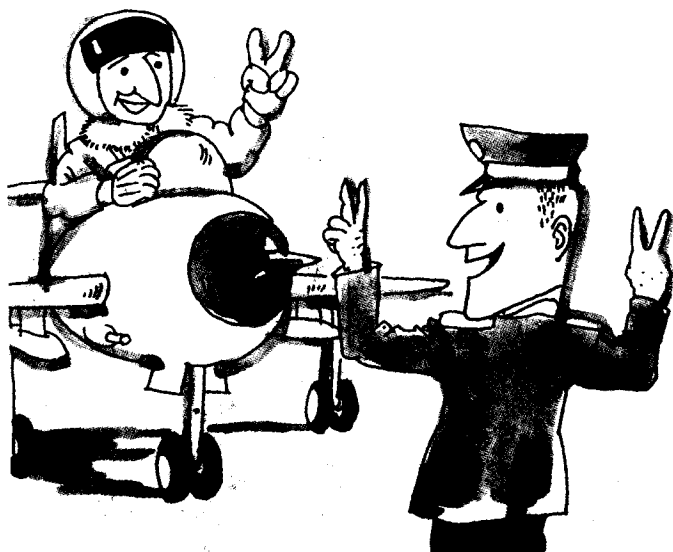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招呼人走过来时，我们伸出手臂，手掌向下，手指上下移动（如图8），而美国人则是伸出手臂，手掌向上，手指前后移动（如图9）。我们招呼人过来的手势类似美国人叫人走开的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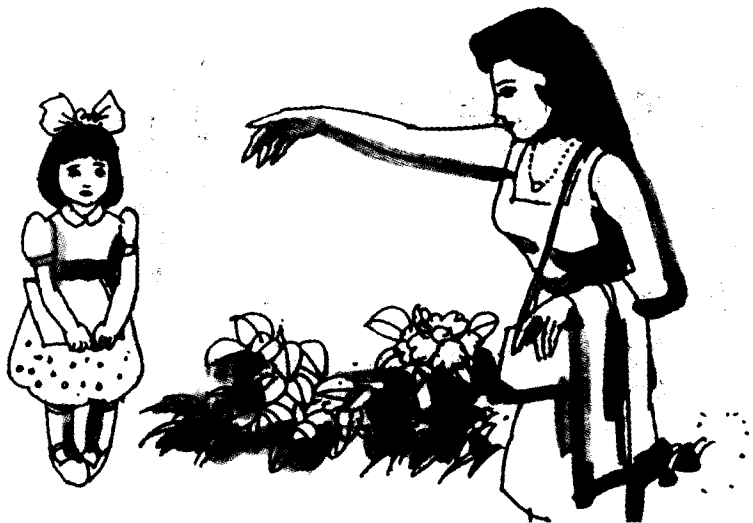


图8

也有跨越文化的手势，例如把拇指与食指中指放在一起轻轻搓动，在英美、中东和我国都是钱的意思（如图10）。

在穆斯林国家，左右手有严格的分工，右手清洁，用以待客，左手肮脏，不能拿东西给人。与穆斯林国家的人打交道时，必须尊重他们的习俗，送东西给对方时必须用右手。

3. 身势

总的来说，南欧、中东、拉丁美洲地区的人们讲话时动作较多，动作幅度也较大；北欧、英美人动作较少，幅度也较小。中国、日本、朝鲜人也属于动作较少、幅度较小这一类。有人戏称意大利人若是上肢做了截除手术，就会讲不出话来，可见臂膀动作对于他们十分重要。⁶



图 9



图 10

我们从电影上看到，西方国家大城市的人在街道上走时总是

行迹匆匆,很难看到有人在街头缓缓地散步,这自然与生活速度有关,但也反映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刚到西方国家时往往不习惯这种“赶路”的方式,生活时间久一些,才逐渐习惯。美国密苏里大学学生演出的《雷雨》,曾在我国电视台转播,获得普遍的称赞,但是观众也注意到美国演员在台上走路的姿态完全不像二三十年代中国人走路的样子。

美国教师和学生教室里站立和坐着的姿势显然与我国师生不同。我们参观他们的小学,常常觉得学生在课堂上太随便,缺乏纪律,东倒西歪,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相,教师管教不严。英美人参观我们的小学,又会认为中国教师对学生管得太死,学生没有什么自由。这里既牵涉到教育思想,又与文化背景有关。我们强调集体、纪律、合作,他们强调个人、自由、发展自我。在大学的课堂上,美国教师有时坐在讲桌边上与学生一起讨论,这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合体统,但美国教师的想法是在课堂上创造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讨论的气氛。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学生对于英语国家的教师讲课时随便坐在讲台上感到“震惊”。被调查的是一批中国进修教师,年龄在20—60岁之间。他们对于外国教师坐在讲台上反映相当强烈,将它放在文化不适应的前四项之中。有的甚至说:“我最讨厌的是老师讲课时将腿放在前面,坐在讲台上。”⁷

姿势与地位的高低有一定的联系。一般来说,地位高的人比地位低的人姿态更随便。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医院里大夫在职工会议上可以坐得比较随便,可以蹀跹到护士的桌子旁,靠着桌子说话,而护士和服务人员却必须注意自己的举止要得当。⁸在我国,地位在人们的姿势中亦有明显的表现。地位低的人通常表现比较拘谨,站立得比较直,身体微微前倾,表现出尊重对方的样子。

姿势与性别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从姿势上可以明显地区分出是男性还是女性。走动时女性的上臂常常贴近身体,而男性的上臂摆动的幅度在5—10度之间。在社交场合,男性站立的姿势比女性更放松,男性常常一只脚伸出去,人

稍往后仰，而女性更倾向于直接面对对方。⁹女性在坐时往往两膝紧拢在一起，微微偏向一侧，或在踝部交叉，不允许跷着二郎腿，自然更不允许将脚抬起来放在高处。

蹲坐是一个很自然的休息姿势，在我国农村十分普遍。墨西哥人也习惯于蹲坐，但是墨西哥的近邻美国人却从小就受到不要蹲坐的教育。据说，在美墨边境的直升机上的巡逻人员往往依据人们坐的姿势来判断边境上的人是墨西哥人还是美国人。

通常我们说点头称是，摇头自然是表示否定。然而并不是所有民族都如此。有一次，一位中国工程师给一群斯里兰卡青年讲抽水机的用法，讲完之后问他们懂了没有？他们都微微摇了摇头。工程师见他们摇头就又重复了一次，并亲手示范表演。再问他们，得到的回答仍是微微摇头。工程师刚要重复第三遍，正好在中国留过学的当地翻译来了，经过翻译一解释，工程师才明白原来在斯里兰卡微微摇头是表示已经明白了的意思。斯里兰卡人的习惯是：表示肯定答复或同意时微微摇头，表示否定答复或不同意时使劲儿地摇头，但在表示非常赞同、十分明白时则还是要点头。¹⁰

4. 面部表情

我们通常认为西方人面部表情多，而西方人认为亚洲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不易琢磨。应该说，在面部表情上确实存在民族种族区别，不同民族表达感情的方式和程度存在着差异。Gary Althen 指出美国人的面部表情比亚洲人多，但比拉丁美洲人、南欧人少。¹¹实际上，在亚洲人中面部表情仍有很大的区别。在日本人看来，中国人的感情比日本人外露。这从人类学家祖父江孝男的记述中可以得到证明：

“我做大学生的时候，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在日本数年，日语熟练得近于完美。和我们用口语谈笑的时候，我们完全只能看见日本人的样子。可是，有一次，他家乡的朋友偶然到那里来探望他，一开始用汉语讲话，他的神态突然地全都

变了。表情夸张，在那时显露出来的已经完全是地道中国人的样子。神情兴奋，姿势夸张，眉毛一起一落。‘噢，他仍然是中国人的样子呀！’我们从一旁看着他，心中暗自感叹。”¹²

即使在同一个民族中，面部表情依旧存在着差异，最明显的莫过于男女的差异。

一位心理学家对于男人和女人的面部表情作了一项调查。调查的方法是给被试验者放映估计能够引起强烈反应的幻灯片。这些幻灯片有的让人看了难受，例如受了烧伤的病人；有的让人看了高兴，如表情愉快的孩子；有的是反常的幻灯片，例如两次爆光的照片；有的是风景幻灯片；还有的涉及性的幻灯片。被试验者在观看这些幻灯片时通过闭路电视对他们的面部表情录像。心理学家发现从女人的表情可以更容易判断她们是在看什么幻灯片，而根据男人的表情作判断就要困难一些。男人表现为心跳加快，内分泌增多。这说明男人更倾向于掩盖自己的感情，而女人更外露。¹³

微笑也反映出性别差异。Henley 组织他的学生进行一次试验。他让学生在公众场合对 300 个人（男女各一半）微笑，然后观察对方如何反应。结果发现 76% 的人回报以微笑，但这其中存在性别差异。89% 的女性被试验者回报以微笑，但仅有 67% 的男性回报以微笑。¹⁴

在微笑方面同样存在民族差异，尽管一般说来笑表示心情愉快对于人类来说是共同的。美国人认为笑总是表示高兴、情绪高昂或者认为某件事很滑稽。日本妇女因为慌乱或尴尬而微笑，美国人感到不理解。澳大利亚小说家 Frank Moorhouse 在访华后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题为《文化代表》(Cultural Delegate)，写得十分幽默，其中有一段是澳大利亚客人与中国主人的饶有兴味的对话。每次澳大利亚客人提出问题，中国主人都先报以一阵笑声；然后再

直接或迂回地回答客人提出的问题。这虽是一篇小说,但可以看出澳大利亚人对于中国主人的笑有时感到不易理解。

5. 服饰

衣服有三项功能:舒适、保护遮羞与文化展示。尽管服装仍然具有前两个功能,但它作为文化标志的作用却愈来愈大。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服装由法律规定,以便区分不同的社会阶级。例如,贵族以下的阶级不得穿长得盖住臀部的紧身衣或穿鞋尖长于两英寸的鞋。如果一个骑士被发现穿着超越他地位的衣服,就会被罚款,衣物也会被没收。¹⁵在我国,历代朝廷都对于官服的颜色、花纹、式样有极严格的规定。黄色是帝王服装的颜色,文武官员不论职位多高都不得使用。

在现代社会中,衣着象征身分地位,或表明职业。美国有的高级餐馆明确规定穿牛仔裤者不得入内。IBM 公司曾规定,公司代表和经理必须穿白衬衫、黑色套装和硬领子。目前虽已不再坚持必须穿硬领,但白色衬衫和黑色套装仍是 IBM 可信任的象征。在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律师、银行和大公司的雇员一般衣着比较正式。人们发现,服装对于一般人有一种说服的作用。Bickman 曾进行过多次服装对其他人行为的影响的研究。¹⁶在一次研究中,他让四个男人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街道上命令 153 个成年人站住。这些男人的衣着包括平民模样的(穿运动衫或戴领带),送牛奶模样的(制服、白裤子和牛奶瓶),以及卫兵模样的(制服、领章、领徽,但不佩带枪)。这四个男人要求行人做下列当中的一件事:1) 抬起一个手提包;2) 为别人放一角钱到停车计费器中去;3) 站在公共汽车站牌的对面。在每一种情况下,穿卫兵制服的话都更起作用。被要求放一角硬币到停车计费器的人中 83% 都服从了。这说明服装在取得人们合作方面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场合与服装的要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场合正式,对于服装要求比较正式。在非正式场合,衣着可以比较随便。西方社交活动

中在请柬上往往对于着装有单独的说明,印在请柬的右下角处。若标明是 White tie,则需着夜礼服或燕尾服,硬领衬衫、黑色套装和白色领带,这是最正式的服装。女性着裸肩袒背的深色长裙。若写 Lounge suit 则只需要穿西装打领带,对于颜色没有严格要求。女客人可着套裙。若写 Dress informal 则衣着比较随便,年轻人的聚会一般没有严格的衣着要求,许多人穿 T 恤衫牛仔裤。

四、触摸

Heslin 将触摸分为五类:功能、社交、友爱、情爱、情欲。¹⁷大夫检查身体、理发师理发触摸头和脸,都属于职业性的触摸,这种触摸是冷漠而不包含个人感情成分的。被触摸者一般说来是被当作“非人”(non-person)看待。社交性质的触摸包括握手和礼仪性质的拥抱。亲友分别许久,再次见面时亲密地握手和拥抱则属于友爱的类型。男女恋人的触摸属于情爱类,而最后一个类型则属于性接触。一般存在于两性之间。

对于触摸的对象、范围、场合、形式,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规定。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领域,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造成尴尬甚至很不愉快的后果。

人们早就发现,有些民族的人身体接触较多,有些民族的身体接触较少,从而将文化划分为“接触性文化”(contact culture)与“低接触文化”(low-contact culture)。有的学者认为,气候暖和的国家多属接触性文化,气候寒冷的国家多属低接触文化。接触性文化包括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地中海地区(包括法国、希腊、意大利)、欧洲及中东的犹太民族、东欧及俄罗斯人、印尼人及西班牙血统的民族等。低接触文化包括北欧大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族人以及日本人。澳大利亚人居于两者之间。一种解释是在寒冷地区的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把工作任务完成,因而人际关系趋于冷淡,而气候温和地区的人们可以在户外多活动,相互之间关系较密,因而身体的接触也较

多。这似乎能解释某些国家和地区在接触程度上的区别，但是，实际上这样解释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也无法解释有些现象。例如俄罗斯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然而俄罗斯人却比我们中国人喜欢拥抱和接触，显然，这里涉及文化传统问题，只是归因于气候比较牵强。

英美人对于身体接触十分敏感，通常都极力避免，他们忌讳在拥挤的公共汽车或地铁火车上与陌生人的身体有长时间的接触，从人堆中挤过去则更是大忌，而且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在电梯上，不得不与周围的人有一些身体接触的情况，英美人通常把肩膀和两臂尽可能收紧，显出小心翼翼、情绪紧张的样子，这充分反映出人们对于身体接触的态度。通常的情况下，偶尔不慎碰到其他人的身体，总要表示抱歉。这与一些拥挤的亚洲国家的情况十分不同。有些西方游客在我国一些售票处前看到拥挤的情形，常常显得不知所措，既要买票，又害怕与周围人有任何身体接触。

另一方面，美国人与日本人相比起来被触摸的情况不是更少而是更多。Barnlund 作过一次试验，他让一组美国人和一组日本人分别说明在他们 14 岁以后身体的哪一部分被父母亲、同性朋友或异性朋友抚摸过。调查结果说明被抚摸最少的美国人比被抚摸最多的日本人实际被抚摸的次数还要多，有些日本人在 14 岁后未被任何人抚摸过。¹⁸

总的来说，依照我们的文化传统，在公开场合，人们的身体接触较少，尤其是男女间接触更少。通常人们不会在公众场合拥抱、接吻，谈恋爱的男女青年牵着手走路做亲昵表示，这也是近年来的现象，在小城镇和农村仍属少见。同性之间手拉手走路，甚至勾肩搭背，却是容许的，尽管这种现象多见于年轻人中间。然而，在西方国家，两个青年男子或女子手拉手在街上走路，往往会被认为是同性恋者。异性间同样的行为却被视为自然。在我们的文化中，触摸小孩是一种亲昵的举动，可以摸摸孩子的头，

也可以抱过来吻,如果是朋友邻居的孩子,人们会认为这是友好的表示,但是,在西方,除非是家庭成员或极为亲密的朋友关系,通常人们都不随便触摸或吻孩子。在泰国这样的佛教国家,孩子的头是绝对不能抚摸的,他们认为头是一个人最神圣的部位,随意触摸他人的头部是极大的不恭,小孩子的头只允许国王、僧侣和自己的父母抚摸。在理发店理发之前,理发师通常先说“对不起”,然后才能开始理发。

在西方国家,家庭成员、关系密切的朋友在分别一段时间以后再次见面,或者在告别时,常常拥抱和接吻。这通常是在妇女之间和男女之间,在男人间只限于握手,但阿拉伯国家、俄罗斯的男人也常常拥抱。在西方国家公众场合的拥抱是一种礼仪,通常不搂抱得很紧,接吻也只是面颊触碰一下(touch cheeks),与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接吻完全不同。拥抱时间长短、接吻次数多寡与双方关系、分别时间长短等有关。

在我国,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人们在公开场合通常都不拥抱、接吻,对于西方文化中的这一部分特别难于适应。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可以用这方面的适应度测量出在西方国家的华人接受当地文化的程度。一般来说,已经在公开场合习惯于拥抱、接吻的华人对于西方文化的其它方面也都比较适应。¹⁹

笔者在1986年对20名在美国进修归来的中国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共列举46项调查内容,包括见面打招呼、谈话、告别、接受邀请、排队、手势、体距、体触、接吻、交友、学习模式等。调查结果表明,中国教师在美国感到最难适应的是体触、接吻、拥抱,居于所有调查项目之首。在美国人看来只不过是属于社交范围的拥抱接吻,中国教师却感到是十分尴尬的局面。

国外的调查表明英美人、法国人与拉丁美洲人在身体接触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调查的方法是调查者在大学和大学附近的商店里观察和记录一般关系的两个人坐着谈话时在一小时内触摸对方身体的次数。调查的结果是:英国伦敦0次,美国佛罗里达州

的盖恩斯维尔 2 次, 法国巴黎 10 次, 波多黎各的圣胡安 18 次。我国潘永樑教授按这一模式进行了类似的调查。在公园中进行了十多次这样的观察, 发现在公园中交谈者体触的次数平均是 8 次。²⁰这说明中国人在公众场合在身体接触方面还是比较拘谨的, 比英美人数多, 但比法国人、拉丁美洲人数少。

在握手方面, 我国的习惯与英语国家也有一些差别。在英语国家, 两名男子相遇时伸出张开的手掌, 握住对方的手, 稍稍用力地垂直摇动一两次, 然后立即松开。在握手的同时眼睛看着对方的脸, 保持视线接触。这种握手被认为是适当的。男子与女子握手时, 若女子在坐着, 可不必站起来。西方国家的男子握手, 我们可能会感到用力过猛, 有点像折筋断骨式的握手。而我们握手时通常用手劲比较轻, 握的不紧, 英语国家的人又会感到不够恳切。有时中国主人握住外国客人的手, 并不马上松开, 这也是西方客人所不习惯的。布罗斯纳安这样写道:

“英语国家礼节性的握手是两人以手相握, 然后马上松开, 两人身体距离也随即拉开。中国人的礼节动作则是两人先握一下手, 然后相互靠近, 两人的手仍不松开, 或者干脆变成了相互拉住不放了。在中国人看来, 这只不过是一中性的礼节动作, 英语国家的人却感到窘迫不堪。因为在他们看来, 抓住别人的手不放与握手毫不相干, 一般视为禁忌。每到遇到这一情况, 他们就只好反复握个不止, 耐心等待对方松开。”²¹

五、时间观念

人们早已注意到不同的民族对于时间有不同的概念和态度。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鱼类加工厂干活的爱斯基摩人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服从于汽笛的指挥, 汽笛一响就开始干活, 再响就收工。爱斯基摩人按涨潮退潮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澳洲土著人在他们自己

人中间使用的不是钟表时间而是“库里时间”(Koori time), 所谓库里时间是指完成一件任务或走一段路程所需的时间。²²人们都讲准时, 但是阿拉伯人、墨西哥人、瑞士人实际上对于准时的理解完全不同。即使在同一民族同一国家, 由于社会阶层的不同, 生活方式的差异, 人们对于时间仍抱有迥然不同的看法。例如, 在我国的乡村和城市, 时间具有不同的意义。长期的农村自然经济形成了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 对时间毋需精确计算, 但是, 在工厂里, 从厂长到工人, 时间概念都很强。产品的成本与生产所需时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今天的世界, 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脱离不开时间的控制, 什么时候起床, 什么时候吃早饭, 什么时候上班, 什么时候下班, 什么时候回家吃晚饭, 等等, 都有严格的时间控制, 如果打乱一切时间安排, 不仅社会上会出现无政府状态, 人的生理机制也无法适应。国外一家钟表公司为了了解人们对钟表的需求程度, 对某一小城镇的 1,100 人进行了为期两昼夜的试验。²³ 试验人员把居民与时间“隔离”起来, 使用的方法是将手表、闹钟、公共时钟等一概遮盖起来, 连教堂的报时钟也不让他们听到。结果是人们在 48 小时中情绪明显变得紧张烦躁, 许多人不知所措, 甚至连自己是否该吃饭了都犹豫不决。这说明具有精确的时间观念已成为城市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一个特征。

人类学家 Hall 根据他的观察把人们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遵守单时制 (Monochronic time, M-time) 的人们, 一类是遵守多时制 (Polychronic time, P-time) 的人们²⁴。单时制的人们 (例如北美、北欧、西欧等国家的人) 把时间看作是一条直线, 可以切割成一段一段, 他们强调时间表, 强调事先安排; 多时制的人们 (例如拉丁美洲、中东等国家的人) 习惯于同时处理几件事情, 强调人们的参与和任务的完成, 而不强调一切都按照时间表。单时制的人通常认为他们对时间的使用是惟一科学的, 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只能处理一个事情, 一件处理完以后再处理第二

件。美国人在拉丁美洲、中东地区活动时，常常发现尽管事前与那里的政府官员有约会，但是，官员都是在接待室内与几个人（或几组人）同时谈话，同时处理几件事情。在单时制的人看来，这是对于他的不尊重，同时时间使用的也不经济，但是，在多时制的人看来，单时制只强调时间表，而不问客观情况，不论是否问题已经谈清，不论人们之间的感情是否已经充分交流，只要时间一到，立即结束这项活动转向下一项活动，不合情理。

我们中国人基本上属于单时制，在大城市中生活速度日益加快，人们愈来愈重视时间的安排。80年代中期，《效率手册》的出现和畅销最有力地说明人们时间观念的改变，严格的计划和支配时间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需要。但在乡村情况则大不相同。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不仅在单时制、多时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区别，他们对于一项活动的筹划、开始、延续以及结束也都有不同的观念。

提前计划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国际会议常常在几年之前已预作计划，几个月以前会议的详细议程已经准备完毕，通常会议严格按照议程进行。一些政界领袖、社会活动家、富商大贾都提前很久就安排计划。电影制片人靳羽西曾经对记者说，她已经把一年的日程全部预先作了安排，一年后她在什么国家的什么城市会见某个人已经确定下来。西方国家的人使用的专用日记本主要是用作提前计划。举凡会议、约会、社交活动等，都需事先通知，以便对方能早作安排。临时通知对方参加某项活动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如果请人吃饭，需在一周甚至更早的时间发出邀请，临时邀请会使人感到缺乏诚意，往往遭到拒绝。

“准时”似乎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预定七时开始的活动在七时到达是“准时”，这似乎不应有任何问题。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于“准时”的理解不同；即使在同一文化中，由于活动内容不同理解也有所变化。在英国和北美，正式的约会必须准时到达，最多不能超过预定时间5分钟，而在阿

拉伯国家迟到 15 分钟仍属正常范围。如果是家庭宴请活动,在美国比规定时间晚到五分钟或七八分钟是合乎礼仪的,在英国可以晚到 5~15 分钟,在意大利可以晚到一两小时,在埃塞俄比亚甚至可以更晚。²⁵在英语国家晚间宴请虽然可以允许客人迟到十分钟左右,但绝对不能提前到达,提早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有一些聚会 (party) 并没有严格的开始时间,客人可以在规定时间之后半小时 (甚至更长的时间) 到达。

在我国城市中,工人、机关干部、科学家、教师等的时间观念比较强,重视准时上班、赴约会。笔者的研究生的一项调查表明,大学学生十分重视准时参加活动。对于“你们单位领导约你 10 点钟到他办公室,你什么时候到达?”这个问题,回答准时到达的占 55%,提前 5 分钟到达的占 40%,晚到几分钟的只占 5%。对于“你和同学们约好集体去郊游,7 点钟准时在车站集合,而你却在 7 点 5 分到,你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回答“很对不起”表示歉意的占 57%,感到不好意思的占 36%,感到无所谓只有 7%。在被邀请去朋友家吃饭的时间上,中国学生明显地不同于西方人,21% 准时到达,62% 提前 5~10 分钟到达,只有 17% 晚到 5~10 分钟。由此可见,在我国人们通常认为提前一些赴约会是礼貌的,而在西方则被认为是不合礼仪,会引起主人的不快。

对于一项活动需要多长时间,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规矩。一般的说,在英美的公事访问不超过 1 小时,晚宴大约三四小时,有些年轻人的聚会 (party) 甚至超过三四小时。社交活动时间过短,会使人感到气氛冷淡,与此相反,一些正式的外交活动场合对于时间有明确的规定,通常在邀请信上已经写明活动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因公的约会通常也是由秘书事前定好起始和结束时间。访问者与来访者在简单寒暄后立即转入正题,访问者必须注意在规定的时间内谈完公事,然后告别。有时在规定结束时间之前三五分钟,秘书打电话告诉来访者下一个访问者已经在外间

等待，这也是向访问者暗示应该结束谈话，准备告别。在阿拉伯国家和拉丁美洲，晚宴社交活动时间比英美等国家长，时间短了会使人们感到主人不好客、不够热情。在西班牙、葡萄牙宴请活动延续到夜间 12 时之后也屡见不鲜。在我国正式宴请活动通常是两个多小时，很少超过 3 小时。至于在家中请亲戚、朋友吃饭，在时间长短上并没有一定的规矩，地区与地区间、城市与乡村间存在不小的差别。

六、对空间的使用

不同的文化群体对于空间使用具有不同的看法，这包括个人的领域、体距、对于拥挤的态度、位置的意义等。Hall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他在《隐藏的维度》一书中对于空间作了深入的探讨，对于在不同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作了细致的分析，对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阿拉伯国家的人在体距方面的差别作了比较。

1. 领域性

人们知道动物通常都有领域性。无论是猫、狗、老虎、狮子或是其他动物都有自己的领地。狗把主人的房子和院落当作自己的领地，如果有其他的狗或生人接近房子，狗就会吠起来。如果有人侵入了老虎的领地，它会自动地而后退，但在它无法再后退时，就会反击。人也有自己的领地，虽然常常是不自觉的。例如，在一个家里，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坐的椅子或者习惯呆的位置，这就是他（她）的领地。二十多年前，我国的餐饮业尚不发达，人们到饭馆去吃饭，常常两家人挤在一桌，并没有领地的概念，但是，近年来，通常是一家人坐在一桌，很少再有两家人挤在一起的情形。人们很自然地把自己坐的桌子当作暂时的领地。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有人要坐在同一桌，一般需要征求原来坐在那里的人的同意。有时，为了表示是自己的领地，在椅子上放一些东西。

人们发现,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人一般不为自己的领地动武。McAndrew 在图书馆作过一项调查,以了解学生对于别人占用他们的桌子会作出什么反应。²⁶一位试验助手以要学生回答调查问卷为由,将 20 名学生暂时调离他们的桌子。在他们离开时,另一位助手把每个学生的物品都挪到旁边,在原来的位置上放一些别的书和一件夹克。学生接受“调查”回来以后,看到他们的东西被挪动了,就都撤到别的地方去,没有一个学生起来“保卫”他们的领地。这说明人们在领域被侵犯时,一般都宁愿转移,也不争斗。自然,如果是一个国家的领土受到侵犯,很少有不起而反击的。

2. 个人空间和体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空间。所谓个人空间是指一个人与另外的人之间所保持的空间或距离。它是无形的,但却是实际存在的。如果甲进入了乙的个人空间,乙就会自动地向后退。似乎在人的周围有一层无形的屏障。Hall 提出,个人空间是球形或环形的,但后来的研究者发现有些人前面的空间比背后的空间大一些,另一些人后面需要更多的空间,而前面的空间小一些。Hayduk 提出,个人空间有一个纵向轴、脚周围需要的空间按比例比头周围需要的空间小些。如图 11。²⁷

影响个人空间的因素很多,包括性别、年龄、关系远近和文化背景等。有的研究者认为,男性比女性需要的个人空间多,但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我们和小孩子的距离比和成人的距离要近,我们和不同年龄的孩子保持不同的距离。关系近的人之间要求的个人空间少于关系远的人。一般说来,阿拉伯人和拉丁美洲人之间的距离比北欧、北美之间的距离要近,但还需要考虑其他许多因素。

Hall 将个人之间的距离分为四种: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和公众距离。在亲密距离当中,近者可以没有距离,远者从 6 到 18 英寸。美国中产阶级一般认为在公众场合不宜保持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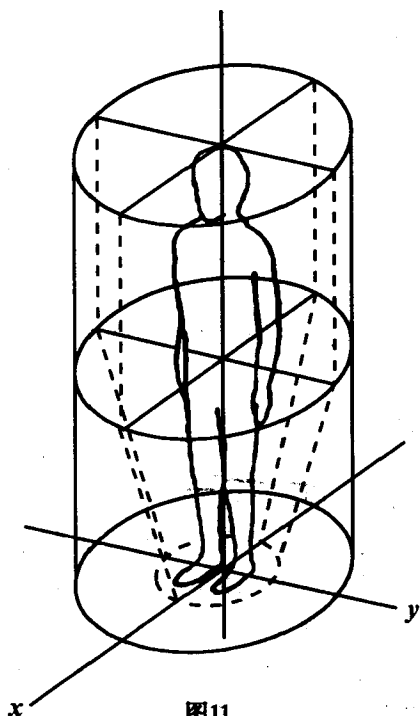


图11

密距离。如果其他人进入这个距离，通常会感到很不舒服。例如，若是在拥挤的电梯里不得不和周围的人靠的很近时，往往保持一种十分紧张的姿势，将双手紧贴身体，眼睛看着电梯的顶部，或者看着别的地方，避免和周围的人的视线有所接触。个人距离近者1.5~2.5英尺，远者2.5~4英尺。在近距离的范围内，通常表示一种关系或感情。妻子站在丈夫1.5~2.5英尺的范围内是自然的事，但若是别的女人站在这个距离内就会有其他意思了。在2.5~4英尺的距离内，通常是谈个人感兴趣的事或是与个人有关的事。社交距离近者4~7英尺，远者7~12英尺。同事谈公事通常保持在社交距离的近距离内。在一般的社交场合

也大致保持这个距离。如果是 7~12 英尺的距离,一般都是比较正式的公事。重要人物的桌子往往大得能够使来访者与主人保持这个距离。公众距离近者 12~25 英尺,远者 25 英尺以上。语言学家发现,在这个距离人们讲话时需要注意遣词造句,讲话明显变得正式。在公众领袖的周围一般保持 30 英尺的距离。在这个距离讲话,音量势必提高,还需要借助手势和体态,咬字吐音必须十分清楚,甚至有一定的夸大才能使听众听清。

潘永樑对于中国人讲话时交谈者之间的距离作了调查,发现与英美人交谈者之间的距离差不多。他共计调查了 50 例,发现在朋友、熟人之间个人交谈,双方距离在 0.5~1 米之间;一般社交活动中双方距离在 1.5 米左右;对着人群讲话都在 3 米以上。²⁸

布罗斯纳安认为中国人的体距比西方人的体距要小。

“中国人的距离……要比英语国家的人近,在公共场合更是如此,在大街上,中国人聚集在一起,彼此相距不过 18 英寸。但是并不像英语国家的人那样不让他人介入,这显然表明了中国人的近体距离要比英语国家的人开放得多。英语国家的人在一起时,如果有局外人走进 18 英寸的范围,即使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也一定会被看成是一种侵扰。中国人却不一定有此感觉。他们看来,公开场合就是绝对公开的。”²⁹

3. 对于拥挤的态度

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个人空间的需求不同,因此,他们对于拥挤的态度也表现出差异。英语国家对于从拥挤的人群中穿过去往往有所顾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会用双手开路,同时说些抱歉的话。他们往往不愿意用身体去挤。来华旅游和工作的人在售票处或收银台前看到不排队的拥挤的人群往往感到无

所适从。在笔者的一项调查中发现英语国家来的教师对于不排队现象反映特别强烈。其中尤以英国人为最。

人们一般都讨厌拥挤的现象，但是，布罗斯纳安发现，由于各国人口密度的差别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人们对于拥挤的态度仍然表现出差异。他认为，中国人更安于拥挤的情况，“对任何吸引人的地方都不是回避而是乐于挤上前去围观。在团团围坐的餐桌边，在大街上围观下棋的人群中，人们毫不畏惧，甚至还怡然自得地和别人紧紧靠在一起。中国人‘热闹’的概念意味着亲切相处，欢乐聚集。”³⁰

他还发现，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有的中国人会凑过去看别人的报纸，甚至要求对方等一下翻到下一页，以便他能读完他正在阅读的部分。这对于英语国家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4. 位置安排

一般来说，在一个公司或政府机构中，一个人的办公室安排在什么地方与他的职位有关。在美国，等级高的人的办公室一般都占据高层比较好的位置，外边的景色比较好，周围比较安静，离来访者比较远，而地位低的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一般在底层，距离来访者比较近，外面的环境不那么好。这可以从费城一家医药公司的安排看出。最高层把角的办公室给最高领导用；下一层楼把角的办公室给下一级领导用；再低一级的，但仍是重要的行政人员在不位于把角的办公室办公；再低一级的人的办公室没有窗子；更低一级的人的办公室是用磨砂玻璃隔开的小间，没有可以关上的门；倒数第二级的人所用的办公室是透明玻璃隔成的小间；最低一级的人在大办公室里占用一个办公桌。³¹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遵循同一原则。在日本，部门领导的办公桌放在一间大办公室的中间，他的下属的办公桌在他的四周。他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实现他的领导。他可以看到他的下属如何工作，可以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在任何正式的宴请活动中，座位的安排是十分重要的。一般

说来,接近主人的位置是比较重要的。最重要的客人安排在第一桌,仅次于最重要的客人安排在第二桌,依次类推。在每桌又按照客人的重要程度作相应的安排。通常最重要的客人安排在主人的右边,次重要的客人安排在主人的左边。如果女主持人在场,次重要的客人安排在她的右边。详见图12及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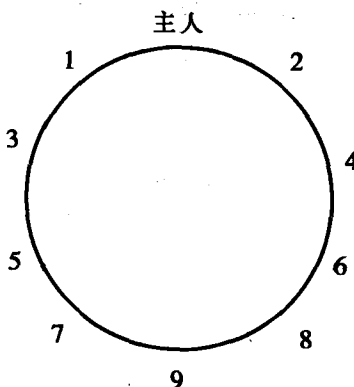


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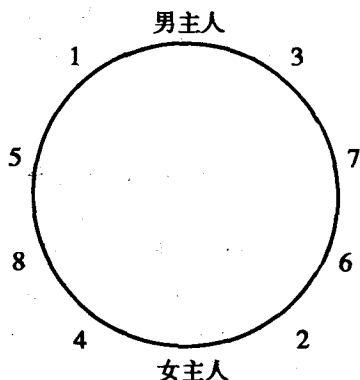


图13

小结:

非语言交际指那些不通过语言手段的交际,包括手势、身势、眼神、微笑、沉默、面部表情、服饰、体触、体距、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利用等等。非语言交际与语言交际不同,它没有固定的规律和法则;也没有一套明确的符号,它可以连续不断地进行,有些非语言交际手段是先天的,有些则是后天习得的。在非语言交际领域,正如在语言交际领域一样,文化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同一个手势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有着完全两样的意义。非语言交际手段十分丰富,但是,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与语言结合使用的,起着重复、加强、补充甚至替代或否定的作用。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我们缺乏敏感,常常容易忽视非语言交际这一重要方面。

思考题:

1. 如果比较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 你认为哪个更重要? 为什么?
2. 在非语言交际的各种手段中, 你认为哪一种最容易引起误解?
3. 非语言交际是否一成不变? 你能否举出例子说明它的变化?
4. 在非语言交际方面我国各地地区的差别是否很大? 请举例说明。

-
1. Eakins and Eakins. (1982) Sex differences in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Samovar and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5th edn.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p. 292.
 2. Samovar and Porter. (1982) p. 156.
 3. 马兰德罗和巴克:《非言语交流》(孟小平等译),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1年, 9页。
 4. 同注3, 14—15页。
 5. 同注3, 153页。
 6. 同注3, 165页。
 7. 布罗斯纳安:《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毕继万译),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1年, 213—214页。
 8. 同注1, p. 299.
 9. 同注1, p. 300.
 10.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编:《当你踏上异国的土地……》, 1986年, 12页。
 11. Gary Althen. (1988) *American Ways: A Guide for Foreig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cultural Press. p. 143.
 12. 祖父江孝男:《简明文化人类学》(季红真译), 作家出版社, 1989年, 61页。
 13. 同注1, p. 297.
 14. 同注1, p. 299.
 15. 同注3, 71页。

16. 同注 3, 95 页。
17. 同注 3, 229—230 页。
18. 同注 11, p. 143.
19. Michael Schneider. (1985) Verbal and Nonverbal Indices of the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 and Accultur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 9, p. 275.
20. 潘永樑:《身势语与跨文化理解》,《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 年第 1 期, 5 页。
21. 同注 7, 24—25 页。
22. Alan Hodge. (1987) *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s*. Willoughby, Australia: Janus Resources. p. 88.
23. 王玉波等:《生活方式》,人民出版社,1986 年,244 页。
24. Edward Hall. (1976) *Beyond Culture*. Anchor Books. pp. 17—24.
25. Michael Argyle. (1982)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Stephen Bochner (ed.), *Cultures in Contact: Studies in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Pergamon Press. p. 68.
26. 同注 3, 204 页。
27. 同注 3, 212 页。
28. 同注 20, 5 页。
29. 同注 7, 37—38 页。
30. 同注 7, 45 页。
31. 法斯特:《体态与交际》(孟小平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 年,57 页。

第七章 社会交往

一、见面语

人们见面一般都要有所表示,承认对方的存在。这种表示可以是通过语言,也可以是通过手势、身势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打招呼的方式十分不同。毛利人见面以额头轻轻接触对方额头表示敬意。泰国人见面时实行拜礼,或称合掌礼,将手合十于胸前,头稍稍低下,互相问候“撒瓦迪”(泰语“你好”的意思)。小辈见到长辈时双手高高举起,举到前额;平辈相见时双手略为举起,到鼻子的高度;长辈对小辈还礼只需要把手举到胸部。¹在毛里塔尼亚两个人见面不仅要问候人,而且问对方的牛羊和骆驼怎样。

我国古时人们以“无它(蛇)否?”“无恙否?”作为问候语。见面时的礼节包括跪拜、拱手、鞠躬等。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的礼节和问候语也随之变化。“吃了吗?”“到哪儿去?”“你好。”都是常用的问候语。据说北京地区年青人当中最新的见面语是:“上网了吗?”

汉语和英语在见面语方面有许多差异。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1) 在英语中祝愿性质的见面语比较多,例如,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good day, good night 都是祝愿性的。而汉语中比较少。北方人早上见面说:“你早!”或“早!”广东人早上见面说:“早晨!”在功能上它们与 Good morning 是相同的,但是严格说来意思并不一样。“早安”、“早上好”、“晚安”都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使用范围还比较小。

Good day 则至今还没有很妥贴的译法。

2) 英语中中性的见面语如 hi, 在汉语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词。以至在电影配音中常常直接使用“嗨”这个音。Hi 的作用相当于“你好”，但是意思不如后者那样明确。

3) 汉语中有一些见面语是英语中少见的，因此，常常引起西方人的误解。在汉语中可以直呼一个人的名字作为打招呼的一种方式，例如，在校园里学生见了教师会叫一声：“老师！”表示敬意。同事之间也可以这样互致问候：“王先生！”对方回答：“李先生！”老舍的《女店员》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余志芳：妈！宋爷爷！

宋爷爷：回来的好，你妈妈正找你呢！

余志芳：妈！

余母：别叫我！家里那么多事，你就不睁开眼睛看看吗？

在英语中不能以称呼代替问候。如果在英语中有人这样打招呼：“Professor Wilson!” Wilson 教授听到以后一般是以为有事找他，因此，他的最自然的回答是：“Yes?”意思是“什么事？”接着打招呼的人就要说明事情的原由。

4) 汉语中见面打招呼的另一个通常方式就是就对方在做的事发问。例如，一个邻居在扫地，你可以说：“扫地哪？”你下班回来的时候，妻子在做饭，你可以说：“做饭哪？”在英语中会被人看作是明知故问，在有的场合甚至会被认为是对于个人隐私的侵犯。在汉语中这是一种最常见的普遍为人们接受的见面语。阿城小说《傻子》中的一段很有代表性：

正是做饭的时候，院当中的水管子下几个妇女在洗洗弄弄，见了老李，都熟熟地打着招呼。老李看她们手上弄什么，就问焖饭哪？吃蒜苗？一路往院子里走。院儿里各屋又进进出

出，一些大人小孩，见了老李，前前后后招呼，老李就“回来了，回来了”地应着，进到北屋。

笔者的硕士生蔡立杰对于北京地区人们使用何种见面语作过一项调查，其结果如下：

见面语类别	场合 百分比			
	校园	工作地点	公共场所	居住地
与情景有关联的见面语	60 %	80 %	65 %	75 %
与情景无关的见面语	35 %	15 %	25 %	15 %
其它	5 %	5 %	10 %	10 %

从这项调查可以看出与情景有关的见面语无论在哪一种场合都占主要地位。

二、告别

来访的客人在结束访问以后都要向主人告别，但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告别的方式和节奏不同。

英美人在向主人告别时往往要先表示几次，最后才站起来。正式的告别比较短暂。在准备离开之前 10~20 分钟，客人就开始提出告别的题目，例如可以说：“I guess we must be going soon. Our babysitter expects us to be back by ten-thirty.”（我们很快得走了。我们家看小孩的希望我们十点半能回到家。）说完这话以后客人并不立即站起来走，而是再聊些家常。过了几分钟以后，再说：“It's getting late. We must run soon.”（天晚了，我们得赶快走了。）再过几分钟，客人站起来说：“We have to say goodbye now. We enjoyed the evening very much. Thanks a lot.”（我们现在得说再见了。我们今天晚上过的很愉快。多谢了。）客

人向门口走去，主人陪同客人走到门口，送到门外，再说两句客气话和再见就算完成了告别的整个过程。

与英美人的告别比较，我们的告别过程是前面短后面长。也就是说，前面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铺垫，话说的差不多了，双方都感觉到是告别的时候了。客人站起来说：“时候不早了，我们得上路了。”或者说：“明天早上还得上班，我们告辞了。”主人和客人走到门口还要继续再聊一会儿，然后客人才能真正告别。如果主人希望表现的更殷勤一些，会陪同客人走到楼门口甚至大门口，然后告别。有的主人甚至把客人送到公共汽车站，看着客人上了车才离开。

由于告别的程式和节奏不同，因此，西方人有时觉得中国客人走的急促，甚至主人还没有思想准备，客人已经站起来准备走了，中国人习惯于在离开主人客厅以后再聊一会儿，在英美人的家里作客以后，主人送到门口很快就告别，中国人常常感到有些突兀，甚至觉得主人不够亲切。

三、恭维与谦虚

以往在讨论中西文化时常常举例说明西方人如何愿意接受恭维，而中国人如何拒绝恭维。事实上，无论在我国文化或是西方文化中，谦虚都是一种美德。妄自尊大的人一般都不受欢迎。西方人在受到恭维时说“谢谢”并不说明他们不谦虚。更何况也不是每个人都说“谢谢”。英美人表示谦虚有许多方式，例如，以往在信的末尾写 Your humble servant（现在这种说法已经过时）。在谈到几个人时，习惯上是把自己放在最后，例如，说 my wife and I，而不说 I and my wife，说 my colleagues and I，一般不说 I and my colleagues。谈到自己的贡献时，有时会说 This is what little I can do，故意把自己的贡献说得小些。中西习俗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把谦虚与人们的道德联系起来，把谦虚放在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中国人如此看重谦虚与比较强的群体观念有

关。之所以谦虚是为了不显露自己，为了自己与他人之间不出现什么距离，为了和大家搞好关系。西方国家的政府部门和企业虽然也看重一个人的团队精神，但不像我们那样看重一个人的群众关系，并不把谦虚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准。其次，我们表示谦虚的方式与西方不同，程度也不同。在我国的传统教育中谦虚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格言中有“满招损，谦受益”的说法，在近年的教育中强调“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由于谦虚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因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求人们谦虚，成为行为的准则。在称呼方面有一整套谦词，特别是在文字上。英语中虽然也有谦词，但只是零零星星一些，不像汉语词汇那么丰富。谈到自己时说“鄙人”，谈到自己妻子时说“拙荆”或“内人”，谈到自己的女儿说“小女”，谈到自己的儿子说“犬子”或“小儿”，谈到自己的著作说“拙著”，谈到自己的家说“茅舍”，宴请客人时说是“便宴”，有的词虽然已经过时，例如“拙荆”、“犬子”，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谦词，例如说自己的意见是“不成熟的意见”，说自己的画是“习作”等等。在待人接物方面我们有一套规范，例如，进门时注意谁前谁后，入席时注意坐席主次，受表彰时必须说些自贬的话，总之，在人们行为的方方面面都需要贯彻谦虚的精神。

美国传教士何天爵在他所写的《真正的中国佬》(*Real Chinaman*)一书中记录了他当时观察到的情况，尽管是百年以前的情形，我们却仍然可以看到与今天习俗的联系。他的描述如下：

“在中国，当数人要进入一所房间或者要离开房间，或者要在一张桌子边落座时，也存在着一套相当繁琐的礼节。实际上，每个人都非常明白他自己的位置在何处。因为那是根据他自己相对于别人的官爵和地位早已确定好了的。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谁应当排在最后一个进去，谁又应当第一个先出来；或者谁应当列上位，又是谁应当坐下首，等等。

对这一规则的要求相当严格，无处无之。任何偏离或者违反它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虽然如此，人们总还是翘起着身体向后退，总是要劝别人先行。在每个不同身份地位的人都按部就班地各得其位之前，这种友好的你推我让必定要持续数分钟。”²

下面是方成画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人们在拍集体照时在座次上的推让，十分典型地说明了今天中国人的行动规范。从这幅画可以看出我国习俗的传承性。



在西方国家，如果是正式场合照相，谁站在什么位置自然也是重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等级观念不像我们那样

重,谦虚的原则并不在所有场合贯彻,因此,人们对于站在什么位置也就不那么看重,在照相时常常是站的比较随便。推推拉拉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

我们在表示谦虚时不仅可以说自己,也可以说自己的家里人,例如,妻子、儿女等。例如,当别人表扬自己的妻子绘画有根底时,一般来说丈夫也要说几句客气话表示谦虚。可以说:“她随便画画。”或者说:“她画画是业余爱好。”在西方,同样的情况下,丈夫不会为妻子谦虚。如果说了类似的话,妻子一定会很不高兴。这与西方强调个体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丈夫和妻子关系密切,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性,不能越俎代庖。

对于东西方在恭维方面的差异研究还没有看到系统的材料,但是,人们的感觉是美国人比中国人恭维人的次数和场合更多,美国人似乎把恭维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一个手段。在受到恭维时,美国人的通常反应是接受恭维,并表示感谢,自然也有表示受之有愧,或者不能接受。王勤学在1990年对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中国大学生和北京语言学院的外国留学生在回答恭维方面的差异作了比较,结果如下³:

反应 \ 调查对象 占 百 分 比	中国学生	外国留学生
欣然接受	6%	60%
自贬或降调	70%	22%
对恭维的准确性表示怀疑	10%	14%
其它	14%	4%

由于时间因素的限制,王的样本不是很大,只有几百个例子,不能说明以上就是中国学生和外国留学生的全面情况,但是至少可

以看出中国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在接受恭维方面的大致情形。

四、送礼

“礼尚往来”是我国文化习俗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送礼时十分重视礼物的价值，一般说来，礼品越贵重，就越说明对于对方的尊重。对方的社会地位越高，礼品就越要贵重，否则“拿不出手”。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对于礼品的价值不像我们那样看重，一般认为礼品包含的意义更重要。而且，一般说来，人们避免赠送贵重的礼品，以免被误会为贿赂。中西在这方面的区别说明了中国人的群体观念、等级观念和面子观念比西方国家强。中国人之所以看重送礼是因为人们希望通过送礼加深与亲戚朋友的关系，扩大自己的关系网。之所以重视礼物的价值与人们的等级观念有关，认为对等级高的人应该送有价值的东西。有的人并不想送贵重礼物，但是出于面子的考虑，还是不惜破费。在美国，对于送礼的考虑十分不同。Stewart 与 Bennet 合著的《美国文化模式》（*American Cultural Patterns*）一书有一节谈到送礼这一习俗。他们指出：

“在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中，送礼通常是为了庆祝生日、周年纪念或者像圣诞节这样的节日。在这些十分固定的场合以外，人们在做法上谨慎，送礼不和个人联系起来，显得随便。对于礼物的意义加以限制，以避免人们将送礼理解为贿赂，或者是请人帮忙，或者是为了报答对方。在工作单位，为了做到不与个人相联系，在庆祝某件事时通常采取凑份子的做法。”⁴

在我国也有凑份子的做法，但是，一般来说，人们送礼为了加深个人关系，所以送礼突出个人，而不是贬低个人。对于好朋友一定要送比较重的礼物以示关系特殊。正是由于东西方在送礼

上有着不同的习俗，因此，外国人送的礼物中国人有时会看不上，不仅看不上，而且不理解。例如，一个美国朋友访问一位中国教授以后，将一包微波炉用的爆玉米豆送给教授，并且认真讲解如何将玉米豆爆成玉米花。中国教授虽然嘴上一再感谢，但是心里却不明白一包玉米豆怎么能作为礼物来送。而美国人认为这种在微波炉里爆的玉米豆是刚刚上市的新产品，东西新奇，作为礼物送人十分合适。美国人与中国人对于玉米豆的不同看法在于他们对送礼持有两样的理解。反过来，中国人认为拿得出手的礼物，有时外国朋友觉得是负担。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位英国专家在各地讲学时常常收到各种瓷瓶和唐三彩之类的礼品，体积很大，带起来很费力，他常常认为是个负担，有时甚至不得不把礼品留在当地的旅馆里。Argyle 对于送礼是这样论述的：

在所有文化中，都需要在某些场合向亲戚、朋友或同事送礼，但是送礼规则却大为不同。日本人在礼物上花费甚多，礼物必须在特定的礼品商店里购买，这样才能确定它的价值，以便回一份价值相当的礼物。礼物在送礼人面前不能打开，在接礼之后立即回送一个小的象征性的礼物。⁵

在我国传统中受礼时往往需要一再推辞，送礼人一再坚持，在两三个回合以后，受礼人接受了礼物，但是与日本人一样在客人面前不打开礼物观看。有时甚至送礼人自己把礼物放在屋子的一个角落。待客人走后，主人才打开礼物。这与西方的习俗大相径庭，在西方国家受礼人一般不推辞，在接受礼物以后，立即在客人面前打开，并且说些赞美的话。

五、宴请招待

无论在西方或是东方，宴请的规格与被宴请客人的身份有关。对于高贵的客人宴请时规格要高一些，对于一般客人宴请可

以比较随便。但是对于什么是丰盛的宴会却有十分不同的理解。丰盛的西餐一般也只有四五道，份量以能吃完或稍有剩余为最佳。如果是家宴，客人把菜全部吃完，主妇会很高兴，认为大家非常喜欢她做的菜。宴会前、宴会当中以及宴会之后一般准备各种酒及饮料，葡萄酒是主要品种，而喝哪一种葡萄酒又有很多讲究。例如，如果主菜是鱼或鸡，应该上白葡萄酒，如果主菜是牛肉或羊肉，应该上红葡萄酒。夏季和冬季喝的酒又有所不同。宴会结束客人离开餐桌以后主人拿出各种甜的烈性酒由客人挑选。在我国一般都是在餐桌上饮酒，在饭后没有饮酒的习惯。在英美等国家，朋友之间宴请依我们的观点看都比较简单，一般的说，一道汤，一盆色拉，一道主菜，再加上一道甜食就可以招待客人了。但是，饮料和酒（主要是啤酒和葡萄酒）必须充分供应。他们把吃饭看成是聚会和交流的一个机会，吃的东西固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在美国，朋友聚餐有时采取大家都作贡献的做法，他们称之为 potluck，每人（或每家）都带一样菜，在其中一家聚会。这家主人准备一些饮料，也可以请来客中的一位专门带饮料。在这种情况下，主人显得不那么突出，也可以说大家都是主人，目的就是大家有机会见面谈谈。还有一种聚会，他们称之为 party，在汉语中还没有适当的对等词（在香港音译为“派对”）。这是一种比较松散的聚会，主要目的是见面聊天和结识新朋友，主人只提供饮料、酒和一些简单的吃食，例如奶酪、炸薯条、三明治等，并不提供饭菜。客人到达和离去的时间也比较灵活。

我们一般的宴请至少要上七八道菜（所谓四冷四热），如果是丰盛的宴会，热菜更多。而且越名贵的菜越奇特的菜越能显示主人的殷勤和客人的身份。饭菜一般都要大大超过主人和客人所能消耗的量，否则就不足以表示主人的好客。席间主人不断向客人劝酒，而酒常常是酒精含量比较高的白酒。啤酒和果酒近年才开始流行，但是在小城市和农村仍然是白酒的天下。西方人早已

注意到华人社会普遍注重烹调，在宴请中吃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如果饭菜不丰盛，或者烹调不到家，人们会感到扫兴。西方人到中国人家里作客常常会觉得过于丰盛，而中国人到西方人家里作客往往会觉得饭菜太简单。在我们国家像 potluck 或 party 那种形式的聚会还只限于极少数受到西方影响较大的一些群体，一般中国人还难以接受。

小结：

人们的社会交往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即是一个社会的习俗。人类社会的各种习俗是千百年中间逐渐形成的，有些习俗可以追溯到它的来源，但多数习俗已经无法弄清它是如何形成的。人们在实行这些习俗时并不追究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样做，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习俗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在人们的习俗中贯穿着这一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例如，在我国的习俗中，贯穿着群体观念、“尊人卑己”、面子观念等，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习俗中却贯穿着个体观念、独立精神等。

思考题：

1. 为什么在汉语的见面语中有许多是与当时情景相联系的提问？
2. 为什么在我国文化中如此重视谦虚？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在这方面有无变化？
3. 为什么我国在许多地方有送重礼的习俗？近年来有无变化？
4. 为什么在我国宴请时喜欢越丰盛越好？国务院对于宴请曾经作过规定，你知道这些规定是什么内容吗？

-
1. 杨德生：《礼仪之邦——泰国》，载于《当你踏上异国的土地——外国习俗介绍》，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22页。
 2. 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鞠方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201 页。

3. 王勤学 1990 年 1 月 7 日论文。
4. Edward Stewart and Milton Bennet. (1991) *American Cultural Pattern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ntercultural Press. p. 95.
5. Michael Argyle. (1988)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Samovar and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5th edition.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p. 35.

第八章 人际关系

在不同的文化中人际关系差异甚大。无论是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同事或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都受到文化的制约。一般来说,在个体主义的文化中,个人的独立性比较强,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对松弛一些,显得不那么紧密,而在群体主义的文化中,个人的独立性相对少一些,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显得密切。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在人际关系方面往往会遇到各种问题,感到困惑、失望或极不适应。

一、家庭的地位与作用

家庭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社会单位,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同,因此,家庭的组成呈现出纷繁的局面。在西方国家,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主干家庭(指一个家庭中有两代以上,每代只有一对夫妇的家庭)数量很少,此外,还有单身家庭、同居家庭等形式。儿女成年以后不论成家与否,一般都离开父母,单独居住。父母年老也很少与结了婚的儿女住在一起。只有鳏寡老人偶尔与儿女合住。Stewart 指出,大约 22 岁以上的美国人如果还和父母住在一起通常要向自己的父母付房费和伙食费。同样,老年的父母如果与自己的儿女住在一起也会这样做。付房费和伙食费是表示独立精神、自食其力和对自己负责的一种方式。¹

父母年纪太大无法照顾自己时常常住进老人院,而不愿意与儿女住在一起,增加儿女的负担。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合人情,但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无论父母或是儿女都抱有同样的看法,希望自己独立,不愿意由于合住造成自己和他人的不便。

在家庭中对于幼儿的教育我国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西方国

家着重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在美国和大部分西方国家只要有条件一般把幼儿放在另一个房间里，使他从小就感到有自己的天地。Levine 和 Adelman 是这样解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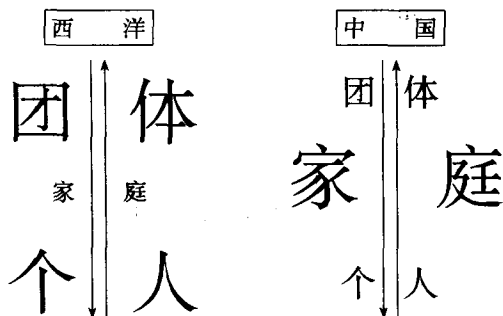
“人们如何对待新生儿显示出他们的文化价值。在美国父母把新生儿放在一个属于孩子的单独的房间里是很寻常的事。这样既可以使父母不受干扰，又可以使孩子习惯于有自己的房间，这被看作是取得个人独立的第一步。”²

孩子长到七八岁，父母鼓励他做些零活，挣些零花钱，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有的家庭可能经济上并不困难，也并不需要孩子挣钱，但是，他们认为让孩子送报、看小孩、扫雪，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挣些钱，是培养孩子独立精神所必需的。我国的孩子总的说来依靠父母比较多，父母常常替孩子拿主意，决定孩子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父母在孩子升学、就业方面常常做十分具体的安排。孩子成年以后，父母继续给予经济方面的支持也十分普遍。

以往流行这样的看法，即中国的家庭是数代同堂的大家庭（extended family）。实际上，大家庭即使在封建社会对于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愿望，由于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个愿望难以实现。从历代家庭人口的平均数（5~6人）也可以看出中国不可能是以大家庭为主。大家庭的维持除了经济上需有实力以外，人际关系也是一个极难处理的问题。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核心家庭呈上升趋势，但仍有数量不少的主干家庭。据统计，在我国仍有大约30%的家庭属于主干家庭。尤其是在农村三代同堂的情形仍很普遍。

在我国文化传统中，家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个人、家庭、团体三者中，家庭占有异常突出的地位。而在西方文化中，

个人和团体占有比家庭重要得多的地位。梁漱溟将这种关系图示如下：³



在西方,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但是它还可以进一步分解成为个人。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时,个人的利益和愿望是主导因素,家庭是次要的,但是,在我国文化传统中,个人的利益和愿望往往是次要的,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家庭的利益。而且个人与家庭合二而一。一个人做了官,就会光宗耀祖,而如果犯了罪,就可能株连九族。易中天说:“一个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他的身份、地位、价值、权利、义务和责任,都是和他的家庭、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个人,如果家庭的‘门第’高,家庭是‘名门望族’,他的地位也就高,价值也就大。”⁴

这种情况不仅在封建社会如此,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可以看到它的残余。

在我国农村,同族而居的情形十分普遍。有的村子只有一个或两个姓。有的村子同姓者有几十或几百人,有的甚至集中几万人。为了维系家族,通常设立族规,选举族长,定期举行祭祖活动。孔子的故乡曲阜的绝大部分居民是孔姓,孔子的家谱一直未断,在2500年间延续八十二代。自然,像孔家这样的情形在我国也是极为个别的。但是,在一个大家庭中保有一份家谱,向上追溯几代或十几代并不少见。王铭铭八十年代对于福建溪村的调查说明宗族在我国农村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溪村人口总计有

大约三千七百人，其中 90% 以上姓陈，同属陈氏宗族，其余属李氏宗族。在近几十年当中，宗族的势力有起有伏，但是一直没有失去它的影响。解放以后，在新的政权中排除了旧的族权，但是，改革以来，“在溪村出现了另一个权威中心，即祖祠重建委员会……祖祠重建委员会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权威机构，揉合了旧的族老政治与新的政权。它的象征性领导，是族中几位最长辈的老人，实际领导人由一位当过干部的族贤及几个房头的代表组合而成，其中包括四位现任村干部。”⁵

宗族观念在老华侨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同姓集居的现象在美国老华侨中也存在。例如，在芝加哥，梅姓家族占优势；在洛杉矶，多数老华侨姓黄；在西雅图，陈姓人数众多，达到三四百人。在贝克斯菲尔德，钟姓和梁姓的人数最多。一个地区同姓华人的数目相当多时，通常他们会组织社团，并成立总部，以行使宗祠的职能，在芝加哥，这种社团有八九个之多，成员多者达八百人，少者也有七十多人。

这类宗族组织负责调解内部关系，保护组织内部成员，并且还是慈善机构。在本族人遇到困难时，这些社团给予帮助。⁶ 这类组织在其他民族中十分少见。从这里可以看出海外华人的宗族观念似乎比大陆一般人的宗族观念还要强。

中国家庭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内外有别，长幼有序”。所谓“内外有别”指的不仅是家族与非家族有所区别，在亲属内部也有许多分别，例如，父亲的父母称为祖父、祖母，但母亲的父母却称为外祖父、外祖母。堂亲与表亲在亲疏关系上也十分不同。在英语中，通常不需要说明是祖父或外祖父，只说 grandfather 即可，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在英语国家这个区别并不重要。同样，在英语中哥哥和弟弟一般并不区分，brother 一词适用于两种情况，如果一定要说明需要再加其他的词。但是，在汉语中区分兄弟是极为重要的。儒家所说的“五伦”中就有“兄弟”一项，与“君臣”、“父子”、“夫妇”并列。又有“长兄如

父”的说法。这一切都与中国家庭中的家长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家庭中有着十分严格的等级制度，家长握有家庭中的大权，家庭中的成员都要听命于家长。在家庭成员中按照辈分和长幼排列顺序。在封建社会，大家庭中有十分严格的家规，早晨天一亮子女就要穿好一套合乎礼仪要求的衣服去到父母的住处问安，晚上要服侍父母就寝；见到父辈，不叫进不能进，不叫退不能退，不问话不能先说；回话时语气要柔和，出入起居要小心扶卫。⁷

在封建社会中儿女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一个新娘来到婆家，首先不是做妻子，而是做儿媳，是为了服侍婆婆。在家庭中主导的关系是父子，而不是夫妻。纵的关系是主要的，横的关系是次要的，许烺光在《美国人与中国人：通向分歧之路》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说明中美文化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分歧。⁸他提出这样的例子，如果妻子和母亲吵了架，作为丈夫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母亲，或是支持妻子，或是不表态。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回答是明确的，必须支持母亲，批评妻子。如果在封建社会可以因此休妻。在美国的社会环境中，回答也是明确的，必须支持妻子，否则家庭难以维持。这说明在中国纵的关系是主要的，必须不惜代价维持这种关系，而在美国横的关系是主要的，在家庭中夫妻关系是首要的。为了验证许烺光的说法，我在美国一所大学教跨文化交际学课程时，将这个问题交给学生讨论，让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表态。全班学生不论男生女生都一致同意许烺光的看法，认为丈夫必须与妻子站在一起。

孝顺父母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部分。《孝经》对于如何尽孝作了详细的规定，民间还有二十四孝故事。子女要“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色（父母脸色）不忘乎目，声（父母的声音）不绝乎耳，（父母的）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子女要善于对父母察言观色，善于揣度父母的内心活动。历代的封建法律对于不孝惩罚极重。秦朝法律规定“不孝”枭首示众。晋律还规定：“违反教令，敬恭有亏，父母欲杀，皆许

之。”唐律把“不孝”列入“十恶”之中，以后历代相沿。⁹

即使在今天，尽管法律对于“不孝”并没有明确的惩罚条例，但是，在舆论上对于不孝的人仍然有着强大的压力。在西方国家，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是血缘亲属关系中最重要，但是儿女与父母是平等的关系，父母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儿女身上。对于“孝顺”的概念西方国家的青年不仅不能接受，而且也不能理解。我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时候，曾经问我班上的学生，filial piety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这两个字的字面意思都知道，但是究竟具体指什么就不清楚了。我把二十四孝中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完全不能理解。在一次跨文化交际讨论会上，我把二十四孝中的吴猛为了不让父母被蚊虫咬，自己将衣服脱掉，裸露身子，将蚊子吸引到自己身上来的故事讲给芬兰的与会者听。我问他们是否会为父母这样做，他们都摇头。其中一个说，他可能会为他的儿女这样做，但是肯定不会为父母做出这样的牺牲。自然，我国的青少年今天也不会接受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更不会盲目模仿，但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孝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准。沙莲香课题组对于我国13个省市的抽样调查，说明在传统道德中孝位居第二，如表所示：¹⁰

人格气质	均值	标准差
气节	4.05	1.561
忠孝	3.92	2.020
仁爱	3.87	1.532
理智	3.75	2.170
勤俭	3.10	2.362
进取	2.91	2.182
侠义	2.33	2.571
中庸	0.01	3.488

二、家庭化的社会关系

在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中，家庭自然是最重要的。除了核心家

庭，还有关系远近不同的亲戚。此外，其他的许多社会关系也常常带有家庭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家庭化的社会关系，或者说是扩大了的家庭。

朋友关系在东西方文化中包含着不同的意义。在美国，人们处于经常流动之中，因此，一般来说不易有几十年一直联系的老朋友。即使在一个地方，美国人也喜欢有不同的朋友圈子，打网球的是一圈，打桥牌的又是一圈，一起出去旅游的是另一圈。这些圈子是相互独立的，可能每个圈子里的人都不同。而这些朋友与一起工作的同事可能完全没有关系。朋友之间互相帮助也是经常的事。但是，总的说来，朋友之间不愿意承担过多的义务。

在我国情形有所不同。交朋友讲究时间愈长愈好，承担的义务愈多愈好。理想的境界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朋友之间可以无话不讲。如果借钱绝对不能开条子，讲的是绝对信任，否则就不够朋友。中国留学生 A 君自己并没有多少钱，但是当他的朋友由于受别人的骗丢了不少钱处于困境时，他毫不犹豫地借给他 2,000 美元，既没有任何字据，也没有说明何时还钱。当一个美国朋友知道此事时，他感到不可思议。而在中国留学生看来，虽然也觉得 2,000 美元不是小数目，但还是认为 A 君够朋友，讲哥们儿义气。我们在朋友之间常常兄弟相称，或者姐妹相称。称朋友的父亲为伯父或叔父，称朋友的孩子为侄子或侄女，俨然是一家人。

朋友关系更近，则有认干亲拜把子的，使朋友关系更接近亲属关系。桃园三结义传为千年美谈。人们把刘关张的生死与共的精神当作朋友关系的典范。在许多地方设有关帝庙。甚至在华人十九世纪中叶到澳大利亚淘金时，在自己的集居地也设立关帝庙，将关云长的讲义气的精神奉为自己的楷模。

不论关系远近，中国人喜欢借用亲属的称呼作为称呼语。在朋友之间如此，在邻里之间也如此。即使在街上问路，也是按不同的年龄和性别选择使用“大爷”、“奶奶”、“叔叔”、“阿姨”、

“大姐”、“兄弟”等称呼。被称呼的人觉得亲切，也乐于帮助。

同乡的概念也是我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同一个村、同一个乡、同一个县甚至同一个省的人到了外地常常感到相互之间存在着“亲情”。“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以往在京城有各地的同乡会和会馆，例如江苏会馆、浙江会馆、山东会馆等等。成立会馆的目的是为了联系同乡感情，互相帮助。甚至在今天，来京的各种工程队也是按照地区划分。湖北的建筑工程队里是青一色的湖北人，河北的工程队里全部是河北人。有的建筑公司的工人全都来自同一个县，完全没有其他地方的人。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想象在美国某地有一个公司的人员都来自纽约或者费城。相反，在跨国公司里用人的一个原则是职工应该来自不同国度。他们认为这样会有助于公司的发展。

在海外华侨中宗族观念很强，在前一节中已经提到。有时并不是同姓，而是几个不同姓氏的人结合在一起。例如，刘关张赵四个姓的人组成一个社团。很明显，刘关张赵之所以联在一起，是因为《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比较不容易理解的是至德公所这样的社团。这个公所联合了吴、周、蔡、翁四个姓，表面上看，这四个姓似乎并无联系。实际上，这和历史上的一个传说有关。根据传说，这四个姓都是岐山诸侯古公的后代。古公生于公元前1200年，他的儿子泰伯是吴氏家族的祖先。古公的重孙叔度是蔡氏家族的祖先，另一个重孙旦是周氏家族的奠基人，第八代孙穆王是翁氏家族的奠基人。这四个姓的人都相信他们的祖先有着血缘关系。在芝加哥约有600人属于至德公所。1927年散居美国各地的这四个姓的华人成立一个跨社区的宗族组织，来自15个城市的35名代表在旧金山集会，开了16天的会，成立了至德公所，制定了章程，选出了理事会。¹¹

三、单位——一个家庭式的组织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单位”指“机关、团体或

属于一个机关、团体的各个部门。”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它涵盖的范围已经扩大了很多。除了农民、个体户、私人企业主以及在三资企业中工作的人，几乎所有工作的人都有一个单位。

单位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共和国成立以来几十年间，人们认为有了单位就有了一切，单位不仅管工作，而且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一切都管。易中天总结单位的功能有以下七条：

1、安排工作，派遣任务，考核业绩，评定工资。

2、安排衣食住行，包括建立食堂，分配住房，发工作服，发福利费，夏天发降温费或冷饮，冬天发烤火费或宿舍供暖，建立澡堂以解决洗澡问题；为家不在单位的职工报销月票，用单位的车接送职工上下班。

3、安排娱乐活动，组织看电影、看球赛、看演出，开运动会、联欢会和舞会，组织参观、旅游、疗养。

4、操办婚丧嫁娶，包括批准结婚离婚，宣传计划生育，下达生育指标。职工生病，有义务为其安排治疗，报销医疗费用，并进行探望。职工死亡，有义务为其操办丧事并发放丧葬费。

5、组织政治学习，关心思想进步，发展党团员，选拔人员参加各种培训，包括学历教育、岗位培训、出国进修。

6、安排退休人员的生活，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包括子女入托、上学和安排工作等。

7、保存每个成员的档案。¹²

单位有大有小，大单位犹如一个小社会，不仅有办公的地方，而且有宿舍、食堂、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有粮店、菜场、澡堂、理发店，有的甚至进驻派出所。

在西方国家没有类似我国单位这样的机构或部门，更没有这样的工厂和学校，人们工作的地方付给工资或薪水，其他的事（诸如居住、医疗、孩子教育、日常生活等等）全都由个人处理，住什么样的房子，是购买还是租赁，贷款从哪里来，完全是个人与银行、房地产公司之间的事情，与工作部门毫无关系。医疗也

是如此，买什么样的医疗保险是个人的选择，有的大学为职工付部分保险金，作为一种福利，但是除此而外都是职工与医院以及医疗保险公司之间的事，至于子女的教育和就业更与雇主无关。

我们的单位全包的做法与我们过去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关，也与我们的群体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以往认为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一切由国家全包。从个人来说，也愿意有这么一个机构照顾自己生活的一切方面，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在家里一切事情全由父母管，有了单位一切事情全都交给单位的领导，实际上也是按照家庭的模式处理社会上的问题。我们的感觉是如果单位一切全管，那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单位，通常不会感到单位管的太多，但是，如果一个西方人生活在我们的单位里，受到那么多的“照顾”，往往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其他人干预太多。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单位全包的做法在逐步改变。许多单位已经无法做到一切全都管起来。事实上，有不少国营企业由于破产兼并裁员减人，使一部分工人下岗，也就是说已经无法保证所有工人都有工作可做，更不用说其他生活细节了。自然，人们接受这一现实还很不容易，甚至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四、关系网——家庭关系的再扩大

关系网并不只是中国专有，也不是东方国家的独创。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各种关系网。例如，英国贵族学校 Harrow, Eton 的学生在毕业以后保持联系，在必要的时候互相帮助，这是人所共知的。在美国，军队里的老上级或者老同事相互之间常常维持一种特殊的关系。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关照是很普通的事。名牌大学同一届毕业的同学在毕业之后互相照顾也是常见的现象。其他形式的关系还大量存在。与东方国家不同的是关系网的广泛和深入的程度。如果说西方国家运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只是在某些事情上才做的事，那么，在东方国家运用

关系网是须臾不可离的。甚至可以说，事无巨细，不管是做什么都要走关系。无论在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或是我国的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经商做事都十分讲究关系，人们平常也极为注意经营自己的关系网。日本公司职员在下班以后不是马上回家，而是到酒馆和同事一起喝酒应酬，也是为了维持发展自己的关系网。

在我国几乎做任何事都脱离不开关系。在商品紧缺的年代，买许多东西都要靠关系。孩子入托要靠关系，上重点中学要靠关系。到医院看病，没有关系弄不到床位，找不到好大夫。分配房子要找关系，没有关系至少分不到好房子，也可能根本无法分到房子。司机出了交通事故首先是找关系。驾驶执照被交通警察收去，有关系的司机一般当天就可以拿回来。即使出了大事故，也可以大事化小。在有的地方甚至触犯了刑律也到处托人，以便判处的轻一些。至于开公司办企业更离不开各种关系。可以说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离不开一定形式的关系。

关系网包括各种人，从亲属到同事，从交往很深的朋友到关系一般的熟人。自然，最重要的最密切的关系是亲属。从亲属的关系辐射出去，涉及朋友、同事、老上级、老同学、战友、师生、邻居、熟人以至一切有过各种往来的人。除了已有的关系，会经营的人还要不断地拉关系，扩大自己的关系网。所谓人缘好，就是关系多关系好，人缘好的人办起事来左右逢源，人缘不好的人步履维艰。因此，一般人都十分重视要把各方关系弄好。

与关系网有密切关系的是人情。中国人心中一般都有一本人情账。自己欠什么人的人情，又有什么人欠自己的人情。自己欠了别人的人情，就要找机会还人情，还人情往往还要掌握时机，欠了人情不能马上就还。如果对方送了一份厚礼，你过两三天立刻就还一份礼，这往往意味着你不想维持这个关系。人情账可以放很久而不必还，但是人们并不因此就忘掉。以前在农村盖房子的时候，邻居常常来帮忙，这就欠了人情。邻居盖房子的时候，

自己也要去帮忙，以便还人情。有时上一代欠的人情到下一代才还，但是人们却仍然记得欠下的那笔人情账。

西方人深知中国关系网的重要，因此，在我国的外交界、工商界西方人士都致力于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有些人经过多年的经营确也很有建树，在自己的周围有各种关系。遇到问题时通过关系逢凶化吉，或者大事化小。但是，一般说来，他们对于中国关系中比较微妙的方面并不理解。

五、圈内与圈外

正是由于中国人重视家庭以及扩大了的家庭关系，因此，在人际关系方面明显地把与自己接触的人分为“外人”和“自己人”。Ge Gao 和 Stella Ting-Toomey 认为，中国人以家庭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由于家庭的重要性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使得中国人难以与陌生人发展个人关系。一般来说，中国人不愿与陌生人接触，不愿与他们交往。一项调查表明，高达 84.5% 的被调查者表示，在他们与对方熟悉之前，他们不信任陌生人。另一项调查显示香港学生比北美学生更喜欢自己圈内人的活动，而不那么喜欢一般的社交活动。这种社会关系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中国人对于自己人和外人采取不同的道德标准，对自己人是一个标准，对其他人是另一个标准。¹³

Michael Bond 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指出：

许多个性测验资料表明，中国人一般没有西方人那样，特别没有美国人那样善于交际和性格外向，而比他们“羞怯”，社交时坐立不安。

这些差异主要由于对不熟悉的人、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和交往不久的人漠不关心造成的。确实，中国人对固有的群体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而不求广交朋友。中国人为其核心圈子获得成功而感到自豪，为他们的失败而感到遗憾。

.....

中国人回避不熟悉的人，但对家庭和老朋友则感情丰富，关怀备至。¹⁴

我们对这类现象习以为常，所以办事做事常常找熟人托关系。西方人对于这种现象不能理解，他们对于中国的圈子特别敏感，认为我们对于圈内人和圈外人的态度迥然不同。对于熟人和朋友笑脸相迎，全力以赴。对于生人漠不关心，袖手旁观。

对于圈内和圈外划分如此清楚，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的一个特点。究其原因，这和人们的家庭观念、家族观念以及家庭化的社会关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家庭观念强的人们必然把家族以外的人视为外人，在态度上分的清清楚楚，因为家族、宗族都是排他的团体。同样，把兄弟、同乡会等也是排他性的。正是由于我国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网，因此，凡是关系网以外的人都被认为是圈外人，而对于圈外人与圈内人们的态度是完全两样的。

六、跨文化交际中的人际关系

在我国人际关系中的两个特点——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和等级差别——对于跨文化交际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容易把中国人当中的人际关系原则运用于同西方人交往之中。来华从事经贸谈判的西方人注意到，中方往往先试图建立友好的关系，中方认为在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之后，贸易谈判就相对容易取得成功。因此，中国人在与西方人的贸易谈判时往往以建立关系为出发点。而西方人一般是就事论事，以贸易谈判的目标为目标，希望尽快进入实质性的谈判。

我国不少人以为西方国家的关系网与我国类似，只要认识关键人物，拉上关系，事情就一定办成。于是，对于来访的西方客人破格招待，宴请规格尽量高，馈送的礼物尽量贵重，主人以

为这样做了以后的事就会一帆风顺。而实际情况往往与中国主人的设想相差甚远。

在处理朋友关系方面，我们与西方国家的人也大不相同。我们重视老朋友的关系，对于朋友的期望值很高，即使不是桃园结义，也应情同手足，若是交流，最好是无所不谈；若有困难，应该倾囊相助。友谊保持的时间越久，越能显示出友情之深。但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人们一生之中往往需要迁移多次，要保持长久的友谊关系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朋友的圈子常常变动。另一方面，美国人一般不愿意朋友关系过深带有许多责任和义务。Edward Stewart & Milton Bennet 这样论述美国人的朋友关系：

“虽然美国人保持许多友好的非正式的关系，但是他们极少有那种很深而又维系多年的友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朋友之间变得相互依赖。理想的境界是美国式的友谊建立在自然发生、相互之间的吸引以及温馨的个人感情的基础之上。人们选择自己的朋友，同时，他们又把朋友关系与社会或工作任务分开。”¹⁵

小结：

人际关系受到文化的制约，无论是家庭成员、亲戚、朋友或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无一不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总的来说，在我国家庭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家庭在人际关系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注重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的伦理关系，注重长幼有序。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扩大到其他的人际关系中去。正是由于我们重视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因此，对于圈内和圈外有严格的划分。东西方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差异对于跨文化交际的许多方面都有直接的影响。

思考题：

1. 许烺光认为，美国社会以横的夫妻关系为主轴，中国社会以纵的父子关系为主轴，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2. 中国传统的“五伦”在现代社会中有什么改变？
3. 为什么我国的单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所不包”？有什么益处和缺陷？
4. 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对待友谊的态度上有什么异同？试举例说明。
5. 在西方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常感到孤独，你对这个问题作何分析？

-
1. Edward Stewart .(1972) *American Cultural Patterns* . Intercultural Press. p. 7.
 2. Deena Levine & Mara Adelman .(1982) *Beyond Languag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 Prentice - Hall. p. 89.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78页。
 4. 易中天：《闲话中国人》，华龄出版社，1996年，240页。
 5.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92 - 101页。
 6. 吴景超：《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224页。
 7. 王玉波：《历史上的家长制》，人民出版社，1984年，51页。
 8. 许烺光： *Americans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 .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p. 20.
 9. 王玉波：《历史上的家长制》，人民出版社，1984年，48页。
 10.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72页。
 11. 同注6，227页。
 12. 同注4，190 - 191页。
 13. Ge Gao & Stella Ting - Toomey .(1998) *Communicating Effectively with the Chinese* . SAGE Publications. pp. 16 - 17.
 14. 彭迈克：《难以捉摸的中国人：中国人心理剖析》（杨德译），牛津大学

出版社, 1993 年, 42 页。

15. Edward Stewart & Milton Bennet. (1991) *American Cultural Pattern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ntercultural Press. pp. 100 -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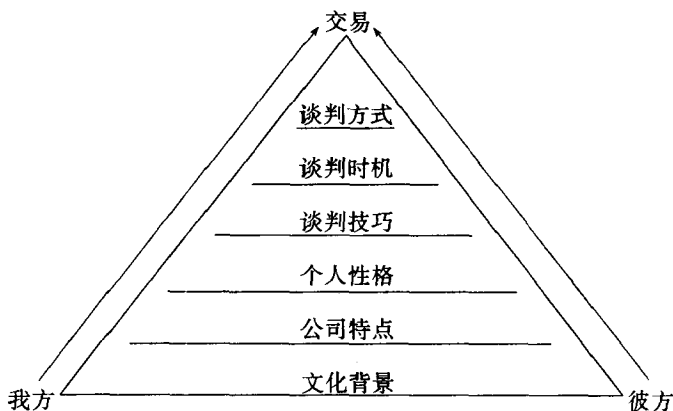
第九章 经营管理

一、经营管理与文化密切相联

经营管理既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深刻反映文化的各个层面。现代化的经营管理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成为人们十分注意研究的课题。在一个国家能够高效率管理企业的经理到了另一个国家做同样的管理工作却未必能够成功,原因可能各种各样,但研究者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管理人员忽视了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而管理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上没有一种管理经验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机械地搬用一国的经验运用于其他国家、其他文化环境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八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的投资者来到我国谈判投资项目时发现,无论在谈判目标、策略或者方法方面都与我国有着很大的分歧。中方认为谈判的条款已经十分完备,而西方国家的谈判代表却认为条款过于粗疏,在法律上难以接受。在谈判的风格上中西方也全然不同,西方倾向于直截了当,而中方比较讲究分寸和礼貌等等。再加上在审批手续和外汇管理方面的各种规定,西方投资者对于投资环境常常有许多怨言。有的投资者取得了成功,但也有不少投资者对于在中国投资望而却步。究其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对于我国文化和习俗不了解而造成的。

Vincent Guy 和 John Mattock 在他们合著的《国际工商管理》(*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ook*)一书中对于文化与交易的关系作了形象的描述。他们把文化背景、公司特点、个人性格、谈判

技巧、谈判时机、谈判方式由下向上像金字塔一样作了排列，如图所示：¹



在所有因素中文化背景是最根本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其他的方面。只有了解彼方的文化背景、公司特点和个人性格，才能决定谈判的技巧、时机和谈判方式，也才能取得交易的成功。

日本近二三十年来在经济上的成功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美国的学者对于日本的管理经验更加注意研究。人们发现日本的经营管理模式与他们的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Boye de Mente 侨居日本数十年，对于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先后撰写十余部有关日本的书籍，在美国是研究日本的一个权威。他在《洞察日本文化——对日经商之道》一书中指出，在日本经商要取得成功必须知道三条基本原则。首先，你必须要有日本人要购买的产品和售后服务。其次，你在日本必须有一个广泛的联系网。第三，你必须具有足够的跨越文化的交际技能。他强调：“要是你弄不清日本文化的来龙去脉，不能在这一前提下与日本人进行接触、交往，那世界上再好的产品、再深入的调查研究、再先进的工作网也要落空。”²

路英浩所著《开放前沿的文化震荡》一书对于我国三资企业中的各层次的文化冲突作了细致的分析。他指出,文化冲突产生在几个不同的层次,有的属于显形文化的层次,例如在语言和非语言交际方面、习俗方面等。有的属于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方面,有的是认知模式方面的问题,有的甚至是制度性文化的冲突。

西方国家的学者对于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经贸和经营管理方面的差异也加强了研究,近十年来出版了不少这类书籍。例如, Lane Kelley 和 Oded Shenkar 合编的《在中国的国际工商业》(*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China*) 1993 年在英美两国同时出版。书中对于中国的投资环境、经济发展前景、独资合资企业的管理、贸易谈判风格等作了深入的探讨。Christopher Engholm 在 1994 年出版了《在亚洲蓬勃发展的“中国三角”经商》(*Doing Business in Asia's Booming 'China Triangle'*), 对于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投资的方方面面作了详尽的分析。美国学者对于日本、墨西哥、澳大利亚与美国的文化分歧也作了大量研究。墨西哥与美国尽管相距很近,但是在经营管理方面却与美国有着很大的距离。有的美国企业管理人员由于不了解墨西哥的文化习俗,在初期屡犯错误,使得企业不能正常运转,当地工人对于美国的管理方式十分不满,美国管理人员对于墨西哥工人也极为反感,对立情绪严重。只是在美国人改变了管理方式以后,关系才变得融洽,生产才得以正常进行。美国、德国和法国都是西方国家,但是他们的经营管理方式在许多方面仍然不同。例如,美国企业要求每季度出一份财务报告,而德国企业只出年度报告。美国广告往往强调产品如何新奇,而德国人并不重视这一点,他们的广告着重产品质量、耐久以及相关的详细信息。

二、不同的经营管理理论模式

西方的经营管理模式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根据郭纪金在《企业文化》一书中所说,西方的经营管理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

分为四个阶段。³ 第一阶段是古典管理理论阶段，大致上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泰罗、法约尔和韦伯等人。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 工时利用的科学化，劳动方法的标准化；2) 挑选工人，按标准方法对工人进行培训；3) 建立激励性的工资制度；4) 进行组织改革，把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分开。古典管理理论的优点是将管理科学化，其缺陷在于见物不见人，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从本世纪 20 年代到 50 年代初是行为科学管理阶段。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是梅奥和罗特利斯伯格。他们为了弄清工作环境的物质条件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 1924—1932 年在霍桑工厂进行了大规模的试验。从中他们得出以下一些结论：1) 工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因此，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激励工人提高生产率。2) 企业中有两种组织并存，即除了有正式组织以外，还有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重视效率，非正式组织重视感情，如果管理人员忽视工人的感情需求，忽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可能与工人发生冲突。3) 新型领导人员应当善于了解人们，倾听职工意见，善于解决劳资之间的矛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梅奥之后，又有人建立后期行为科学学派，侧重于自我实现，提出一套激励理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麦格雷戈于 1957 年发表著名论文《企业的人性面》，创立了“X—Y”理论。按照他的归纳，X 理论对于人的本性的假设是：1) 一般人生性懒惰，希望工作越少越好。2) 一般人都缺乏责任心，不愿主动承担责任。3) 人生来以自我为中心，把个人利益放在一切之上。4) 人习惯于守旧，不求进取。5) 只有少数人具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所需要的想像力和创造力。6) 人是缺乏理性的，一般不能控制自己，易受他人影响。麦格雷戈不同意 X 理论，提出了与之相反的 Y 理论。Y 理论对于人性的假设是：1) 人并不是生性懒惰，要求工作和劳动是人的本能。2) 外部的控制和惩罚不是使人努力的惟一办法。3) 对

于人们最重要的报酬是满足他们对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4) 在正常条件下人们不但学会接受责任, 而且追求责任。5) 大多数人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都有相当高的想像力、创造力。6) 在现代工业生活的条件下, 一般人的智慧潜能只是部分地得到发挥。麦格雷戈把 Y 理论称为“人员管理工作的新理论”, 它的依据是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

在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 又出现了“超 Y 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 1) 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 需要的层次因人而异。2) 人在同一时期内有各种需要和动机, 他们会发生相互作用并结合成为统一的整体, 形成复杂的动机模式。3) 人在组织中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断变化, 因此会产生新的需要和动机。4) 人在不同单位或同一单位的不同部门工作, 会产生不同的需要。5) 由于人的需要不同, 能力各异, 对于不同的管理方式会有不同的反映。其基本观点是没有一套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的普遍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 管理需因人而异, 因事而异。

三、文化对于经营管理商贸谈判的诸多影响

文化对于经营管理和商贸谈判的各个方面都有直接的影响, 例如, 上下级关系、决策程序、对于时限的态度、对于劳动的态度、对待协议的态度、谈判的策略等等无一不打上文化的烙印。对于文化缺乏敏感的人往往把自己的文化模式套用于另一个国家, 以为在自己国家行得通的做法在另一个国家和另一种文化中也能行得通, 结果在经营管理和商贸谈判中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

在劳动态度方面, 在合资企业中, 外方管理人员常常报怨中国职工干活效率低, 而许多中国职工则抱怨外方管理者所定指标太高。日本人经常是提早上班, 晚下班。例如, 池田工厂每天早上 8 点开始工作, 但工人在 7 时之前就陆续赶来, 到七点半时, 几乎所有的人已经来到工厂。上夜班的工人在加班一个小时候后才

离开工厂。日本人在中国办合资企业时，力图将日本的这一套办法移植到中国，但是并不是都很成功。例如，上海爱斯佩克环境仪器公司是一家现代化的中日合资企业，总理由日方担任，日方还派出了若干管理人员。企业刚建成投产时，日方推行日本的管理方式，上班时间是上午 8:30 至下午 4:30，日方要求 8:30 上班铃声响过以后，班组职工必须马上列队，由日方管理人员或班组长交待任务，简短仪式以后，职工立即投入工作，但是中方职工极不适应，常常上班铃声响过后，8:45 甚至更迟才进入工作状态。下午 4:30 不到，甚至刚到 4 点，职工们都纷纷做好下班准备，久而久之，日方管理者拗不过中国职工，列队仪式没有坚持多久就偃旗息鼓了。⁴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多，其中包括铁饭碗、大锅饭、国家全包的福利主义以及国营企业冗员过多等等，造成人们缺乏竞争意识，劳动纪律松弛。转到合资企业工作，职工长期形成的习惯改不过来，无法适应外方的严格要求，因此造成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矛盾。

对时间的不同态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时间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在第六章中已经论及。时间观念与文化密不可分，在经营管理和经贸谈判中同样反映出人们时间观念上的区别。到日本谈判贸易的美国人看到日本现代化的城市和工厂，就误以为日本与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相差无几。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看法与现实有很大的距离。在美国和加拿大用两天就能签订的合同，在日本往往需要两个星期才能完成。美国人甚至认为日本人经常采取拖延战术。其中的一个办法是不论公司的大小在一个公司中只设一名会计，在问题得不到解决时，拖延的办法是告知对方会计不在，因此无法进行预定的工作。而会计经常是百分之三十的时间不在公司。德国人对于日程和时间安排十分严格，但是会议经常很长，因为德国人对于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十分关注，常常花很多时间讲事情的背景。与日本和美国相比，德国供货也常常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法国的节奏与德国完全不同，一个德国

公司领导人员这样评论：“法国人开始的慢，速度逐步加快，下午的后半段时间达到高峰，并一直保持到晚上很晚的时间。德国人一大早就干起来，并保持大致一致的工作速度，到下午的后半段逐渐慢下来。他们通常午餐时间很短，下午五点离开办公地点。”⁵ 外国投资者到我国投资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手续繁杂，往往要费很多时间才能办成一件事。1983年3月中方与英方投资者签订合资协议，成立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有限公司。协议规定，自签约起，厂房基建3年完成，但是三年多过去了，到了1986年底，基建仍远未进入尾声，英方提出愿意多增加施工费用，但是施工进度仍不见加快。一位姓葛的先生在1988年的一天到日立公司驻沪办事处办事，前后只用了7分钟便办妥了公务。他到一家合资的化工企业办事，在各办公室“旅行”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他最初询问的办公室，前后共花了1小时57分钟。⁶

权力与决策。日本企业尽管都是现代化的先进的企业，但是，企业的经营体制却是家长式的。日本管理者极力把自己的企业办成像一个家庭一样。公司的领导人被看成是“家长”式的人物，而公司的雇员则应该对于公司尽忠心，对于公司的领导人惟命是听。公司的培训也往往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把受训人员安排给特定的管理人员，由他们负责对年青人进行全面的培训和考核。在培训中注意贯彻公司精神，例如，在松下公司，受训者每天做完操以后都要像军人那样排成整齐的队伍听训话。中心主任站在队伍前面的平台上，打开公司守则，带领大家激情满怀地大声朗读公司的章程，其中有这样的誓言：“作为雇员，我们要尽职尽责，努力改善社会生活，为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⁷ 到亚洲来经商的西方人发现无论在中国或是日本决策的过程与西方特别是美国有着很大的区别。在美国，谈判代表握有实权，可以在他被授权的范围内作决定。个人敢于负责在美国被视为一种美德，是进取向上的表现。但是，在日本或中国决策

常常是集体协商的结果，一般来说避免个人做决定。中国的谈判小组在谈判之前、谈判当中以及谈判之后通常都要一再交换意见以协调整个小组的行动。有时还需要请示上级，与有关单位“通气”。因此，决策的过程一般都比较长。在政府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和在公司中任职的雇员各自负责一部分工作，对于自己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通常都不愿意过问或表示意见。

“和为贵。”在商贸谈判中无论中国或者日本的代表通常都采取避免正面冲突的策略，有时宁可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再考虑考虑。”“我们再研究一下。”等），也不直截了当地回绝。一些细微的暗示西方人往往不能理解。一个美国公司的代表在和一家日本公司谈判以后，满以为成功在望，在她乘飞机离去的时候认为她到家时就会收到订单，但是，飞机起飞以后，日本公司的总经理立即通知下属发传真给对方通知她谈判失败。日方不愿意当面回绝，而宁可书信通知。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直接告诉她这个消息尽管令人不愉快，但是至少还有再降低报价重开谈判的可能，即使不能再谈判，也可以避免如此重大的误解。美国人谈判时为了取得进展愿意公开分歧，主动把双方的不同观点摆明，以便推进“诚恳的对抗”（honest confrontation），但是这种做法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往往被认为是咄咄逼人。因此，有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者对于美国公司提出劝告，告诫他们在派出谈判代表时一定要注意遴选，要选那些善于控制自己感情比较温和的人。⁸

法律的意义。美国人在与中国人谈判之前常常准备了详细的法律文件，在谈判时也常常有律师参与。他们看到中方准备的文件常常感到像是一份提纲，缺乏法律的严密性。中方则往往认为美方的文件过于繁复，细节过多。有时向美方提出，希望他们再准备一份简单的文件，以便向领导汇报。谈判时一般没有律师出席。在谈判结束以后，美方认为双方的责任是执行合同的条文，一切按照合同办事。但是，据美方反映，中方有时在合同签订以

后仍然提出一些要求,而这些是合同中所未规定的,由此引起一些纠葛。实际上,这种情况不仅在我国存在,在韩国也有同样的情况。“西方人把合同的签订看作是一系列谈判的终结,而这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但是对于韩国人来说,一份合同是一份个人的协议,它标志着一种关系的开始。韩国人的看法是合同的内容不如签字本身和签字人重要。如果签字人调换工作或者离开了公司,合同的条款可能被认为无效或者需要修改。在合同签订以后,双方的关系和对话需要继续下去,以适应变化的情况并据以修订合同。”⁹日本人也不愿意签订内容详尽而带有约束力的合同。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最终协议。他们认为客观情况会随时变化,他们欣赏建立在真诚、亲善基础上的松散协议,以便在情况变化时随时修改。

关系网。在任何一个国家办企业、开公司、从事商业活动都要依靠一定的社会关系,东西方无一例外。没有一定的社会网络,没有一定的门路,要想打开一个市场或办好一个企业是不可思议的。Edward Hall 和 Mildred Hall 在他们论述美德法三国文化差异的书中对于在德法两国经商的美国人提出不少忠告,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认为,要想在法国取得成功,必须和法国人建立长久的关系。“要记住你的法国批发商和零售商已经花了多年建立起对于他们的买卖至关重要的个人联系,所以,不要期望在他们或者别人那里马到成功。你必须边干边发展个人关系,这样他才会告诉你该干什么。法国人不会把一切都给你写下来。”¹⁰

在亚洲各国经商或者办企业,社会联系更加重要。一位在亚洲经商多年富有经验的澳大利亚商人总结他的经验说,“重要的不是你的专业知识,而是你认识谁。”(It's not importan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在日本要找到门路需要有合适的人介绍,如果介绍人是个并不重要的人,事情往往办不成。一种介绍的方法是介绍人在他的名片上写几个字,请对方接待。也

有的用介绍信。“如果介绍信出自一位某银行或某公司的高级人物之手，他与你感兴趣的这家公司关系密切，或出自你的会见人的前教授之手，以及这位会见人的亲密的家庭朋友之手，那么这封介绍信就会效力非凡，起到极大的作用。”¹¹很多日本公司雇佣一些著名的政界人物、退休官员和前王公贵族充当中间人，由他们任顾问或商谈员，会谈往往容易得到成功。日本公司的职员在下班以后常常需要在酒馆或饭店和客户周旋。外国商人要想在日本得到成功，也必须宴请各种客人，但必须知道在合适的地方招待他们。如果是一般的工商界人士，最好的办法是在他们经常落脚的餐馆招待他们。而如果你是这家餐馆的常客，与老板和主要女招待混得很熟，那么宴请的效果往往很好。如果是地位较高的日本工商业官员，就必须在非常高级的私人餐厅或大饭店的餐厅请客。艺妓馆也是合适的请客的地方。在一般的餐馆请他们吃饭就显得很不合适。在韩国搞好和各方面的关系同样十分重要，韩国人重视友情。一旦成了好朋友，韩国人会竭尽全力帮助你，而且这种友谊会延续一辈子。宴请是建立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通常宴请都是在餐馆和饭店中举行，很少在家里招待客人。除了宴请以外，请客人参加卡拉OK活动或者邀请打高尔夫球也是搞好关系的方式。夫人有时被宴请，但一般不被邀请参加其他活动。¹²在我国“关系”之重要人人皆知，西方人也深知在中国经办公司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网。在美国的学术杂志上也不时可以看到论述“关系”的论文，有的博士甚至以此作为自己研究的课题。来中国的人可以一个汉字不识，但却知道 *guanxi* 这个词。Christopher Engholm 在他的有关在中国做生意的书中着重指出要“先搞关系，后谈生意”。他的看法是关系基于信任、相互依靠和义务，但最重要的是有来有往（reciprocity）。中国人的头脑里有一本账，他清楚地知道他欠谁的账，谁又欠他的账，两边的账不必正好相抵，重要的是这种关系要处于一种动态，今天我帮了你的忙，以后你帮我的忙。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会把这种交往看

作一种负担，他们不习惯于欠这种人情账。但是，在中国这是很正常的事情。Engholm 指出：“没有关系和联系，在重要的地方没有能帮得上忙的朋友和同盟者，一个外国公司不大可能在中国取得全面的商业上的成功。”¹³因此，在中国谁认识的人多，谁的关系网广泛，谁就是最受欢迎的人。出了问题有了麻烦就要找能和有关部门“说得上话”的人。不仅公司企业十分注意经营关系网，打开各种门路，就是一般人也无不把人际关系视为至关重要的事，没有关系的人极力去“拉关系”、“找关系”。搞好关系的办法多种多样，通常是请客送礼，宴请的规格越高越说明对方重要，礼品越贵越稀奇越受到欢迎。有的想尽办法，投其所好，或金钱贿赂，或安排国外旅行，或为其子女留学出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四、对于跨国经营的挑战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跨国经营必须面对各种文化差异，必须学会处理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经营管理现代化的企业。世界上没有在一切国家一切地方都能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办法。为此跨国公司通常对于他们的外派雇员进行培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培训。关于培训在本书最后一章中将专门论及。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一方面对外贸易量大幅度增加，从八十年代的几百亿美元贸易额上升到 1997 年的进出口总额 4400 亿美元，进入世界进出口贸易额的前十名。另一方面，外国投资者在我国投资额也不断上升，目前已达到 1500 亿美元。不少大的跨国公司已经进入我国，而我国也开始在国外投资，在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开设工厂或者经营零售网。所有这一切都对于我国的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也必须像其他跨国公司一样学会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经营管理现代化的企业，对于他们来说，跨文化经营管理是一门新学问。把国

内的一套管理办法搬到国外肯定是行不通的。近年来,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加强了研究,出版了不少有关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书籍。例如,刘厚元等编著:《对外交往与经贸谈判》(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杜定平编著:《怎样与美国人做生意》(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刘晓慧、余运高编著:《怎样与日本人做生意》(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张祥著:《国际商务谈判:原则、方法、艺术》(上海三联书店,1995),桂国平编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英文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等等。

小结:

经营管理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经营管理的方式往往打着文化的烙印。近年来各国学者加强了对于经营管理模式的研究,认为没有一种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有适应各国的文化环境才能成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外资进入我国,以及进出口贸易和境外投资的发展,在经营管理方面我们也面临各种文化冲突,因此,必须在经营管理方面提高跨文化的意识,学会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公司的管理人员打交道。

思考题:

1. Guy 和 Mattock 认为文化背景对于公司的特点以及谈判方式等具有很大的影响,你同意这种论断吗?
2. 在你的朋友中有没有在外企工作的?他们感到最不适应的是什么?
3. 外商在我国开公司办企业,他们的主要抱怨是什么?你有所了解吗?你对于这些问题作何解释?

- All the Tools, Tactics, and Tips You Need for Doing Business Across Cultures*. NTC Business Books. x.
2. 门蒂:《洞察日本文化:对日经商之道》(李福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9页。
 3. 郭纪金:《企业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9—21页。
 4. 路英浩:《开放前沿的文化震荡》,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2—86页。
 5. Edward Hall and Mildred Hall. (1990)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Germans, French and Americans*. Intercultural Press. p. 90.
 6. 同注4, 92页。
 7. 同注2, 36页。
 8. Oded Shenkar and Simcha Ronen. (1987)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Negotiations: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Interpersonal Norms. In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3, No. 2, pp. 263-275.
 9. Judith Cherry. (1993) *Cassell Business Briefings: Republic of Korea*. Cassell. p. 336.
 10. 同注5, 132页。
 11. 同注2, 50页。
 12. 同注9, p. 334.
 13. Christopher Engholm. (1994) *Doing Business in Asia's Booming "China Triangle"*. Prentice-Hall. p. 80.

第四部分 跨文化交际的核心

第十章 价值观

一、什么是价值观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学者们都认为价值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不理解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就不能真正理解跨文化交际。因此,我们专门用一章的篇幅讨论有关价值观的几个问题。

尽管价值观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词汇,在理解上并没有困难,但是,为了学术讨论的准确和方便,我们仍然需要予以界定。

Michael Prosser 对于价值观是这样论述的:“价值观是个人或群体主要通过文化交际构成的模式。它们是最深层的文化,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价值观。”¹

Geert Hofstede 的定义简明扼要:价值观是“喜欢某种事态而不喜欢另一种事态的大致倾向。”²

Clyde Kluckhohn 认为:价值观是“个人或群体所特有的一种显型或隐型的认为什么是可取的观念,这一观念影响人们从现有的种种行动模式、方式和目的中做出选择。”³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观念”、“可取的”和“选择”这三个词。既然是“观念”就说明价值观不是一个具体的事物,而是一种抽象的看法。“可取的”隐含着还有“不可取的”,就是说这是一种文化的规范,指导人们的行动。“选择”说明人们的行动存在各种模式、方式和目的,而人是可以做出抉择的。

Samovar 和 Porter 认为:“价值观通常是规定性的,告诫人

们什么是好的和坏的，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什么是真实的和虚假的，什么是正面的和反面的，等等。文化价值观确定什么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什么是值得保护的，什么会使人害怕，什么是应该学习的，什么是应该耻笑的，什么样的事件会使人们团结起来。最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指导人们的看法和行为。”⁴

从以上所引的几个定义可以看出价值观是决定人们所持看法和所采取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它与文化一样是一种抽象和概括，用肉眼无法看见，但是通过观察人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可以发现人们持有什么价值观。价值观有时和信念与态度相混淆，实际上它们之间是主与从的关系，即价值观是主，而信念和态度是从。价值观决定了人们会有什么样的信念和态度。也可以说，信念和态度是价值观的表现。

二、价值观与交际的关系

价值观与交际是支配和反映的关系。首先，价值观决定人们如何进行交际。无论是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或是社会交往，无一不受到价值观的支配。

以语言交际为例。中国人比较喜欢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意思，一般不喜欢正面冲突。西方人常常为此把中国人说成是“不可捉摸的”。实际上中国人并不是不可捉摸，而是我们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说话时注意不太直露，讲话尽量含蓄，惟恐直截了当会伤害对方的面子和感情。在中国人之间这样做大家都理解，也都认可。但是，西方人不同，尽管他们也重视人际关系，但是，首要的是把事情办成（get things done）。他们一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这样“绕圈子”。表面上看，这是两种表达方式的差异，实际上却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在人们相互交往方面，中国人十分注意谦逊，不仅在言谈话语中时时注意谦虚，而且在行动时也处处留心。我们这样做也是考虑到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国人一般都接受这些做法，但是，西方人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理解。这都说明价值观决定了人们的行动方式和交际方式。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交际反映人们的价值观。这种反映可以是直接或间接的。例如，从人们言谈中经常强调什么可以大致看出他们的价值观。这是直接的反映。从人们不谈什么以及谈话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人们的价值观，这是间接的反映。

一项十分有意思的研究可以说明交际是如何反映价值观的。亚利桑那大学的两位研究者使用完成未说完的故事的方法研究美国儿童和中国儿童在价值观方面的差异。⁵ 研究对象是洛杉矶的 80 名 11~13 岁的儿童和北京的 80 名同龄儿童。研究方法是给儿童 5 个只有开头没有结尾的故事，让他们把故事按自己的意思写完。这五个故事是这样开头的：

- 1) 彼德和福兰克一起去上学，福兰克把彼德的帽子扔到树上，要想取下来很困难。
- 2) 迈克尔的母亲让迈克尔去买晚餐要用的肉。在回家的路上，迈克尔与朋友们玩耍，结果肉被狗吃掉了一块。
- 3) 老师发现他桌子上的钱丢了。
- 4) 伊丽莎白停下她的家庭作业，试着穿她母亲的新衣服，结果在上面弄上了墨迹，这时她母亲进来了。
- 5) 约翰和比尔在玩球，打破了邻居的窗户，但是没有人看见他们闯祸。

中国儿童完成了 338 个故事，美国儿童完成了 363 个。对于每个故事按照特定的模式作了内容分析并合成成分数，然后对分数又作了因子分析。分析表明，美国儿童完成的故事比中国儿童完成的故事显示出它们更突出身体的侵犯和经济上的倾向；而另一方面，中国儿童的故事更强调自然的力量、群体倾向、感情成份、道德—伦理的正确与否以及对于权威的重视。例如，25% 的中国儿童在第一个故事中引入了其他的儿童，而美国儿童的故事中只有 7% 引入了其他人。这表明中国儿童更重视集体的力量。

在中国儿童的故事中成人角色（例如警察、店主、校长）引入的多于美国儿童的故事，前者占 21%，而后者只有 1%。这说明中国儿童比较重视权威。在第五个故事中，50% 的美国儿童写的是约翰和比尔打破邻居窗户后逃跑，而只有 13% 的中国儿童是同样的写法，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某种惩罚。这说明中国儿童比较重视道德的规范。

从这项调查可以看出，中国儿童即使在 11~13 岁这个阶段已经表现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所完成的故事是他们交际的一种形式。他们的交际活动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

三、价值观的特点

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它是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首先是在家庭中受到父母的教育，之后在学校中受到正规的教育，同时邻居、朋友、兄弟姐妹也会给予各种影响。电视、电影、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也时时刻刻施与强大的影响。所有这些在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价值观一旦形成，它支配着人们的信念、态度、看法和行动，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

价值观形成以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会轻易改变。一般说来，一个人学习异国的语言、习俗和社交规则等虽然不易，但并不是不可达到的目标。只要花上足够的时间，具有一定的条件（例如在该国生活和工作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等），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真正了解另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更不用说接受或获得）却是极为困难的。一个人可以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很长的时间，掌握其语言，了解其习俗，但是，仍然可能不理解其价值观中的某些部分。这里我们不妨引用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多年的加拿大心理学家 Michael Bond 的一段话：“我来香港已过第 15 个年头了，但我仍然感到像一个初来乍到、被中国人所包围的外国人。日常社交活动中，有许多出乎我意料的事，就连在此的老年

同行也还时而吃惊，时而高兴，时而愤怒，时而感到困惑。”⁶ 接着他举出四个例子，说明他的困惑，而这些例子都与中国人的价值观有关。对于一个专门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学者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人了。

价值观虽然相对稳定，但却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实际上，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们的价值观往往也会随之变化。代与代之间的观念上的差异往往反映年轻的一代在价值观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心理学家对此做过许多研究，例如心理学家杨国枢曾以 Morris 所编的“生活方式问卷”在 1964—1965 年间对于 1389 名台湾大学生进行施测，⁷ 发现他们最喜欢的第一种生活方式是“保存人类最好的成就”。二十年后，即在 1984 年，杨国枢与黄丽莉以同样的测量工具对 969 名台湾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发现他们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他们喜爱的程度排列如下：

- 1) 轮流体会欢乐与孤独
- 2) 将行动、享乐及沉思加以统合
- 3) 在无忧而卫生的享受中生活

而“保存人类最好的成就”却成为台湾大学生喜好程度较低的一种生活方式。由此，杨国枢与黄丽莉得出结论：“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足以改变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

四、学者们对于价值观的研究

人类学家、心理学家、传播学家对于价值观的研究一直给予极大的注意。人类学家 Florence Kluckhohn 与 Strodtbeck 提出 5 个基本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群体和不同文化所共有的。⁸ 这 5 个问题是：

- 1) 人类的本性是什么？本性是善或是恶或是既善又恶？
- 2) 人类与自然和超自然的关系是什么？是屈服于自然，与自然和谐，还是控制自然？

3) 人类生活的时间焦点是什么? 是倾向于现在、过去或是未来?

4) 人类活动的类型是什么? 是成就型、承认现状型或是既承认现状又承认变化型?

5) 人类关系的类型是什么? 是直线型、相互依赖型或是个人型?

Kluckhohn 与 Strodtbeck 从 30 年代中期开始对于美国西南部的 5 个社团 (community) 进行跟踪研究。这 5 个社团之间相距都不超过 50 英里。这 5 个社团中有两个是印第安人的村落, 一个是西班牙血统的美国人, 一个是摩门教徒的社团, 一个是新建立的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户组成的村落。他们都以农业为生。Kluckhohn 与 Strodtbeck 经过 15 年的跟踪研究发现他们根据前面的 5 个方面的问题对于这些社团所做的推测是基本正确的。他们证实他们提出的 5 个方面的问题确是人类价值观中共同的成份。

Kluckhohn 和 Strodtbeck 的理论对于此后的许多研究者影响甚大。Edward Stewart 根据他们的理论对于美国人和菲律宾人的价值观作了对比研究。他在 Kluckhohn 和 Strodtbeck 的理论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扩展。他提出的价值观的 5 个方面与 Kluckhohn 和 Strodtbeck 提出的稍有不同。这 5 个方面是:

- 1) 对于自己和个人的看法 (其中包括人的本性);
- 2) 对于世界的看法 (其中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
- 3) 动机 (其中包括成就感);
- 4) 与他人关系的形式 (其中包括平等、对抗等);
- 5) 活动的形式 (其中包括对于时间的倾向);

在 70 年代初期 IBM 公司将它从 1967 年以来在公司雇员中所作的系统调查材料 (共计 116, 000 份) 提供出来供学者研究。Hofstede 利用这些材料对于与工作有关的价值观念作了深入的研究。1980 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文化的后果》一书。他利用

大量的资料分离出四个衡量价值观的尺度,即个体主义—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 对权力距离的态度 (power distance), 对不确定因素的回避程度 (uncertainty avoidance), 男性—女性 (masculinity - femininity)。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比较容易懂,不必解释。所谓对权力距离的态度是指地位低的人们对于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状况的接受程度,是比较愿意接受,还是比较不愿意接受。例如,在有的文化中比较重视权威、地位、资历、年龄等,而在有的文化中它们的重要性相对降低。所谓对不确定因素的回避程度是指人们在非常规的环境中感觉舒服或是不舒服,非常规的环境指新奇的,未曾经历过的或者与通常情况迥异的环境。回避程度高的文化通过规章制度、安全措施以及对于绝对真理的信仰尽力回避各种不确定因素,而回避程度低的文化对于反常的行为和意见比较宽容,他们的规章制度比较少,在哲学和宗教方面他们容许各种不同的主张同时存在。所谓男性—女性是指在该文化中代表男性的种种品质(例如竞争性、独断性)更多,还是代表女性的种种品质(例如谦虚、关心爱护他人)更多。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价值尺度是衡量一个文化和一个社会具有该价值的相对程度。

Hofstede 将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观按他分离出来的四个尺度计算出他们各自的指数和所占位置,列表说明。下面是从他的表中抽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材料:

国家或地区	权力距离		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		男性—女性		不确定因素 的回避	
	指数	位置	指数	位置	指数	位置	指数	位置
澳大利亚	36	41	90	2	61	16	51	37
加拿大	39	39	80	4—5	52	24	48	41—42
法国	68	15—16	71	10—11	43	35—36	86	10—15
原西德	35	42—44	67	15	66	9—10	65	29
英国	35	42—44	89	3	66	9—10	35	47—48

国家或地区	权力距离		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		男性—女性		不确定因素 的回避	
	指数	位置	指数	位置	指数	位置	指数	位置
美国	40	38	91	1	62	15	46	43
香港	68	15—16	25	37	57	18—19	29	49—50
印尼	78	8—9	14	47—48	46	30—31	48	41—42
印度	77	10—11	48	21	56	20—21	40	45
日本	54	33	46	22—23	95	1	92	7
韩国	60	27—28	18	43	39	41	85	16—17
马来西亚	104	1	26	36	50	25—26	36	46
新加坡	74	13	20	39—41	48	28	8	53
台湾	58	29—30	17	44	45	32—33	69	26
泰国	64	21—23	20	39—41	34	44	64	30

从上表的指数和位置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个体主义方面占首位，这与我们对于美国的了解完全一致。日本在男性特质方面占首位，这也大致符合我们对于日本文化的了解。马来西亚在权力距离方面位居榜首，而在不确定因素的回避方面，占首位的是希腊（未包括在表内）。从西方国家的指数来看，英语国家比较接近，而亚洲国家总的说来共同点较多。

1979年9个亚洲、太平洋国家的学者使用国际上通行的Rokeach价值调查表对于10个不同国家的1,000名心理学系的大学生（每个国家男生女生各50名）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从调查中分离出的4个价值尺度与Hofstede分离出的4个尺度完全一致，只有一个尺度与Hofstede的调查不一致。尽管他们使用的调查方法、他们的调查对象与Hofstede的不同，而结论却近似，这使得Hofstede的结论更加有说服力。

但是，无论是Hofstede的调查，或是此后的10国对于大学生的调查，调查的设计都是西方国家的学者所作，因此，可能有忽略东方国家特点的缺陷。心理学家Michael Bond与22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合作进行了一项新的调查。这项调查是由他所组织

的中国文化调查小组 (the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 进行的。⁹ 首先, 他们请几位中国社会学家每人写出 10 条他们认为是中国人最根本的和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然后他们去掉相互重复的部分, 共得 33 条, 再加上他们自己从阅读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中得出的 7 条, 总计列出 40 项中国文化价值观念, 并把它们译为英语。这 40 条是:

1. 孝 (服从父母, 孝敬父母, 尊崇父母, 赡养父母)
2. 勤劳
3. 容忍
4. 随和
5. 谦虚
6. 忠于上司
7. 礼仪
8. 礼尚往来
9. 仁爱 (恕, 人情)
10. 学识 (教育)
11. 团结
12. 中庸之道
13. 修养
14. 尊卑有序
15. 正义感
16. 恩威并施
17. 不重竞争
18. 稳重
19. 廉洁
20. 爱国
21. 诚恳
22. 清高
23. 俭

24. 耐力 (毅力)
25. 耐心
26. 报恩与报仇
27. 文化优越感
28. 适应环境
29. 小心 (谨慎)
30. 信用
31. 知耻
32. 有礼貌
33. 安分守己
34. 保守
35. 要面子
36. 知己之交
37. 贞节
38. 寡欲
39. 尊敬传统
40. 财富

调查对象被要求在每项下用 9 度的标尺表明他 (她) 认为该价值的重要程度 (9 表明极为重要, 1 表明毫不重要)。调查对象是 22 个国家或地区的大学生, 每一国家或地区 100 名, 男女各半。根据调查对象的打分, 计算出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平均分, 再经过因子分析等计算方法得出 4 个因子:

- 1) 融合 (integration)
- 2) 儒家工作动力 (Confucian work dynamism)
- 3) 人心 (human-heartedness)
- 4) 道德纪律 (moral discipline)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出中国价值观念调查与 Hofstede 调查的相关系数。他们发现第一个因子融合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相关系数最高, 达到 0.65; 第三个因子人心与男性—女性相关

系数最高,达到 0.67;第四个因子道德纪律与权力距离的相关系数最高,达到 0.55。而儒家工作动力与 Hofstede 四个文化价值尺度中的任何一条相关系数都很低。

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儒家工作动力是单独的一条文化价值尺度。

他们将这一条与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相联系,发现凡是儒家工作动力这一项得分高的在经济方面的发展(以 1965—1984 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依据)都很快。在这一项得分最高的前 8 个国家或地区是: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巴西、印度、泰国和新加坡。亚洲五小龙全部在里面。这一调查结果使参加调查的心理学家都惊奇不已。

小结:

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的一部分,它支配着人们的信念、态度和行动。它是文化中相对稳定的部分,但是,在社会发生突变或巨变的情况下,它也会随之变动。人类学家、心理学家、传播学家对于价值观进行过长期的研究。人类价值观中有一些共同的方面,例如人的本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时间焦点、人们之间的关系等。在这些方面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侧重。80 年代初 Hofstede 的研究结果分离出四个价值尺度,这四个尺度对于此后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他的研究也证明这四个尺度具有普遍意义。Bond 领导的中国文化小组经过调查研究提出除了这四个尺度以外,还有另一个尺度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略,即儒家工作动力。研究还证明儒家工作动力的指数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关。

思考题:

1. 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 试举例说明。
2. 价值观与社会习俗比较, 哪一个更难改变?
3. 价值观在什么条件下最容易变化? 试举例说明。

4. 有的人类学家认为中国人的时间焦点在过去 (past-oriented)? 你同意这一看法吗?
5. Bond 的中国文化小组提出的 40 项中国文化价值表有没有重要的遗漏? 你完全同意吗? 你有什么补充?

-
1. Michael Prosser. (1978) *The Cultural Dialogue: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Houghton Mifflin Co. p. 174.
 2. Geert Hofstede.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 Related Values*. SAGE Publications. p. 18.
 3. 同注 1, p. 176.
 4. Larry Samovar and Richard Porter. (1995)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2nd edn.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p. 68.
 5. George Domino and Mo Therese Hannah. (1987)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Value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Children. I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18, No. 1. pp. 58 - 77.
 6. 彭迈克:《难以捉摸的中国人》,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vii。
 7. 黄光国:《儒家价值观的现代转化: 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载乔健与潘乃谷主编《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72 - 173 页。
 8. 同注 1, 181 - 191 页。
 9. The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 (1987) Chinese Values and the Search for Culture - free Dimensions of Culture. I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18, No. 2. pp. 143 - 164.

第五部分 提高跨文化意识

第十一章 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一、障碍之一：认识上的误区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最易犯的一个毛病是误以为对方与自己没有什么两样。一旦发现对方的行为与自己的预期相差很远，就会困惑、失望，造成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在认识上的这一误区是跨文化交际的一大障碍。下面举一些例子加以说明。

例1：留学生李英初次出国，到达美国不久被朋友请去参加一个聚会（party），他准时到达，但却发现许多人都姗姗来迟，穿的也很随便。在聚会上，有几种饮料和一些简单的食物，但是没有什么像样的菜。聚会上熟人很少，好不容易见到了马克，于是与他攀谈起来，谈了大约十来分钟，马克说他要和另一个朋友去谈谈，就走开了，李英非常失望。聚会的主人把他介绍给一两个人，然后就再也不管他了。两个钟头以后，他借故离开了聚会。回到家，他还很饿，不得不煮些面条吃。他决心以后再也不参加这类聚会了。

这次聚会对于李英来说是一次不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为什么李英会失败呢？这与他原来的一套想法有关。他认为既然是聚会人们就应该准时到达。既然是请客，就应该准备丰盛的食物。既然是朋友，马克就应该一直和他聊天，不应该把他扔在一边。既然是主人，就应该热情招待。李英去参加聚会时脑子里的这一系列想法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想法，对于宴请、朋友、主人应该是怎

样他有自己的预期,他以自己的想法揣度他人,设想美国的情形大约与中国情况差不多。正因为他抱着这些想法,又缺乏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的经验,所以,人虽然已经到了美国,但是,思想却并未改变。这些固有的想法成为李英从事成功的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障碍。

例2:萨拉是位英国教师,从曼彻斯特来到西安教书。她在讲课时学生不断地记笔记,但是,没有人提问题。虽然她一再鼓励他们提问,但是收效不大。她认为学生对她的讲课缺乏兴趣,但是,她又发现学生常常在课后或者课间问她问题。她指定学生课后读参考书,但是,她发现他们大部分没有读。她把学生邀请到她的房间,与他们聊天。但是,他们都比较拘谨。有的学生把她书桌上的东西拿起来看,事先也不征求她的同意。面对这一切,她感到沮丧。她觉得她可能在教学上不会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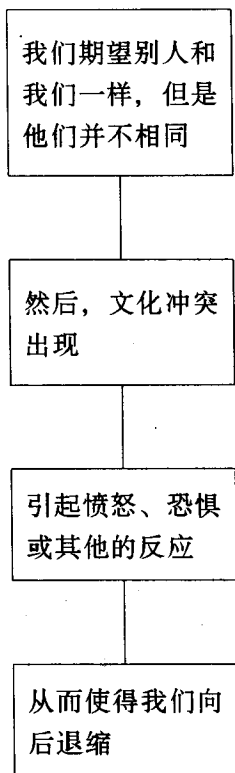
萨拉的想法是大学生在课堂上听教师讲课必然会提问题。课后应该阅读规定的参考书。在她的房间里,不事先征求她的同意不应该动她的东西,这牵涉到个人的隐私。萨拉下意识认为,在英国能够行得通的在中国也应该行得通,她没有认识到她的类推的想法给她带来了烦恼。她不了解中国学生在课上通常不愿意提问,也不知道图书馆里英文原版书比较缺乏,更不了解在隐私这个问题上英国与中国有着不同的标准。

LaRay Barna 认为,把自己的文化规范误认为是他人也接受的文化规范是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障碍。她指出:

“代表不同文化的人们聚在一起,每个人都身穿西服,讲一口英语,相互问候的方式也相似,这种表面的类似是有欺骗性的。这就像是认为既然纽约、东京、德黑兰表面上看都是现代化城市,那么它们就都一样了。如果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分歧毫无警觉,不认识到需要学习一套新的行动规则,那么,一个人从这个城市到另一城市时就会立即出问

题，即使是做开车走路这样简单的事。”¹

Craig Storti 认为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人们大致经历这样几个阶段：1) 期望对方与自己一样；2)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现实与预期差距很大，引起文化冲突；3) 感到愤怒、恐惧；4) 决定退缩回去。下面是 Storti 的示意图²：



认为别人与自己大致相同的想法十分自然，但是，对于跨文化交际来说却是有害的。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人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迥异的习俗。必须学会观察异国文化，善于与自己的文化

对比，才能逐步提高自己的跨文化意识。

二、障碍之二：刻板印象

尽管我们没有和某一种文化接触，但是，我们可能已经对它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例如，认为法国人浪漫，德国人严格，美国人随便，日本人努力工作等等。这些就是一些刻板印象，也可以称做定型。

刻板印象在英语中是 *stereotype*，如果下定义，可以说，刻板印象是对于某些个人或群体的属性的一套信念。这些属性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我们现在使用刻板印象这个词一般带有贬义。但实际上，形成刻板印象和形成概念或将事物分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认识事物时，通常都是从个别到一般，即首先认识个别事物，在认识了许多个别事物以后，将共同的特点集中起来，抽象成为一个总的概念。在总的概念当中，个别特点已经被忽略，存在的只是共同的特点。这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形成刻板印象的过程与形成概念的过程有共同之处，都是对于事物的概括，所不同的是刻板印象往往完全忽视个体区别，而且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刻板印象使得人们不能客观地观察另一种文化，失去应有的敏感。在观察异国文化时只注意那些与自己的刻板印象吻合的现象，而忽略其他。它妨碍我们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处，不利于顺利开展跨文化交际。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刻板印象对于跨文化交际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在人们讨论文化差异时常常无法完全避免介绍一些刻板印象。原因是讨论文化差异难免要概括，而概括与刻板印象十分接近。我们翻开几乎任何一本有关跨文化交际的书籍都会发现书中有这类的论述：“英美人勇于发表个人意见。”“也许世界很少有像日本人那样干什么事都喜欢拼命的民族。”“在美国这种竞争社会里，从小在家里就奖励竞争。”（以上这三段引语分别引自三本有关跨文化交际的专著。）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些概括性的话，

也可以说是刻板印象。在这里界限并不十分清楚。

心理学家对于刻板印象的形成作过多年的研究,有的认为社会环境是决定因素,有的认为儿童的个人经历起着重大作用,有的认为刻板印象与儿童的认知发展有关。Daniel Bar-Tal 对于犹太儿童对阿拉伯人的刻板印象的形成做过系统的研究。他发现以色列的犹太儿童在两岁半到三岁半这一阶段开始使用“阿拉伯人”这个词并形成概念,这时他们对于这个词的使用是中性的,即不褒不贬。但是,由于周围环境对儿童的影响,在长到六岁时大多数的犹太儿童已经对于阿拉伯人形成负面的刻板印象。³Bar-Tal 的调查报告这样论述:

“2.5~4 岁的幼小儿童与 5~6 岁的儿童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比后者不仅识别传统的阿拉伯人能力要低,而且持有负面评价的人数要少。随着年龄的增长,评价越来越变得负面,5~6 岁的儿童把越来越多的负面的特点归之于阿拉伯人,而且更经常地拒绝与他们接触。”⁴

Bar-Tal 没有对儿童受到影响的渠道进行调查,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犹太儿童对于阿拉伯人的刻板印象来源于家庭(父母、兄弟姐妹)和社会(幼儿园教师、其他儿童、电视、广播等)两个方面。考虑到半个世纪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长期冲突和战争,不难理解为什么犹太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对于阿拉伯人的负面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并非一成不变,许多调查证明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人们的原有的印象可能会随之改变。心理学家对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作过追踪调查,发现他们对于日本人的印象在战前和战后很不相同。Katz 和 Braly 的调查作于 1933 年,此后 Gilbert 在 1951 年作了相同的调查,1967 年 Karlines 等又进行了第三次

调查。普林斯顿大学生的刻板印象是用一些正面或负面的词汇表示的。请看下表⁵：

调查时间 评价 评判对象	1933	1951	1967
美国人	勤劳 聪明 重物质享受 有抱负 进步	重物质享受 聪明 勤劳 喜爱玩乐 个体主义	重物质享受 有抱负 喜爱玩乐 勤劳 守旧
日本人	聪明 勤劳 进步 精明 狡猾	模仿力强 狡猾 极为狭隘的民族主义 背信弃义	勤劳 有抱负 有效率 聪明 进步
犹太人	精明 贪财 勤劳 贪婪 聪明	精明 聪明 勤劳 贪财 有抱负	有抱负 重视物质享受 聪明 勤劳 精明
黑人	迷信 懒惰 无忧无虑 无知 有乐感	迷信 有乐感 懒惰 无知 喜爱玩乐	有乐感 无忧无虑 懒惰 喜爱玩乐 喜欢炫耀

如果对照表中的栏目内容，我们会发现变化最大的是对于日本人的刻板印象。在 1933 年普林斯顿大学生对于日本人的刻板印象基本上是好的，虽然也有负面内容。但是，在经过二次大战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大学生对于日本人的评价一落千丈，几乎没有什么好评。此后 16 年，即 1967 年，普林斯顿大学生对于日本人的评价又发生了变化，全部变成了正面的评价。由此可见，人们

的刻板印象并不是不可改变的。

通常人们认为刻板印象与歧视密切相关，刻板印象的下一步就是歧视。但是，许多调查结果却与人们的推测相反。例如，Brigham 1971 年的调查表明，在关于美国黑人的刻板印象的 15 条中，只有 7 条与对黑人的态度的相关系数有意义。这项调查的平均相关系数只有 0.15。在另一项调查中亚裔美国人对于白人的刻板印象与他们对白人的歧视的相关系数只有 0.05。⁶ 自然，这些调查可能由于方法的不当因而结果未能反映实际情况。

三、障碍之三：民族中心主义

民族中心主义在英语中是 ethnocentrism。所谓民族中心主义就是按照本族文化的观念和标准去理解和衡量他族文化中的一切，包括人们的行为举止、交际方式、社会习俗、管理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等。在当今的世界，只有极少数人露骨地宣称自己的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多数人虽然并不这样说，也没有这样明确的看法，但是，在观察另一种文化时往往不自觉地以自己的是非标准为标准，对于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事物常常做出价值的判断。有的学者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完全避免民族中心主义。尽管我们做出努力去克服自己的民族中心主义，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文化是我们心灵的软件，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指南，是我们戴着的一付滤色镜，要完全摆脱我们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各种观念和看法是不可能的。

各个国家的地图都是把本国放在中心。美国人看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感到生疏，因为他们习惯看到的是把美国放在中心的地图。我们看美国的世界地图也觉得奇怪，因为突然发现中国在地图的一侧。这都是把自己国家作为中心的最好证明。在历史课上，也往往是这种情形。谈到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一般总是突出自己国家的成就，而对于其他国家的成就估计不足。在世界文学史的撰写中，长期以来存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倾向，对于亚洲、非

洲、拉丁美洲的文学成就的篇幅较少,评价也较低。这是因为作者往往是欧美的学者。近年来,有些学者力图纠正这一偏向,在文学史中对于非欧美国家的文学给予较多的注意,但是,总的来说,欧洲中心论的问题远未解决。如果我们对比各国的新闻报导就会发现各个国家都是从自己国家的角度选择和报导所发生的事情,在报导同一事件时观点和材料也不同。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新闻报导的角度也并不一致,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加拿大的英语报纸和魁北克的法语报纸。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自己的一些看法,就会发现民族中心主义时时刻刻在起作用。我们收到西方人的礼物有时会不自觉的感到失望,觉得礼物实在“不够意思”。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有一个送礼的标准,认为送什么样的礼物才算“合适”。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常常感到孤独,觉得周围的人对自己体贴照顾不够,人际关系冷淡,知心朋友很少。这是由于在中国人际关系比较密切,人情味浓厚,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大于西方社会。以我们所熟悉的人际关系的准则来衡量西方国家的人际关系,自然会感到孤单无助。同样,西方国家的人来到我国,也往往会以他们的标准衡量周围的一切,在许多方面感到不适应。这说明民族中心主义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小结:

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障碍。障碍之一是人们常常误以为人总是一样的,从自己的文化角度去揣度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一旦发现与自己的预期不同,就会产生文化冲突。障碍之二是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与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方法紧密联系,因此,尽管人们知道刻板印象是不可取的,但是,完全避免却十分困难。障碍之三是民族中心主义,即习惯以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念衡量其他文化,以自己的是非标准为标准。有的学者认为,任何人都有民族中心主义,它是与文化共生的。

思考题:

1. 人们为什么常常会期望其他民族与自己一样?
2. 你能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明 Storti 的模式吗?
3. 请用英语释义的词典查以下几个词并说明它们有什么区别:
generalization
categorization
stereotype
4. 我们当中有哪些刻板印象是比较典型的? 试举例。
5. 民族中心主义与爱国主义有什么区别?
6. 除了本章所提出的这三个障碍, 你认为还有什么会构成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
1. LaRay Barna. (1988) Stumbling Block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Samovar and 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p. 323.
 2. Craig Storti. (1990) *The Art of Crossing Cultures*. Intercultural Press. p. 49.
 3. Daniel Bar-Tal. (1996) Development of social categories and stereotypes in early childhood: the case of "the Arab" concept formation, stereotype and attitudes by Jewish children in Israel.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 20, No. 3/4. pp. 341 - 370.
 4. 同注 3, p. 363.
 5. 转引自 Gao Yihong. Cultural stereotypes and the paradox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95 ICCC 论文编辑组编:《跨文化交际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6—17 页。
 6. Walter Stephan and Cookie Stephan. (1996) Predicting prejudice.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 20, No. 3/4. p. 410.

第十二章

文化休克与跨文化训练

一、文化休克

笔者在 1986 年和 1990 年在 20 名美国教师和 18 名英国教师中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他们在哪些方面不适应中国的文化。问卷中列举了 46 个不同的方面,由被调查者在问卷上标明他们所感受到的困难程度。这些英美教师在中国任教 1~2 年。从调查的结果来看,他们绝大部分在适应中国文化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难。但是,他们感到最难适应的方面却是调查者始料所未及的。美国教师感到最难适应的前 5 个方面是:

- 1) 抽烟的习俗
- 2) 作决定和解决问题的过程¹
- 3) 公交车上的拥挤²
- 4) 学生的学习方式³
- 5) 赠送礼物和接受礼物

英国教师最感困难的 5 个方面是:

- 1) 不排队
- 2) 作决定的过程
- 3) 公交车上的拥挤
- 4) 抽烟的习俗
- 5) 学生的学习方式

在中国教师中也进行了同样的调查,他们在美国学习或进修过 1~2 年。他们在文化方面感到最难适应的与英美教师完全不

同：1) 身体接触（包括拥抱、接吻、拍打等）

2) 与美国人谈话⁴

3) 衣着

4) 在社交场合如何处理尴尬的场面

5) 交朋友

由此可见，对于异文化不适应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只是人们不适应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美国在 60 年代曾向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派出和平队员。这些和平队员大部分是涉世不深的年青人。他们在被派出时热情很高，也有吃苦的思想准备，但是，在他们到达亚洲和非洲国家比较偏僻的城市和乡村以后不久，就感到很不适应，与当地人民的文化冲突很多，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压力很大，感情上十分痛苦，其中一部分人无法完成他们的任务，不得不提前离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作用越来越大，这些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向国外派出大批管理和技术人员，但是，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缺乏跨文化交际的经验和能力，在工作中往往遇到许多挫折，生活上也难以适应，不少人提前回国，给公司在业务和经济上造成损失。这些例子都说明，人们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迁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在文化方面感到不适应以致经历文化休克几乎是普遍的现象。

“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一词系 Oberg 于 1960 年在他的一篇学术论文中首次使用，概括种种跨文化不适应症状，之后广泛流传，如今已经成为人们常用的词汇。据 Oberg 的看法，文化休克有 6 个方面的表现：

1) 由于不断进行必要的心理调整而引起的疲惫；

2) 由于失去朋友、地位、职业和财产而引起的失落感；

3) 不能接受属于新文化的成员或者（以及）被这些成员拒之于门外；

4) 在角色、对于角色的期望、价值观念、感情和自我认同

方面感受到的混乱；

5) 在觉察到文化差异后感到的惊奇、焦虑，甚至厌恶和气愤；

6) 由于不能对付新环境而产生的无能为力的感觉。⁵

Adrian Furnham 和 Stephen Bochner 合著的一本书的题目是 Culture Shock, 副标题是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to unfamiliar environments (对于不熟悉的环境的心理反应)。也就是说，文化休克是人们对于另一种不熟悉的文化环境的心理反应。通俗地说，一个人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原来自己熟悉的一套符号、习俗、行为模式、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等被另一套新的自己不熟悉的符号、习俗、行为模式、社会关系、价值观念所替代，因而在心理上产生焦虑，在情绪上不安定，甚至沮丧。在严重的情况下，会产生各种心理和生理方面的疾病。最严重的甚至会患精神病或者自杀。这就是文化休克。

自然，并不是所有进入异文化环境的人都会发生文化休克。进入异文化的人的情况多种多样，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1) 旅游者。这类人通常在异国停留的时间短，而且有各种“保护”，例如，呆在旅馆里，与当地入很少接触，或只有很肤浅的接触；如果是旅游团，一般都有向导为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不需要他们自己出面；除了旅游，他们本身没有其他任务，不需要他们与当局或当地入有业务上的联系，因此，他们通常不感到生活上的不便或工作上的挫折。一般来说，他们情绪高涨，而不是沮丧。他们对于不熟悉的种种文化现象一般抱着好奇的态度，并不因为投身其中而情绪低落。

2) 短期出访的商人、政府官员、外交官等。他们在异文化环境中停留的时间从几天到几个星期，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居住在饭店或使馆里，与当地入只有业务上的往来。他们的困难大致上是工作方面的。他们对于异文化可能有不适应的地方，但是，通常不会感到很大的冲击。

3) 留学生和长期在外工作的人员,例如使馆工作人员、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和技术员、我国劳务输出的劳工、美国派出的和平队员等。他们在异文化环境中至少停留一两年,有的甚至更长。这些人与当地人有较多的接触,遇到的困难比较多,在文化方面不适应的情况经常出现,对于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求比较高。文化休克的种种表现在多数人身上会反映出来。

4) 移民和政治避难者。他们中有的出于自愿,有的则是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他们在文化适应方面遇到的问题最多,对于他们来说,文化适应是他们必须过的关。他们必须重新学习一套新的符号、习俗、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他们原来的文化与新的文化不断冲突,因此,他们在心理上承受的压力特别大。

文化休克集中反映在后两种人身上。至于为什么一个人进入异文化环境会产生种种不良反应,在心理学上有各种解释。

一种传统的解释是把文化休克和人们失去亲人朋友后感到的悲痛联系起来,认为其原因都是由于失去了某种东西。人们感到悲痛是因为失去了亲人或朋友,而进入异文化的人失去的可能是家庭、朋友、地位或者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东西,例如自己常吃的食物,自己习惯的气候,自己喜爱的娱乐方式等等。正是由于失去了这些最亲近的东西,人们在异文化环境中感到不适应,甚至痛苦。有一个我认识的北京姑娘嫁给了一个澳大利亚人。我在澳大利亚碰到她时,问她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她举了一些例子,比如,明明和邻居只有咫尺之隔,但是每次去邻居家,都要事先打电话,她觉得不可思议。我问她最想北京的什么,她说:“芝麻烧饼。”这个回答令我吃惊,但这并不是个别的例子。饮食看来似乎是小事,但是饮食习惯实际上是最难改变的,也可以说是深深扎根于文化习俗之中。

解释文化休克的比较新的理论还有一些。其中重要的有三种。⁶一种是负面事件理论,认为生活中有负面影响的事件(例如失业、离婚、丈夫或妻子的死亡等)会引起各种心理和生理方

面的疾病。负面影响愈大，时间愈长，所引起的疾病愈严重。从一个地方（文化环境）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文化环境）会带来许多有负面影响的事件。根据一项调查，在 43 项负面影响事件中，有 16 项与迁移到新的文化环境有关。这 16 项是：

事件	平均值
夫妻分离	65
工作调整	39
经济状况的改变	38
工作性质的改变	36
抵押贷款的提前	30
工作责任的改变	29
妻子开始或停止工作	26
生活环境的改变	25
工作条件或时间的改变	20
居住地点的改变	20
学校的改变	20
文娱活动的改变	19
教堂活动的改变	19
社会活动的改变	18
家庭聚会次数的改变	15
饮食习惯的改变	15

正是由于进入另一个文化环境在生活中带来一系列的有负面影响的事件，因此人们才会感到抑郁、沮丧、消沉，甚至会生病。自然，人们的适应能力是不同的。不同的人群对于同一事件会有不同的反应。一般来说，教育程度低、收入少的人，年纪大的人，

妇女以及未婚者适应能力比较低。

另一种理论是社会支持减少论。社会支持指的是一个人在困难时得到亲戚、朋友、同事、熟人、邻居等在物质、道义和感情方面的帮助。这种理论认为社会支持与一个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支持充足，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就好，反之，如果一个人缺少或者丧失社会支持，就可能引发各种疾病。在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另一国家时，他离开了自己的亲友、熟人、邻居等，他原来经常得到的社会支持大为减少，这时，他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一理论与人们的直觉相符，但是，在理论上还未完全解决为什么社会支持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

第三种理论是价值分歧论。这种理论的基点是人们之间存在着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分歧愈大，人就愈难适应新的环境。对于价值观念近年来有不少大规模的研究，其中包括对于欧洲价值观念的研究、Hofstede 对于与工作相联系的价值观念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对于华人价值观念的研究等。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说明价值观念的差别与文化适应能力成反比，也就是说，价值观念差别愈大，适应能力愈低。Furnham 与 Bochner 曾对分属 29 个国家的 150 名在英国学习的外国学生作过一项调查。⁷ 他们将外国留学生按地区分成 3 组。第一组包括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荷兰、卢森堡、挪威、瑞典和瑞士。第二组包括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主要是南欧和拉丁美洲国家）。第三组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韩国和泰国。第一组在文化上与英国接近，第二组属于中间状态，第三组与英国在文化上差距大。外国留学生和对比组的英国学生被要求在调查表上标明他们在各种社交场合有多大的困难。这个表上的项目包括：与自己年龄接近的人交朋友；在大的超级市场买东西；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跳舞或跳迪斯科；与自己年纪相仿的英

国人交朋友；与英国人去一个小型的聚会；进入饭馆或咖啡馆；出席一个正式晚宴；在谈话中采取主动；看医生；被采访等 40 项。在每一项下，按 1~6 打分（1 表示从未经历过，2 表示没有困难，3 表示较小的困难，4 表示中等程度的困难，5 表示较大的困难，6 表示很困难）。三组外国留学生和英国学生在 40 项上所打的分数分别加在一起并计算出平均分（分数越高说明困难越大）：

第一组	比较组（英国学生）	第二组	第三组
1.33	1.60	1.90	2.11

这项调查表明在文化方面（包括价值观念）的差距越大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就越大。

二、跨文化训练的历史与现状

虽然零星的跨文化训练在许多国家都进行过，例如，外交官在派出之前受到必要的文化方面的训练，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的 Army Language School 的训练也包括一些文化的成份，但是，大规模的系统的跨文化训练是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根据 Cornelius Grove 的调查⁸，大致是在 70 年代初有关跨文化训练的文章和书籍才大量出现。例如，四卷的《和平队跨文化训练指南》（*Guidelines for Peace Corps Cross-Cultural Training*）即是在 1970 年出版。从 70 年代起，跨文化训练在美国开始发展起来，主要涉及以下几类人员的训练：

- 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
- 将要出国留学的美国学生
- 将要出国工作的美国公司的管理和技术人员
- 将要出国赴任的外交人员
- 新移民

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美国大学也不断增加。美国最大的跨文化交际研究组织 SIETAR (Society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Training and Research) 的名称中虽然包括了教育、训练和研究三部分,但是,从它的发展过程来看,训练所占的成分越来越大,最后导致一些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者脱离 SIETAR,成立自己的组织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Intercultural Research.⁹

在欧洲跨文化训练并不普遍,主要是一些跨国公司对于自己的派出人员进行培训。在大学里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占很小的比重,不像美国大学那样普遍,但是,近年来也有较快的发展。在德国有的大学里开设跨文化经济管理课程。

在我国跨文化训练还很不普遍。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培训中有跨文化训练的成份,但只占很小的比重,不为人们所注意。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中方雇员有一部分接受公司所安排的跨文化训练,以便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雇员共事。

三、跨文化训练的方式

跨文化训练的方式从最初比较简单的讲课到目前使用多媒体以及其它手段,已经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据 Brislin 总结,大致上有以下六类方式:

1) 以提供信息为主的训练:例如就某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习俗等情况作演讲、放录像、提供阅读材料、组织讨论等。这是比较传统也比较容易采用的一种方法。

2) 分析原因的训练:通常的做法是先叙述在对象国发生的一件反映文化冲突的事件(一般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而非杜撰),然后提供几种不同的解释,由被训练者选出他认为合理的解释,然后与正确的答案作比较并展开讨论。Brislin 等人所著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s: A Practical Guide* 即是采取这种方法的范例。¹⁰这种方法为许多跨文化训练人员所使用,受到他们的欢迎。

3) 提高文化敏感的训练: 这是提高一般的文化敏感的训练方法。受训者通过活动对自己的文化有所了解, 从而举一反三, 了解文化的特性, 并进而了解其他的文化。在美国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是人为地设计一个与美国人的思想和性格完全相反的模式, 由一个人扮演, 让他与美国人交往, 其结果自然是矛盾百出。从这种活动中受训者体会到美国文化的某些特点, 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敏感。

4) 改变认知行为的训练: 这是使用较少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要领是从认知方面提高受训者, 并进而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例如, 帮助受训者首先分析自己文化中有哪些是对自己有利的方面, 有哪些是不利的方面, 然后再分析另一种文化, 分析其中有哪些是容易适应的, 有哪些是不容易适应的, 从而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

5) 体验型的训练: 这种训练中使用较多的是角色扮演。训练者指定受训者一定的角色, 由他们分演, 并体会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困难和问题。另一种训练方法是组织受训者参加田野作业(field trip)。首先人为地制造另一种文化环境, 然后让受训者在这种环境中学会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

6) 互动式的训练: 在训练中受训者与邀请来的客人——另一种文化的代表或专家——进行交往, 在交往中学习对方的文化习俗, 学会各种交际的技巧。

以上各种方法常常交叉使用, 互相补充, 而不是只使用一种方法, 排斥其他方法。例如, 在训练开始阶段, 可由讲课开始, 介绍某一国的历史和文化习俗, 之后展开各种活动, 让受训者参与, 或是扮演角色, 或是分析实例, 或是与该国的人士交往, 或是开展讨论, 从而提高文化敏感和改进跨文化交际的技巧。除了文字材料以外, 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影、录像、光盘等。

典型实例分析是跨文化交际训练中常用的一种方法。这里摘录 Brislin 书中的一例以说明其使用方法。¹¹

大卫是一个美国大学生，在台湾学习汉语，有一天在当地的小饭摊上遇到了陈立门。陈立门希望能认识一个外国人和他练习口语，就和大卫谈了起来。大卫想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方式。在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大卫提到他喜欢户外活动，比如爬山、远足、露营等。陈立门建议一起到城外附近的地方去爬山，而且答应作好一切准备。大卫希望认识一个能帮助他了解当地文化的朋友，同时又可以躲开城市的喧闹，所以很高兴地同意了。当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陈立门和他的朋友一起和大卫见了面，总共有 25 人之多。其中很多人都想和大卫谈谈。在附近还有几群人在那里玩。大卫看上去不高兴，但是什么也没有说，他尽量躲开其他人。陈立门注意到他失望的表情，和落落寡合的样子，但是不能理解。他不明白，他作了那么大的努力，打电话给朋友们，并且作了一切准备工作使得远足能够搞成，而大卫却还是不高兴。

你如何解释大卫的失望情绪？

- 1) 陈立门倾向于群体活动，而大卫却倾向于个体活动。
- 2) 陈立门选的地方不是大卫所习惯的远足的地方。
- 3) 大卫很自私，他认为陈给予他的注意会减少。
- 4) 大卫很腼腆，不肯和其他大声聊天的人讲话。

在受训者看了这段小故事以后，每个人选一个答案，说出自己的理由，然后再看书后面的答案，作对比，并展开讨论。每个答案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第一个选择。

这种练习的优点是受训者可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先做出判断，然后通过讨论得出正确的答案。通过许多这类的练习，可以了解目的国文化的各个侧面，逐步提高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

识和技巧。

四、跨文化训练的目标

经过跨文化训练应该达到什么目标,进入什么境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Hanvey 提出跨文化意识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通过旅游或课本了解到异国文化中的一些表面的可见的特点,得到的感受是觉得奇特和富有异国情调。在第二个层次,由于文化上的冲突,看到异国文化中的一些重要但细微的与本国文化不同的方面。这时的反映是情绪沮丧,行为反常。在第三个层次,通过理性的分析达到对于异国文化中的重要而细微的特点的了解,在认知的水平上感到可以接受。在第四个层次,通过长期生活在异国文化中的体验,学会从当地人的眼光看待一切,从感情上觉得异文化是可以接受的。他认为,应该努力达到第三个层次,同时应该至少达到第四个层次的部分要求。¹²

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通常的情况是交际双方有得有失,完全不变化的情况是比较少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交往时,中国人知道美国的一些风俗习惯,美国人也知道中国的一些做法,因此,在交往的过程中相互做一些妥协,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例如,中国人一般在接受礼物时并不打开来看,常常是一推再推以后才接受。但是,在美国朋友赠送礼物时,不少中国人改变自己的通常做法,不仅不推辞,而且把礼物当着客人的面打开,同时不断说些赞扬的话。又例如,美国人知道中国人喜欢握手,因此,在中国访问时主动与人们握手,以表示自己入乡随俗的愿望。这些情况说明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人们常常放弃一些原来的做法,采用对方一些做法,以求得比较和谐的交往。但是,跨文化交际研究者一般都不主张异国人彻底本土化 (go native),完全按照本地人的风俗习惯行事。原因之一是很难真正做到,做的不地道,往往会闹出不少笑话。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必要这样

做。跨文化交际并不要求某一方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只是要求在交际中尽量理解对方,在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方面尽可能一致,以求得与对方更好的合作。

从人们的实践来看,在语言和非语言交际中达到基本一致的理解,在风俗习惯方面相互适应,虽然并不容易,但并不是不能实现的目标,但是,在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往往是潜在的,不容易察觉,同时又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有些华人在美国生活几十年,在许多方面与美国白人几乎没有差别,但是,在价值观方面依然与美国白人存在很大的分歧。由此可见,在这方面要真正做到相互理解并不容易。

小结:

人们从熟悉的文化环境进入不熟悉的文化环境会出现各种不适应的情况,这是普遍存在的文化休克现象。为了帮助人们在异文化环境中顺利地生活和工作,必须进行跨文化训练。在美国跨文化训练大致开始于70年代,二十多年以来,训练的内容和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对于跨文化训练的目标可以有不同层次的要求。一般来说,在语言、习俗等方面适应另一种文化并不是最困难的,真正的困难在于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

思考题:

1. 在和其他国家的人士接触的过程中,你感到最难适应的是什么?
2. 不同年龄段的人在对异文化的适应方面是否有区别?你认为原因何在?
3. 除了书中所列的跨文化训练的各种方法以外,你还有什么其它建议?

-
1. 从被调查者所写的文字材料来看,他们对于作决定的过程不适应是指他

们工作单位的领导在作决定前往往不征求他们的意见。通常是作了决定才通知他们。“作决定的过程”在英文中是 decision-making.

2. 拥挤现象自然是英美人所不习惯的,但是,如果细致分析,这里还牵涉到体距和体触方面的差异。
3. 这里指的是学生习惯于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而不习惯于独立分析和提出自己的看法。
4. 这时指的是谈话的接续、话题的转换等。
5. 转引自 Stephen Bochner. (1982) *Cultures in Contact: Studies in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Pergamon Press. p. 168.
6. Adrian Furnham and Stephen Bochner. (1986) *Culture Shock: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to Unfamiliar Environments*. Methuen. pp. 177-199.
7. Adrian Furnham and Stephen Bochner. (1982) Social difficulty in foreign cultur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ulture shock. In Stephen Bochner: *Cultures in Contact: Studies in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Pergamon. pp. 161-198.
8. Cornelius Grove. (1981) Orientation Overview. *Background Paper No. 5*, 1981 World Congress.
9. 详见胡文仲:“IJIR, SIETAR 与 IAIR”,《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 年第 8 期。
10. Richard Brislin, Kenneth Cushner, Craig Cherrie and Mahealani Yong. (1986)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s: A Practical Guide*. SAGE Publications.
11. Ibid., pp. 73-74, pp. 99-100.
12. Robert Hanvey. (1979)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In Elise Smith & Louise Luce, *Toward Internationalism: Reading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wbury Publishers. pp. 53-54.

参 考 书 目

- Althen, G. (1988) *American Ways: A Guide for Foreig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cultural Press.
- Bochner, S. (ed.) (1982) *Cultures in Contact: Studies in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Pergamon Press.
- Brislin, R. et al. (1986)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s: A Practical Guide*. SAGE Publications.
- Chao, Y. R. (1976)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don, J. (1984) *With Respect to the Japanese: A Guide for Americans*. Intercultural Press.
- Engholm, C. (1994) *Doing Business in Asia's Booming "China Triangle"*. Prentice - Hall.
- Furnham, A. & Bochner, S. (1986) *Culture Shock: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to Unfamiliar Environments*. Methuen.
- Gao, G. & Ting - Toomey, S. (1998) *Communicating Effectively with the Chinese*. SAGE Publications.
- Garcia, O. & Otheguy, R. (eds.) (1989)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Cultures Across English*. Mouton de Gruyter.
- Gumperz, J. J. (ed.) (1982)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uy, V. & Mattock, J. (1995)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ook: All the Tools, Tactics, and Tips You Need for Doing Business Across Cultures*. NTC Business Books.
- Hall, E. (1976) *Beyond Culture*. Anchor Books.

- Hall, E. & Hall, M. (1990)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Germans, French and Americans*. Intercultural Press.
- Harms, L. S. (1973)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rper & Row.
- Hodge, A. (1987) *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s*. Willoughby, Australia: Janus Resources.
- 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SAGE Publications.
- (1991)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McGraw-Hill.
- Hsu, F. (1971) *Americans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 (3rded.)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Kroeber, A. L. & Kluckhohn, C. (1952)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Levine, D. & Adelman, M. (1982) *Beyond Languag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Prentice-Hall.
- Prosser, M. (1978) *The Cultural Dialogue: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Houghton Mifflin.
- Robinson, G. (1985)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Processes and Approaches for Foreign Languages,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Bilingual Educators*. Pergamon Press.
- Samovar, L. & Porter, R. (eds.) (1988)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5thedn. Wadsworth.
- Scollon, R. & Scollon, S. (1995)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Blackwell.

- Singer, M. (1995)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Perceptual Approach*. Prentice - Hall.
- Smith, E. & Luce, L. (1979) *Toward Internationalism: Reading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wbury Publishers.
- Stern, H. H. (1983)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wart, E. & Bennet, M. (1991) *American Cultural Patterns: A Cross - Cultural Perspective*. Intercultural Press.
- Storti, C. (1990) *The Art of Crossing Cultures*. Intercultural Press.
- Williams, R. (1983)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Fontana Press.
- 布罗斯纳安:《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毕继万译),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1 年。
- 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 蔡振生:《中日文化比较》,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 年。
- 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 陈原:《社会语言学:关于若干理论问题的初步探索》,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
- 戴元光等:《传播学原理与应用》,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 法斯特:《体态与交际》(孟小平译),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8 年。
- 费孝通:《乡土中国》, 三联书店, 1985 年。
- 郭纪金:《企业文化》,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 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鞠方安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原作 *Real Chinaman* 出版于 1895 年)
- ICCC 论文编辑组:《跨文化交际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
- 路英浩：《开放前沿的文化震荡：“三资”企业多层次文化冲突剖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 马兰德罗、巴克：《非语言交流》（孟小平等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
- 门蒂：《洞察日本文化：对日经商之道》（李福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 彭迈克：《难以捉摸的中国人》（杨德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 乔健、潘乃谷主编：《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 沙连香：《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 《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 王福祥、吴汉樱编：《文化与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
-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
- 王玉波：《历史上的家长制》，人民出版社，1984年。
- 吴景超：《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
- 伍谦光：《语义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
- 易中天：《闲话中国人》，华龄出版社，1996年。
- 苑子熙：《应用传播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1年。
- 张国良：《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
- 《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 张咏华：《大众传播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
- 《大众传播社会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
-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祖父江孝男：《简明文化人类学》（季红真译），作家出版社，1989年。

附录一：建议阅读书单

(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研究跨文化交际,特地准备了这一份书单。由于国外出版的书籍不易寻觅,这里只列出近年来国内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有关书籍,并作简要介绍。)

《与英美人交往的习俗和语言》, Helen Oatey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1987 年, 168 页。

Helen Oatey 在上海教英语长达 7 年, 她在与中国人交往过程中发现中国人与英美人在交往方式和习俗方面有许多差异。她根据亲身体验在书中作了文化上的对比。全书用比较浅近的英语写就。此书可以作为了解中西文化差异的入门书。

《跨文化交际研究: 与英美人交往指南》, 林大津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6 年, 343 页。

林大津教授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多年, 在福建师范大学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书中首先介绍了跨文化交际学的大致情况, 之后对于中国人与英美人在社会组织、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作了细致的比较, 最后提出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途径。行文流畅, 例子生动, 可读性很强。此书可以作为学习跨文化交际学的入门书, 也可以作为英语系本科学生的教科书。

《跨文化交流学: 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 关世杰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5 年, 440 页。

关世杰教授执教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多年。书分四个部分: 1) 绪论; 2) 从文化的要素看跨文

化交流；3）从交流的过程看跨文化交流；4）跨文化交流的不同层次。书的理论性比较强，可以作为本科高年级或研究生层次使用。作者更多地从传播学和国际政治的角度分析跨文化交际，有其独特之处。

《跨文化交际学》，贾玉新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1997年，532页。

贾玉新教授在黑龙江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跨文化交际学课程多年。在这部著作中，贾玉新将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与跨文化交际学结合起来，从宽泛和具体的交际环境两个方面对于跨文化交际进行考察，共分10个部分，24章，是目前国内出版的篇幅最长的跨文化交际学著作。材料丰富，角度新颖。适用于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层次。

《跨文化交际学选读》，胡文仲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年，313页。

选读共分四个部分：1）跨文化交际学介绍；2）文化及其特性；3）影响跨文化交际的诸因素；4）如何提高跨文化认识。选读收集国外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的文章共14篇。全部为英文。可作为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规定读物。英语基础较好的读者也可参考。

《文化与交际》，胡文仲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1994年，558页。

这是一部论文集，共收入44篇论文。涉及文化因素与外语教学、语言与文化、非语言交际、翻译与文化、语用与文化以及理论探讨等方面。论文作者既有外语界的前辈如王佐良、许国璋、王宗炎等教授，又有外语界新秀顾曰国、高一虹等。此外，还有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界的一些著名教授。可作为研究生的参考读物。对于跨文化交际有兴趣的读者亦可选择阅读。

《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Leger Brosnahan 著，毕继万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1991 年，223 页。

这是一部专门研究非语言交际（包括身势、手势、眼神、体距等）的著作，作者对于中国人和英美人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作了深入细致的比较，并且把有些差异引申到深层的文化观念对比。例子生动，可读性很强。

《传播学原理》，张国良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 年，231 页。

研究跨文化交际不能完全不了解传播学的原理。张国良教授执教于复旦大学，在传播学方面有多种著述，这里介绍的是一本比较通俗的传播学书籍。书的前几章对于了解传播的类型、结构、模式等有帮助，可用作参考读物。

《英美文化词典》，胡文仲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1995 年，480 页。

这是一本介绍英语国家文化习俗的词典，着重介绍衣食住行、社交往来、婚丧嫁娶、节日庆祝等习俗，并进而介绍有文化内涵的词汇、非语言交际、文学典故、宗教习俗、价值观念等。可以用作参考书使用。

《中国民族性（一）》，沙莲香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 年，341 页。

《中国民族性（二）》，沙莲香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 年，362 页。

这两部著作是沙莲香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族性格与中国社会改革》课题研究的成果。第一本为历史量表，把历史上有关研究中国人的主要著作及主要观点列成表，实际上有点像资料汇编，其中既有西方人士对于中国人的观察，也有国人对于国民性的论断，材料十分丰富。第二本是沙莲香教授的

专著，对于中国人的人格特质、行为取向以及性格结构作了论述。这两部著作对于跨文化交际中的深层次研究很有帮助。

《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乔健、潘乃谷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456页。

这是一部论文集，共收集了28篇，都是在第四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论文作者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美国，他们具有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等不同学术背景，共同探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行为与性格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观念行为的变化。此书对于研究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附录二：有关网址

(这里只介绍几个与跨文化交际研究有比较密切关系的网址供读者参考)

1. The Edge: The E-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website:
<http://www.hart-li.com>

这是 Bill Hart 创办的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电子刊物, 至今已经发表 6 期。在网址可以查到从 1997 年 12 月至 1999 年 2 月各期的文章。这份期刊的特点是在网上看到文章全文, 而不是摘要。

2. 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Forum website: <http://www.cca.org>

这是在美国的中国交际研究学会的网址。在这个网址可以了解到中国交际研究的动态, 也可以在这里提出各种学术问题, 与同行讨论。一个人提出问题以后, 大家可以发表意见。

3.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website: <http://www.ica.org>

这是设在美国的国际传播学会的网址。目前学会有 3000 会员, 主要研究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与国际传播。在网址可以看到学会期刊的目录、会议通知以及最近的消息等。

4. AFS website: <http://www.afs.org/usa>

AFS 是美国最大的负责中学生国际交流的组织, 总部设在纽约, 在各地有许多分支。在这个网址可以看到有关中学生交流的各种信息, 例如中学生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如何在家中接待来访的外国中学生、美国各地 AFS 活动的情况等。

5.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Intercultural Research website:

<http://www.watervalley.net/users/academy>

IAIR 是 1998 年 3 月成立的一个国际性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学术组织, 会长是密西西比大学心理学系 Dan Landis 教授。在这个网址可以看到学会的动态、会员的电子邮件地址、论文初稿以及参加学会的手续等。

6. Intercultural Press website: <http://www.interculturalpress.com>

Intercultural Press 是美国专门出版跨文化交际方面书籍的出版社。在网址可以看到新书介绍、跨文化交际培训消息、跨文化交际的其他网址以及出版社对于作者文稿的要求等。